

拉法格著

# 财产及其起源

王子野译



2 028 8735 9

# 财产及其起源

拉法格著

王子野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Поль Лафарг  
ЗА И ПРОТИВ КОММУНИЗМА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Ь  
И ЕЕ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 • Москва • 1959  
根据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 1959 年版译出

### 财产及其起源

〔法〕拉法格著

王子野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5.75 印张 141,000 字  
1962 年 4 月第 1 版 1978 年 5 月北京第 3 次印刷

书号 2002·160 定价 0.58 元





## 出版者說明

保尔·拉法格(1842—1911年),法国社会主义者,馬克思、恩格斯的学生和战友,法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和馬克思主义理論家。他从事革命的初期曾相信普魯东的无政府主义,后来認識馬克思之后才从无政府主义者轉变为馬克思主义者。

拉法格为了宣傳馬克思主义写过許多著作,涉及哲学、政治經济学、历史、語言、文艺等各方面的問題。他的主要著作除了本书之外还有《美国的托拉斯》、《解釋历史中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康德的唯心主义》、《卡尔·馬克思的經濟决定論》(本店出版的中譯本更名为《思想起源論》)。

本书第一篇《贊成共产主义和反对共产主义》是拉法格于1892年在巴黎同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敌人、“反社会主义联盟”的奠基人德莫連进行学术辯論时所作的演讲。在这篇演讲里,拉法格根据馬克思主义学說,扼要地叙述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实质及其同空想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拉法格以丰富的材料、充分的論据,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社会化和占有的私人性质这一根本矛盾,证明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最終地得到解决,而共产主义的胜利則是社会經济发展的必然規律。拉法格有力地駁斥了德莫連所謂社会的发展終將引向个人主义的謬說以及他对共产主义的捏造和攻击。

不过,拉法格这篇演讲中也存在着缺点和錯誤,例如沒有指出共产主义发展的两个阶段及其各自的特点,沒有談到无产階級革命和无产階級专政,以及无产階級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設中的作用

等問題。书中的个别的表达方式，例如“民族把生产資料交給有組織的工人”的說法是不正确的，这证明拉法格还没有摆脱无政府主义的工团主义的影响，因而忽视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經濟职能。拉法格在論述关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問題时，只是強調了采取和平手段的一种可能性，而没有指出准备革命的非和平手段的另一种可能性，即工人阶级为了回击资产阶级反革命暴力而被迫采取革命的暴力手段的可能性。拉法格正确地譴責了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殘酷镇压，而没有同时肯定工人阶级被迫采取的革命的暴力手段的正义性、必要性。

第二篇《财产及其起源》(法文原版的名称是《财产的起源和进化》)，是拉法格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探討财产的起源及其在人类社会各个阶段所发生的演变的一部重要著作。

拉法格首先研究了原始公社制，他用大量的事实材料证实了人类历史上的确存在过一段漫长的、根本不知道私有制为何物的时期，从而有力地駁倒了所謂私有财产“自古已然”的资产阶级理論。他說：“私有观念对于一切资产者是非常自然的，但它当初跑进人們的头脑却不那么容易。当人們开始思想时，恰恰相反，他們首先想到的是一切归大家”。

拉法格指出了在原始公有制的腹內如何形成新的生产关系和与之相适应的财产形式，以及它如何为私有制的出現准备了条件。拉法格认真地研究了所有制在氏族制度的不同阶段(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上的变化，但是他把封建主义的成立直接同原始公社的解体衔接起来，而对历史上第一种私有制——奴隶制順带一笔提过，没有作专章的論述，这不能不是一个缺点。

拉法格这部著作的結論部分对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制度的分析和批判特別精彩。他以尖刻的辛辣的笔鋒指出了資本形成的骯髒的和流血的道路，并对壟断资产阶级控制国家的經濟和政治生

活、企图奴役全世界人民的野心，作了有力的揭露。

拉法格愤怒地揭露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关于资本“民主化”的谎言。所谓“财产的民主化”，只不过是一种手段，就是要人们“从旧袜子里和藏钱的地窖中把一切货币资本统统发掘出来”并交给垄断组织，然后转入金融寡头之手。拉法格指出，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在一小撮金融家的手里日复一日地成为满足他们贪求无厌地追求暴利的驯服工具。

最后，他以“共产主义的复归”为题，证明“从史前期的简单的和粗糙的共产主义发展起来的人类社会，必将回复到复杂的、科学的共产主义”（本书第 163 页）；他坚信私有财产制度的消灭是不可避免的，人类终将生活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里。

## 目 次

赞成共产主义和反对共产主义 .....	1
财产及其起源 .....	27
第一章 现代财产的形式 .....	27
I. 财产形式的分类 .....	27
II. 个人用品的财产 .....	30
III. 劳动工具的财产 .....	32
IV. 资本财产 .....	33
V. 方法 .....	34
第二章 原始共产主义 .....	35
I. 个人财产的起源 .....	35
II. 氏族共产主义 .....	37
III. 公共住宅和食堂 .....	39
IV. 共产主义的风俗 .....	45
V. 土地的公有制 .....	51
VI. 劳动分工的起源 .....	53
VII. 土地的共同耕种 .....	54
VIII. 动产的公有制 .....	56
第三章 血族集产制 .....	59
I. 氏族分裂为母系氏族家庭和父系氏族家庭 .....	59
II. 血族集产制的财产 .....	63
III. 土地私有的起源 .....	67
IV. 正义和盗窃的起源 .....	69
V. 集产制的基本特点 .....	72
VI. 农民的公社 .....	77

VII. 集产制的分散 .....	82
第四章 封建财产 .....	86
I. 封建的組織 .....	86
II. 封建财产的起源 .....	89
III. 教堂财产的起源 .....	101
IV. 封建义务的性质 .....	105
V. 封建财产扩大的方法 .....	111
VI. 封建财产的限制 .....	114
VII. 关于 1789 年革命的神話 .....	116
第五章 资产阶级的财产 .....	123
I. 商业的起源 .....	123
II. 小工业和小私有的商业 .....	125
III. 工場手工业 .....	130
IV. 资本主义的农业 .....	134
V. 资本主义的工业和商业 .....	143
VI. 资本主义的金融 .....	149
VII. 资本主义的集产制 .....	160
VIII. 共产主义的复归 .....	163
注释 .....	170

# 贊成共产主义和反对共产主义

(拉法格和德莫連之間的学术辯論)

1892年5月21日

先生們和女士們！<sup>①</sup>

現在这个会的对象，实在說，不是辯論，而是对社会发展的两种对立的观点的簡要的敘述。德莫連認為我們的社會的发展将引到个人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說，引到它的极端的形式——分立主义<sup>1</sup>；而我們，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相反地以为經濟現象的发展必然會引到共产主义的重建，也就是引到生产資料的社会化，这社会化部分地已經实现，和引到使一切消費資料变成公共財產，这消費資料在現在則构成一个只是比較不大的階級的壟斷，恰恰由于这种經濟关系的发展，这个階級的人数日益减少。

我很滿意利用这个机会在这些与平日經常听我講演不同的公众面前發揮共产主义的理論。当在这里执行宣傳家的任务时，我想試一試投下一些社会主义思想和哲学思想的种子，并且力图征集到信从者。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来击破某些对共产主义者的責难。

我們的敌人責难我們宣傳凶杀和搶劫。你們自己将会判断这

---

<sup>①</sup> 拉法格和德莫連之間关于社会主义的学术辯論是在巴黎地理学会的大厅里举行的。能容千人的大厅被擠得水泄不通。那里坐滿了主要是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其中有許多是院士、教授、牧师和法学家。拉法格將要在这些享有特权的听众面前发表演說，他只能給自己的朋友——社会主义者送五十張入場券。

拉法格的演說悉照速記稿重印。——編者注

种宣傳同我們的理論是否能相容。

我們的敌人中有一部分比較客气，他們把我們看作烏托邦主义者、梦想家。他們對我們說：“对，你們所梦想的社会好得很；使平等在人与人之间占統治，这无疑是好的願望。但是你們不懂得人的本性，人的本性按其实質來說是傾向惡的。在你們着手改造人之前，先要改造社会。”

然而我們决不是烏托邦主义者，与政治家和慈善家<sup>2</sup>不同，我們不相信靠宗教的或世俗道德的宣傳有可能改造人。

为了使人变好，需要改变他們生活的环境。人自己創造了自己的社会环境，但是它又是环境的作品。当你改变环境时，你同时也在改变人的风俗、习惯、激情和感情。我們，烏托邦主义者、梦想家，研究社会环境，我們分析經濟現象：我們从萌芽状态中就抓住了它們，追踪它們的发展，观察它們对家庭、对政治制度的影响，然后决定既无畏惧也无成見地作出相应的結論。

經濟現象不仅影响风习，而且也影响家庭的和政治的制度，甚至影响人們的哲学的和宗教的观点。

这就是我認为有說服力的例子。在发展的某一阶段，当生产資料很不完善时，一切民族都有过奴隶制度。一切的人，甚至大智大勇的思想家都把奴隶制看作是正义的、自然的現象，而信仰宗教的人甚至把它归之于神的起源。

人类的偉大思想家之一亚里士多德<sup>3</sup>認为有可能作出这样的結論：自然界創造了专供奴役的人种之一。在这方面他的观点同聖經上关于世界創造的傳說相吻合，按照創世紀的傳說，含姆的后裔将为发源于挪亚的民族服役。但是这个希腊的哲学家至少預見到傳說所不知道的东西，他預見到生产过程的某种变革必然要引起奴隶制度的消灭。

这种观点在他的《政治》里是很明显的：“假如每一种工具都能

按照命令或者自发地执行指定給他們的工作任务，像底德洛斯的巧妙的創造那样自己会运动，或者像赫菲斯特的三脚供桌那样独立地举行宗教仪式，假如，比方織布的梭自己会織，那末这时候师傅既不需要助手，主人也不需要奴隶了。”

亞里士多德就是这样在承認奴隶制是自然的經濟現象的同时也英明地預見到生产方式的变革将引起奴隶制度的消灭。正因为这种經濟变革的实现，正因为大工业的机器自动地“举行宗教仪式”，正因为如此，我們共产主义者才确信雇佣劳动的制度，奴隶劳动的这种最后的和最坏的形式必然要灭亡。

## I

的确，在現时代机器掌握着整个工业部門，既包括原始的和简单的，也包括最发展的和复杂的。

制油在远古时候早已知道了，現在采用瑞典人拉瓦尔发明的机器来进行，它把剛剛从母牛的乳房中取出的奶变成油。人們借助透光鏡和化学制剂之力迫使太阳描画物像；它很快就会画上色彩。巴黎人吉洛 (Gillot) 找到一种不用刀和甚至不用画家的手参与的雕板方法；他只使用油質的墨水和硝酸。雕板是靠太阳和电之力来实现的。甚至还发明了计算机，它成为可以信賴的数学家。我本来还可以列举出各种各样的工业部門，并指給你們看，所有它們都被机械化触动了。

使用机器的結果又是如何呢？

机器的采用使个人主义的工业变成共产主义的。我来比較詳細地解釋这点。从前在每一家中紡綫和編織，并在每一乡村中都有自己的織工。这些工业部門分散在全国，現在則集中在一定的地点，那里用机器来編、織和紡，以供应共同的需要。

織布机和紡紗机在大型的紡織工厂里都“社会化了”。



制成品失去了自己的个人主义的性质。在小生产时代皮鞋匠包管制成一双鞋的全部工作：他亲自量尺寸，做鞋底，剪皮和缝它。鞋或便鞋是完全地个人主义的产品，因为一个人就足以完成它的制作。可是在鞋工厂里的工作却要通过许多手。一个工人剪皮，另一个在机器上磨光皮靴筒，第三个填满鞋底，装上鞋后跟等等。一双鞋是相当数目的生产者的共同的工作。个人主义的生产变成共产主义的<sup>①</sup>。

这种共产主义的变革也见之于商业。在过去的世纪每个小铺子都有自己的特定的商品，按照行会规章，它应当严格地限制在这种商品上。呢绒商在自己的铺子里只能出售呢绒，正如刀铺只能卖刀一样。

现在你在“鲁佛”，在“邦马舍”或在其它的百货商店里可以找到用途正好相反的各种各样的物品，它们集中在一起，在同一资本的管理下“社会化了”。在英国商业中的这种共产主义普及的规模还要大。舒尔不来德商行出卖一切需要品，为了便利人们取得衣服、食品和住的房子。伦敦的大消费股份公司除此以外还有医药商品，这就使得健康的人和病人都能在那里买到所需的一切。

工业集中的影响在农村里也明显可以看出。小的分地“社会化了”而构成大地产。我知道你们是不会同意我的，你们打算拿法国土地分散和分散得一天比一天更甚这个事实来反驳我。就算是这样罢，然而这无论如何没有妨碍大的土地财产的形成，农村人口减少的这一事实足资佐证。凡是打算丢掉自己祖先的土地而投入工业城市的农民都把自己的一块土地出卖给大的土地所有者。在最近的时期，谢尔梅尔-拉库尔<sup>4</sup> 依据官方的、谁也驳不倒的统计材料在上议院宣称法国全部可耕地的45%是握在142,000个

<sup>①</sup> 拉法格在这里以及在某些其它地方的术语有可能引起混乱。其实这不是共产主义的生产，而是由于劳动分工形成的集体的资本主义的生产。——编者注

大的土地所有者的手里。因此，在我們面前也摆着土地已經相当社会化的例子。

現在在法国所完成的过程在英国早已結束；那里全部土地是握在几千个人的手里。所有文明化了的民族都要被卷进这个集中的过程。英国也曾經有过自己的小农；还在十九世紀之初，威尔士的土地是在相当数目的小自耕农（所謂yeomen）的手里，他們逐漸消灭了，让位于为数不多的大的所有者。

封建的領地在自己的时代是非常寬广的，但是土地的耕种是个人进行的。土地被分成許多小块的租田，由农奴的或自由农民的家庭来进行耕作。現时代的情形却大不相同了，只要哪里存在着大地产，那里就建立起大規模的耕作土地的共产主义的制度。为了要看一看这种制度已达到多么高的发展程度，需要横渡大西洋到美国遙远的西部去；小麦田綿亘数公里，那里是靠机器耕种。

先生們，我們还应当来看一看第四种的集中形式——金融的集中，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

当工业还是个体的时候，它只需要很少的一点資本就能买到工具，因为生产工具是很簡陋的；为要紡紗，只需要有紡車和紡錘就行了。每个生产者收集了一点小小的資本就能成为老板，靠家庭、几个学徒和艺徒独立地进行工作。这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在大的机器生产发达之前，工人可能梦想独立經營，这些梦也經常实现。而現在这些梦却成了烏托邦。

現代工业的生产工具是这么大，为要取得它必須握有不是几百法郎，而是几十万和几百万法郎。我們的世紀，特别是它的后半期，在法国造成了一种特殊的阶级，这个阶级的人們从事一种專門結集小資本为大資本的职业，使它們“社会化”，目的是使大工业有資金修筑铁路，开采矿山，建立織布工厂和紡紗工厂，修建高炉等等。我很知道，照那些官方的經濟学者的看法，大的工业企业的資

本分成股票和証券好像是財產的分散，它的民主化。但是他們沒有注意到財產的這種民主化使得金融家有可能從所有的舊長統襪子里和秘藏的保險箱中把貯蓄統統搜刮出來，把它們抓在自己手里，實行壟斷管理，一直到他們使用狡猾的勾當完全占有貨幣才肯罷休。因此在我們的日子裡形成了數以幾億和幾十億計的大量的貨幣財產。大工業企業和大商業企業的這種財產的分散和分開只引起一個後果，就是居民群眾為了幾個金融大亨的利益而失掉了自己的資本。

由此你們可以看到，生產和交換過程都取了共產主義的形式。個體的生產和交換的這種改造是經濟現象發展的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結果；它的完成並不管人們的意志甚至違反它。什麼也不能停止這個進化的進程，什麼也不能阻止它所要達到的最後的結果。生產資料的日益加强的社會化必然地和不可避免地要引到消費資料的社會化。

但是在現在生產和交換已經是共產主義的了，而占有形式却仍然是個人的。

對這個我要解釋一下。大的生產資料，例如製造廠、工廠、鐵路和百貨商店，像“魯佛”和“邦馬舍”，虽然是共產主義的組織，却構成一個人或幾個人，或股票小組或証券持有者的私有財產。占有仍然是個人的，像過去時候一樣，那時工業和商業曾按照自己的不大的規模採取了個體的形式。在這裡包含着矛盾，或者用黑格爾<sup>5</sup>的話來說，共產主義的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與個人主義的占有方式之間的二律背反<sup>6</sup>和反題<sup>7</sup>。正因為存在着這種對立性，存在着痛苦和貧困，因此社會推向危機，靠危機來解決對立性。

經濟現象的必然的、不可避免的發展會引起生產和交換的共產主義組織的後果。而這發展本身又創造了解決生產和交換的共產主義方式和占有的個人主義方式之間的矛盾的手段。換句話

說，經濟的發展，一面使生產資料和交換資料“共產主義化”(恕我用了個新名詞)，同時也準備着消費資料的共產主義化。

我的第二個任務將是指出未來的革命的因子的存在，這個革命將引到一切生產資料和交換資料的社會化。

## II

生產資料社會化的第一個和最積極的結果乃是人們的生產力巨大的增長。

現在人的或社會的需要沒有不能滿足的，不僅能滿足，而且甚至有多餘。

這就是證明。在本世紀的後半期為了修鐵路、造輪船和為了發展工業和農業的機械工具，產生了对鋼鐵的空前需要。于是就進行了緊張的工作；需要雖然得到滿足，可是日復一日地發生了鐵的生產過剩，它引起了周期性的危機，這時因為生產太多，以致銷路停滯和需要停止。而在这五十年中終究裝配了这么多的機器和鐵的建築物，鋪了这么多的鋼軌，致使地球的外殼好像被鐵包了起來。假如把所有的機器，所有的鋼軌，所有生產出來的鐵堆成堆，那末就會形成一座比喜馬拉雅山還要高的山。這是共產主義的生產方式的奇蹟之一。

還有另外的證明。獲得足夠數量的麥子是使社會有可能存在的第一個條件。這問題已解決了，甚至還有多餘：在那些土地集中并使用機械工具和科學方法耕作的省份，每一公頃的產量達到25—30海克托利特(百公升)，甚至還要多；而平均產量只達到15，而在有些年景却降到13、12和甚至11海克托利特。假如土地的共產主義耕種不限于東北部的幾個省份，而是普遍采用，則法國將收穫二億到三億海克托利特，而不是現在每年的收穫量一億多海克托利特。不久以前一個美國的農學家公布了哈得遜灣以西開發

的新的土地的記載。他指出，假如这些肥美无比的土地也照遥远的西部的农場那样組織起来一百万工人，配上机械化的工具去耕种，不必使用肥料，那末在几年之内就可以达到生产足供全球人口所需数量的谷物；其余的土地就可休耕以恢复其原来的肥沃。

我举了鉄和麦这两种最必需的物品来作例証；我还可以接二连三地列举出全部的生产品并且向你們指出生产到处都达到这样大的規模，远远超过了需要。如今工厂主所关心的已不是如何生产，而是如何找寻消費者；他們到亚洲，到非洲去找，甚至准备到魔鬼那里去找。

在十六和十七世紀欧洲各民族相互爭殖民地；他們掠夺殖民地，輸出皮貨、香料、貴重木材和五金。在十九世紀爭殖民地还是繼續进行着，但是現在所爭的是向殖民地推銷从生产者手里搶来的商品；掠夺，这是資本主义社会的本質。

生产品的这种丰裕，甚至是过度的丰裕，在以前的时代是想像都想不到的，本来应当使一切生产者享受富裕的后果；然而事实上它却使他們变穷。只因为商店里的商品充滿貨架，失业便来光临，使飢餓成为工人住宅的經常客人；許多人餓死就因为生产品生产得太多了。在中世紀只在歉收之年飢餓曾减少人口。現代的貧乏則由丰裕而引起。

这种显明的荒唐事实促使工人傾向革命，它是以上所講的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同个人主义的占有方式之間的矛盾的結果。生产者处于經常的貧乏的境况，是因为資本家日复一日地把他們的劳动果实侵占去了。

劳动产品的这种占有使整个社会变成一个奇怪的市場，在那里一切都能出賣——不仅是人們劳动的成果，而且也包括人本身。工人之所以能出賣是因为筋力，智力工作者之所以能出賣是因为有知識——工程师、化学家、农学家掌握了組織和管理企业的力量。

共产主义的生产同个人主义的占有之间的矛盾贬低了人的身价，使它成为商品，我再重复說一遍，并且使整个社会变成一个大規模的商店。

“从小商店里还能找出什么好东西？”——西塞罗<sup>8</sup> 在自己的《論义务》一文中說道，他用这句话来表达他那时代的意見，整个古代世界以及一切不是建立在商业和資本主义生产之上的社会的意見。

“从小商店中还能找出什么好东西和商业能否产生誠实的人？凡是称为商业的一切，都不值得誠实的人去做；商人若不欺騙便会一无所得，还有什么东西比撒謊更可耻呢？因此应当把那些出卖自己的劳动和自己的手艺的人的职业看得低一等和不体面的；因为那些为錢而出卖劳动的人是在出卖自己和站上了同奴隶一般高的等級。”（大厅里响起了不贊成的喊声）

这最后的几句话曾經引起希腊人和英雄时代的罗马人的热烈的贊同，但是在你們中間却激起了不滿。然而，能否举出比出卖自己的手力和自己的腦力更能說明人的受屈辱的例子呢！

这种对每一个斯巴达人和罗马人都是屈辱的行为在我們的資本主义社会里却成了生产者的唯一的出路。雇佣劳动的制度就是奴隶制形式之一种。

唉！西塞罗是对的，商店只是引到撒謊。在資本主义社会所代表的这个大商店中一切都是虛伪的。

拿生产品來說罢，它們都是伪造的、摻假的。

如此光荣的資本主义的文明将只留下追求外表浮华的世紀的名字。現在已不满足于自然的物品的伪造，甚至再搞假貨的伪造。人造牛奶本是油的造假，現在又在造假貨。

但不是一些东西是虛伪的，虛伪不仅在物質的領域而且在道德的領域也占統治地位。看来任何时代也沒有見過这么多的社会

虛偽，可以說全部的道德和全部的政治都是一片接連不斷的虛偽。我不可能列舉出上層階級的高貴代表人物所慣常使用的全部虛偽的形式。我只從其中選擇幾種同我的題目有關的來講一講。

財產是社會的基礎，人們經常這麼講。保住“私有財產”成為統治階級永遠關心的事情。從其為金子而獻身這一面來看，經濟學家就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秩序與和諧大加贊美。這一切都是虛偽！

在哪一個社會里也沒有過這麼大的不協調和矛盾。不斷的、无情的內戰在這個和諧的資本主義社會里肆意猖獗。只要有兩個商人出賣同一種商品，只要有兩個工廠主生產同一類產品，難道不是經常處於敵對狀態嗎？其中的每一個不都是拿出全力企圖從自己的同行的手里把購買者勾引過來，把自己的同行排出市場，使他破產，變成窮光蛋嗎？

這個戰爭稱為競爭。這就是霍布士<sup>9</sup>的確定不移的邏輯所說的“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在中世紀封建男爵也是互相敵對的，也進行戰爭，只是有時為休戰所中斷；但是這些戰爭是用利劍和槍矛來進行的；它們在封建男爵身上發展了肉體的和道德的品質（勇敢、責任感、忠實於諾言、忠實於力量、對困難、強烈的疲勞、惡劣的天氣的忍受能力），使得人的肉體和精神都高尚起來。現在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占優勢的情欲是追求暴利，對不勞而獲的財富的無厭的貪求。經濟競爭在人的靈魂里只發展了鉤心斗角、耍滑頭、弄虛作假、貪得無厭、利己主義的能力。只要我能發財，讓社會、祖國、人類破滅吧！——這就是資本主義的口號。

資本家的經濟戰爭也同封建主的軍事火併達到同樣的結果：財產的集中。封建男爵把被擊敗者的土地和農奴歸併於自己的領地。資本家則奪取破產了的競爭敵手的工廠和顧客。

大資本剝削小資本；小的土地財產每天都在消失，讓位給大的

地產。因此建立在私有財產之上的這個社會本身破壞了小的財產而只留下大的。

在1789年革命時期，資產階級曾以人權保衛者和反對非正義的戰士的姿態出現：它宣傳將要實現平等、自由、博愛。這些話都寫進了憲法，甚至在監獄的牆上也能讀到，但是任何地方也沒有實現過。自由、平等和博愛，這是資產階級扯謊的三個主要的形式。

進步的倡導者曾經許諾說，現在還在說，機器一定會減輕人的勞動。又一次可恥的扯謊！在資本主義的社會里機器技術的成功反而增加勞動。革命前夜工是被禁止的，在現時的資本主義工廠里，男人、婦女甚至兒童都在日夜工作，這是真正的苦役。

在十八世紀國家和教堂曾保護過工人；他們規定了一年中有一定數目的休息日——52個星期日和40個節日，還不算地方的和行會的節日。那時稍微找到一點理由就可以玩樂一番，那時不乏沒有空閒的時間來花天酒地和借神聖的懶惰之名來吃喝玩樂。在我們的世紀這樣的時間誰都沒有了，因為一星期必須勞動七天。信奉天主教的主人忘記了甚至全能的上帝也感到在六天勞動之後必須休息。

家庭！這是牢不可破的神聖的社會柱石之一！它曾受過多少人的贊美啊！工廠主、金融家、道德家、政治家，假如聽一聽他們講什麼，他們全都只想到如何保存家庭，發展它和使它更完美。可惜事實恰恰相反！資本主義的社會瓦解和破壞家庭。工廠使婦女和兒童脫離家庭的爐灶，它從吃奶的嬰兒身邊奪去了母親，從丈夫那里奪去了妻子；鐵路管理局和金融機關完成這個掠奪。婦女失去當家庭主婦的資格達到這樣的程度，如在工業區的年輕女子在工廠里勞動和已經當了母親，但是她既不懂得用針，也不會用鍋。

慈善家常常總是用花言巧語來掩蓋工人階級的愈來愈惡劣的狀況，據他們說，婦女和兒童在資本主義的苦役之下勞動只是促進



家庭命运的改善，增加它的工資收入。扯謊，又一次可耻的扯謊！婦女之所以注定要从事强制的工业劳动，其目的只是为了有可能降低家长的工資，而儿童之所以碰到同样的命运是为了减少母亲的工資。慈善的資本家就給家庭內部带进了糾紛和竞争：他們迫使父亲、母亲和儿童爭着出賣自己的劳动。

在个人主义的工业时期，家庭是靠父亲的劳动养活；在資本主义的工业中母亲和儿童不仅用自己的劳动来帮助維持家庭，而且常常是父亲靠她們的工資生活。在美国有些工业城市，那里婦女的劳动比男人的劳动要好得多，因此男人留在家裡照看儿童和做饭。这些城市称为“she-towns”，即婦女之城。

婦女遭到比男人更大的痛苦。但是工业劳动，为社会的劳动，現在是这样压迫她們，以后将解脫她們在家庭中的从属地位，其程度远远超过羅馬国家衰落时期拿嫁妝来解放女貴族的风俗。

脫離了家务劳动并且同男人平等地参加社会劳动，婦女將有权，而且甚至有义务从事政治活动和参加社会主义的运动。我們將为她們开放通向我們的队伍的道路。在工人的政党里，她們可以担任一切适合她們的能力的职务，而在共产主义的社会中她們將重新取得从父系家庭代替母系家庭时起便失掉了的全部自己的公民权。

解脫了家庭的从属地位和男人的道德的压迫，婦女便有可能自由发展全部自己的肉体能力和精神能力。这时她們將重新發揮过去在人类生活初期曾經起过的那种首創者的偉大作用，这种作用曾保存在古代傳說和原始宗教神話的回忆里。

实际上，在印度、埃及、小亞細亞、希腊，在这些人类文化的搖籃里，艺术和手工艺的发明都归功于女神而不归功于神。根据这些神話傳說可以設想婦女的头脑比男人的头脑发达更早。难道我們今天沒有注意小女孩比小男孩更活潑和更聰明嗎？假如后来她

們喪失掉這些優點，那末這就得完全歸罪于德、智、體三種教育制度的不良，多少世紀以來她們早就被剝奪了受教育之權。資本主義的偽學者說：“婦女是低劣的人”；但是，活見鬼，這是因為從小就不許她們有發展的機會。假如兔子的四條腿都被捆起來，牠就會比烏龜跑得慢。

我們的世紀是勞動的世紀。光榮歸于勞動，智慧和知識受獎，人們都這麼告訴我們。這還是扯謊。

小工業的勞動者是手工業者，他兼做體力的和腦力的勞動。例如細木匠親自描畫所需制作的物件的圖樣；他在動手做之前頭腦里先已有了式樣。手要服從他的腦子的命令。現在在機械生產里的情况是否也如此呢？現在工人的思想無事可做；像機器的輪子一樣，他只是機器整體的一部分，機械替他想。資本主義的生產把工人降為機器的簡單的僕役。

腦力勞動者的命運並不更為誘人。既然從事體力勞動的工人群眾只是生產的機器的輪子，那末就需要創造一批優秀的勞動者，以便從事發明、思考、管理；需要智力勞動者，許他們擔任經理、管理員、技師、工程師、化學家、農學家等等的職務。假如知識和智慧受獎是對的話，那末在資本主義社會里的第一把交椅就得歸于這些擔負生產中的全部腦力工作的勞動者，像在宗教壟斷科學時代古代神權國家<sup>10</sup>的這把交椅是歸于祭司一樣。

然而這些從事腦力勞動的人們也同那些體力勞動者一樣屈從于資本主義的帶侮辱性的桎梏之下。這只是一些工資收入微薄的雇工；他們耗盡和絞干腦汁為了使大資本家發財，而大資本家絲毫用不着努力去獲得知識，因為每月出 150—200 法郎就可以在市場上找到化學家、工程師、農學家。人們學會了把一切東西都生產得綽有裕餘，從短襪一直到知識分子。製造化學家和電工技師多得像菜園種植者栽種胡蘿卜一樣，因此他們的价格便大大低落。貶低

知識和智慧這就是資本主義所做的一切，為的是表示對腦力勞動者的尊敬和給予他們應得的獎勵。

### III

讓我們來看看事情的另一方面。

我向你們表明的只是全部體力勞動者和腦力勞動者在共產主義地集中化了的生產中的痛苦，這是少數資本家占統治的結果。

但是這種生產資料和社會財富的壟斷對於資本家業主的精神的和道德的發展是否發生過良好的影響？是否同他們所受到的尊敬和他們所享受的快樂，他們對社會的功勞相適合？

在個人主義的工業中業主是真正有用的人。他靠自己家庭、幾個學徒和藝徒的幫助從事生產。假如他生了病或者沉湎於放蕩的生活，那末他的事業就會破產，因為他是自己的作坊或小鋪子的主要的動力。

在共產主義的生產中真正的主人消失了。試把糖廠、鐵道、礦山或冶金工廠的業主找出來看看！你們在工作的車間里，在收利息和股息的出納處的小窗口都找不到他。業主住的地点遠遠離開那使他們成為百萬豪富的勞動，他們住在巴黎、柏林、北京，假如他們認為作為財產主有必要提供效勞，那末他們也可以很順利地住在盧昂。

在生產和交換資料集中的發展的第一個時期，財產主還擔負着監察人和主管人的有用的職務。但是自從集中終結之時起，這些職務就由別人代替，而在個人主義工業時代監視一切的主人的“眼睛”就不再管自己的任務了。

自從資本主義的財產採取股份公司這種最發達的形式之時起，業主變成無用之物表現得特別明顯。而既然成為無用的，他就是有害的了。不是我故意危言聳聽，這是法蘭西學院通訊院士，著

名的經濟學家，一家大的經濟雜誌的領導人莫利納里<sup>11</sup>先生的意見。他在1880年出版的《經濟的進化》一書中這樣寫道：

“具有股份公司形式的企業的管理處可能只占有一小部分資本。一般情況之下它可能完全不占有資本，與多數人的看法相反，從管好公司事業的觀點來說，這種狀況反而是最好的，正因為管理處沒有股票，便沒有權控制自己。對於它只要掌握着自己的職務所需要的能力、知識、道德品質就足夠了——雖然如此，在市場上離開資本的情況比同它發生聯繫的情況遠遠要頻繁得多。”

莫利納里先生僅僅講出事實，但是必須向他致謝，因為他不怕說出官方經濟學家竭力想用一堆空洞而庸俗的話詞來加以掩蓋的真理。

資本主義的業主在生產中已不再起什麼作用了。當工商業的共產主義體系剝奪了他們一切有用的職能的時候，它同時也就宣判了資本家階級的死刑。貴族階級的命運正在等待着他們。

歷史在重演：在貴族階級的發展中可以看出同資本家階級的發展有許多類似之處。當封建的男爵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和還有用處的時候，貴族階級不會被消滅，像1789年<sup>12</sup>所作那樣。事實上，貴族階級當時是自己的農奴和家臣的庇護者，保護他們對付周圍的敵人，封建主是歐洲國家的民兵軍。但是自從騎士取下盔甲並披上宮廷衣服，用優美的細長的佩劍來代替笨重的戰鬥的利劍之日起，自從封建男爵變成為凡爾賽的宮內官，投身在皇帝的和大主教的宮廷之內生活之日起，便宣判了貴族階級的死刑。社會革命以命定的必然性將結束資本主義的紀元，將執行經濟現象所帶給資本家階級的死刑。

我利用這個機會來宣布，依照我的深刻的信念，我們不會看到那使資產階級革命蒙受恥辱的流血的農神節重來。無產階級不像資產階級那樣殘忍。（大廳里一片呼喊之聲）

在十八世紀資產階級的革命者互相殘殺，依次消滅革命的保衛者，致使自己的偉大事業受到威脅。而每一次，當無產階級在這世紀起來要求自己的權利和自己在太陽底下的位置的時候，他們的運動總是遭到最殘酷的鎮壓。在1848年和1871年資產階級使二萬和三萬個屍體蓋滿巴黎的街道<sup>13</sup>。然而，你們只要回想一下就能記得巴黎在無產階級當權的兩個月裡面，那些人質的頭上連一根頭髮也沒有落下。（大廳里發出大聲的抗議）只是在戰鬥的最後一些日子裡……（大廳里有嘈雜的聲音）主席：先生們，詛演說的人講下去。

拉法格：只是在戰爭的最後一些日子裡，當人民由於自己失敗和反動將軍們的駭人聽聞的罪行而幾乎被引到瘋狂的時候，只是那個時候才處決了人質。（大廳里一片呼喊之聲）但是在兩個月中間，這是歷史事實，統治巴黎的無產階級沒有觸動人質頭上的一根頭髮，然而在這時候公社的被俘的將軍卻被陰險地殺死。（嘈雜和喊叫之聲再起）

主席：不要打斷，先生們。德莫連回答。

拉法格：我想着重指出，這個社會變革的一般輪廓我們已經可以預見，這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它將沒有過去革命的血腥的性質，只有資產階級的殘忍成性才犯這種罪。

#### IV

經濟現象使生產者失去他們的勞動工具，它把這些工具集中起來和使之社會化，又把以前分散在各鄉村營獨立生活的工人集中在工業城市裡，把他們結合在公共的工場裡。

這裡他們最後地擺脫了小所有者的本能，這種本能可能保留在他們對以前的個體財產的回忆裡。在工人的面前永遠站着複雜機器的奇怪的輪子，他們必須在它的旁邊工作，他們於是本能地開

始意識到这里只能是公有財產。機器生產從無產階級的頭腦里把一切個體財產的思想都趕跑，而又把公有財產的觀念放進去。

這個精神革命的完成並沒有共產主義者的參加。它是在資產階級管理之下組織起來的機器生產的結果。共產主義的觀念早就以隱蔽的狀態存在僱傭工人的頭腦裏面了。共產主義的鼓動家只不過喚醒這些觀念和使它實現。

由於資產階級把無產階級集中起來和把他們的勞動結合起來，社會主義的宣傳就獲得了巨大的力量。資產階級不僅準備了思想，而且還提供了影響思想的手段。在工業城市里我們可以找到結合起來的、準備熱烈地歡迎共產主義思想的工人羣眾；我們不是把這些思想從外面帶進去，而是從那戲弄和折磨工人的經濟現象中引出來。

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在生產要求的影響之下使無產階級羣眾容易接受共產主義的鼓動，它還給我們提供手段去喚起這些羣眾，把他們從政治上組織起來和準備即將到來的革命行動。

資產階級奪得了政治統治之後就想把它獨占起來。他們實行有限制的選舉法，想排除沒有財產的階級參加國家管理，無論在法國、在英國、在德國和在荷蘭，到處都是一樣。但是幾乎在一切號稱資本主義文明的國家里它很快地就不得不作讓步並且或遲或早地同意普選法。

這麼一來，資產階級本身便被迫把這付危險的武器交給僱傭勞動者之手。然而，這付兩面鋒利的武器一直到现在只是給尚未學會使用的工人階級帶來創傷。從1848年起在我們法國就已存在普選法，而國會的大多數總是由資本家或資本主義利益的保護者組成。工人選舉資本家充當自己的代表；他們把保護自己的利益這件事委託給凶惡的敵人。雖然有普選法，政府還是像在有限制的選舉法時一樣是握在有產階級的手裏，政府所發布的法令只

是为了保护财产的利益。(大厅里响起嘈杂和呼喊之声)你们反对吗?难道使每年食品的价值提高到十亿的关税率的规定不是为了增加地租这个唯一的目的吗?

然而社会党人逐渐把工人阶级的教育抓在自己手里,他们教它正确使用普选法,而工人也已经表明能够运用共产主义者的教导。在最近的市政选举中,我所属的工人政党参加了七十七个城市的竞选,提出里昂纲领。在二十七七个康敏(commune)<sup>14</sup>中,我们获得了胜利,在那里面现在的多数,而其中的一部分甚至整个议会都是由我们的人组成。在其余的里面我们就形成显明的少数。只在选举第一轮中投给我们的票数便达到102,000张。这已是取得康敏管理权的第一步。

工人阶级(我们不仅用这个词来表示体力劳动者,而且也包括脑力劳动者,因为后者也是受雇佣的工作人员)被召来不仅为了创造产品,而且还要管理生产。在现代这是唯一有用的阶级。为了执行自己的社会职能它只是还缺乏领导民族的政治利益的能力。社会党人逐渐掌握在手的康敏议会正在变为训练人们学会管理国家的学校。(大厅里喊声大作)

掌握了地方政权和全国政权之后,无产阶级将按照资产阶级在前一世纪所作的范例行事。继续排除资本家不许参加政权之后便是经济上的剥夺。以上我所讲的生产的共产主义组织同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的个人主义的占有之间的矛盾将得到解决——无产阶级将使资本主义的财产社会化了。这么一来,便建立了不仅是生产资料,而且是消费物品的社会化。

既然机器生产使生产力发展到这么高的程度,以致有可能生产出为满足人们正常需要的一切必需品,甚至还有富裕,于是这才实现普遍的繁荣昌盛,并且在世界上不再有贫困者,这将违反特权阶级的道德家和政治家永久地重复和套用的基督的话。

你們可以看到，先生們，我不是在捏造。我不要求社會運動是  
靠感情或正義和平等的絕對觀念來作指導。我只是研究在我們眼  
前發展着的現象，並給你們指出它進一步發展的趨勢。

我指給你們看經濟機體如何逐漸地獲得共產主義的性質，同  
時占有形式又如何仍然是個人主義的；個人財產的性質如何起變  
化，集中如何發生，家庭如何被破壞和如何在富裕中產生貧困，以  
前的勞動條件如何起變化，同時體力活動又如何同腦力活動分開  
而形成兩種僱傭勞動者；資本主義的財產主人如何由於它的階級  
的優越地位不再能用它的個人的和社會的效勞來補償，因而成為  
多餘之物；僱傭勞動者如何集聚在工業城市里；如何從他們的頭腦  
中驅出個人財產的最後本能；如何從他們身上產生出共產主義思  
想的萌芽，訓練他們進行社會主義的鼓動，利用選舉法和奪取康敏  
的政權和全國的政權，其結果將實現資本主義階級的個人主義的  
財產向全民族的公有財產的過渡。

難道這是捏造嗎？認為這是對待事物的清醒觀點難道有什麼  
不對呢？當我們幫助工人群眾準備擔起革命的天職，他們受召執  
行這個天職是為了全人類的幸福的時候，難道這是宣傳凶殺和搶  
劫嗎？

經濟現象——這才是真正的禍首，改變着人們的一切習慣、破  
壞着社會的永久的柱石的嚴厲的革命者。我們，馬克思和恩格斯  
派的共產主義者，只是經濟現象的表達者。像海鳥一樣，牠的出現  
是風暴即將來臨的標志，我們向統治階級預告可怕的暴風雨就要  
來了，它將消滅他們的一切特權，然而可不是我們引起來的。

這個社會革命改革社會也要付出點痛苦的代價，但比起資本  
主義統治下生產過剩的周期危機所帶來的痛苦却要少得多。當由



此而得到改造的社会里将建立起秩序与财富的创造和平均分配中的和谐，那时，机器这个曾经掌握在有产阶级手里的最可怕的压迫的工具，将成为人类的解放者。那时将证实亚里士多德的强大的天才的预言的正确，奴隶劳动的结束就要到来。

\* \* \*

在拉法格之后是德莫连讲话。可是他并不想反驳拉法格的演说，而只限于阐述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理論。

但是既然他至少必须说到共产主义和宣传个人主义是未来的学说，于是他就急急忙忙地仿照沉思的和全知的胡伯特·斯宾塞<sup>15</sup>的范例把共产主义同官僚主义的管理 (fonctionnarisme) 混为一谈。一经走上这条道路，他就到处发现共产主义者。深居宫廷的贵族是共产主义者；资产者害怕工商业的危险而宁愿担任安静的国家职务，因此也是共产主义者。这样来提醒这些资产者小心谨慎，以免碰到贵族阶级的命运。

按照德莫连的意见，共产主义比什么都坏，它使人们冷漠无情，妨碍个性的发展和使人的能力衰退。不久以前人们都在说懒惰的 (l'indolent) 东方，那里一切部落都是按共产主义的方式组织的。共产主义，这是游牧部落的社会组织；不需要人的劳动参加而能自己生长的正是草；草就是共产主义的象征。

相反地，那些在人类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有文化的民族都是个人主义的。征服过旧世界的罗马人是这样，使新世界变成殖民地的盎格鲁萨克逊人也是这样；盎格鲁萨克逊人开始时也属于拉丁语系的民族，但是他们不能保留这个民族，由于这个民族有共产主义的趋向和经常指望国家帮助的习惯。

因此，共产主义，如德莫连所说，这是社会构造的低级形式，只适合亚洲高原的野蛮部落。相反地，个人主义是高级的社会形式，只是先进的民族才能有。假如说拉丁系诸民族没有能跳出自己的

冷漠无情的状态和不能不靠国家的帮助而开始行动，那末盎格魯薩克遜种族就达到个人主义的发展的高级阶段，全世界都将属于它。

## 公民保尔·拉法格的回答

主席：拉法格先生请求允许说几句话来回答德莫连先生。没有反对的吧？（大厅里：没有，没有！）请拉法格先生讲话。

拉法格：先生们，我将说得很简短，因为德莫连把我的任务简化了。他攻击国家，而这个也恰恰是我们所攻击的。（笑声，鼓掌）我们想消灭它。我们认为国家只起资本主义支柱的作用。假如国家不给资本家提供警察、军队、法庭和狱吏来保护他们，那末人数这么少的一个阶级只要工人第一次暴动就会把它消灭。（鼓掌）回想一下历史你就会看到，国家是特权阶级的压迫的和压榨的力量，国家政权的夺取常常保证某一阶级的社会统治权。

在旧的法国国家是属于贵族阶层，它的最高表现是国王，国家保卫贵族阶级的利益。自从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之日起，它就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现在则受着国家的保护。（鼓掌）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将没有特权的阶级。那里只有劳动者，享有平等权利和平等义务的人们。因此那里不需要国家，因为在这里没有需要保护的阶级，而每一个人应当都会保护自己，（大厅里发出赞叹声和笑声）因为一切人都是平等的，我可以补充一句，没有一个人会想到损人利己的事。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不仅特权阶级损害劳动阶级，而且这个阶级的每个成员也在互相损害。

我已经向你们指出，在我们现代的社会里统治着经常的战争——工厂主反对工厂主，商人反对商人，一部分人的繁荣是建筑在另一部分人的不幸上面。例如医生就需要有流行性的感冒和肺

務才能掙錢吃飯。在與我們今天不同的那個社會里，個人的利益不是處於彼此沖突的狀態，不需要保護，因為人們不是彼此敵對的。

德莫連先生剛剛說到共產主義社會並告訴我們說草是一切共產主義社會的基礎。請允許我提醒你們注意，在墨西哥存在過大型的共產主義社會，並不像在亞洲高原上游牧的小型共產主義部落那樣擁有畜群。在秘魯存在過奇怪的共產主義國家<sup>16</sup>，對一切從秘魯的破壞者——征服者的有關記載上研究過秘魯的人們都引起正當的驚異。在那裡唯一的吃草的動物是美洲駝，並且這種動物傳播的數目非常之少，因而受到加意保護。由此可知，草不是共產主義的必要的前提。這種財產形式在一切民族中都存在過，正如現在正經歷着解体過程的父系家庭一樣。亞洲高原的居民也好，不列顛半島的居民也好，同樣都是從共產主義開始。英國的農學家馬歇爾，他在上世紀末寫過書而梅因<sup>17</sup>在自己的著作《東方和西方的農村公社》內又加以引用，提到某些同俄國的“米爾”完全相似的不列顛農民的組織。到達北美海岸的第一批移民是組織在農村公社之內的。我所講的事實是根據梅因的著作，在這個問題上他算得一個權威。

存在着一種情況，不能默不作聲地繞過去，對此我請你們特別加以注意，因為從哲學觀點來看它也是很有趣味的。梅因，曾擔任過英國在印度的政府的法律顧問，據他對印度的農村公社的詳細研究，認為那裡沒有像我們所講的正義、權利和義務這樣的觀念<sup>①</sup>。

① 這是從梅因書中摘出的有關部分的譯文：

“就法律意義來說在印度的公社里既不存在權利，也不存在義務。遭難的人感到痛心的不是他所受到的損失，而是這個小小的社會秩序的破壞”。

這個意見証實了洛克<sup>18</sup>在十七世紀就說過的天才的思想，這就是認為正義的觀念只是由於實行私有財產的結果才在人類社會里出現。一旦恢復公有財產和只留下原始的報復法，它就會消失，這種報復法由於各種不同的民族和種族的人們所依以生活的和平與友誼的條件而大大緩和。——拉法格注

为什么？因为在公社里没有对立的利益，换言之，一个人所受到的损害反映在全公社的利益上，而既然利益是共同的，不是互相矛盾的，像在我们的社会里一样，因此就既不需要政权，也不需要官吏来保护部分的利益。

显然地你们都把共产主义认为是官吏的组织，而你们认为官吏只是国家的。但是在巨大的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如铁道、银行、矿山、百货公司里难道不也充满官吏吗？

无论在哪里，在商店里，在银行里或是在部里，工作摧残和钝钝人的个性，到处都一样，可以写满一张纸。但是为国家服务至少工资待遇比在工商企业里服务要好些。因此争取为国家服务的风气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很流行。在英国人们发疯似的追求爵位，争相以职务自夸，沾沾自喜地在名片上印着“财政和邮政部职员”，像其它国家常印“使馆随员”一样。

官吏不仅在国家机关的办公厅里有；哪里有大工业，那里便能找到。因此即使消灭了国家，你们也不能躲避这个使你们害怕的稻草人。只有我们共产主义者才能消灭它。当共产主义的工业企业由个人之手转为全社会的财产，那时人民将把它交给工会，一说到英国的工会组织你们就只会赞叹。你们之所以赞叹它们只因为我们是在法国。但是假如你们追溯到二十年前，那末就会听到英国的这些工会遭受的残酷攻击远比现在的法国的工会为甚。在现时代它们才被承认而且甚至变成反动的因素，以致英国有这么多的政治家都对它赞美，为的是可以利用它来达到政治目的。格拉斯吞<sup>19</sup>和自由党人在选举时期最会詭詐旧工会的领袖。

这么一来，当大型的生产资料变成民族的财产时，便把它交给有组织工人。这时不再需要那些为了特权者集团的利益而监督工人工作的官吏，那时将只有联合起来的劳动者，他们每人都担负自己的任务而且知道他们的劳动果实将属于他们全体。

你們說共产主义制度的缺点是在于它使人們的精力麻木，打击自动性，既然劳动果实不属于个人，因此每人都想把自己的工作轉嫁到邻人身上去。但这正是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在現代工人非常清楚地知道，他們的劳动果实不属于他們，分給他們的只是采取工資形式的一小部分，而大部分都落入了資本家的腰包。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他将知道，一切产品除去維持社会所必要的之外，其余都是他的財產。

在资本主义的工业里工人被鎖在自己的工厂里。哪里出生，他終生就停留在那里，假如某些人也能改一改环境，那是由于服兵役所引起。这里的原因是什么？是在于他們一旦离开工厂，飢餓和失业就在等着他們。像树木一样，他們紮根子扎在借以生活的土地上。

在我們的理想社会里，为完全滿足所有人的消費所必需的劳动量可以預先規定好。（大厅里响起嘈杂的声音）

现在已在規定供养全国所需的粮食的数量。規定全法国人口所需的鞋子将更是輕而易举的事。（大厅里发出呼喊声）这件工作全部分配給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員并給每一个人規定一定数量的、必要的劳动時間，以便使每个人都有可能自由地享受共同劳动所生产出来的財富。那时只有人是社会的自由的成員；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迁移或停留在这一个或那一个地点和經常变换生产活动的样式。从前为了熟悉某一种手艺需要学几年；机器把这時間縮短为几个月。你們坐在这里的人全都从沒有拿过針，靠机器可以在一个月內学会縫并且也会很快地学会織、紡等等。（大厅里有笑声）

将来存在的唯一职业是机械师。一个人可以輪流从事各种生产活动——并且这会給自己的肉体的和精神的发展带来极大的益处。（大厅里发出呼喊）

你們不贊成嗎？但是恰恰在这里包括着你們所贊嘆的美洲的蓋格魯薩克遜種族的優點。遙遠的西部的居民往往都會幾種職業，而且經常學新的。由一種活到另一種的這種過渡對於腦力的發展，對於個性的發展都是最好的辦法。因此只有在共產主義的社會里，在那里對個人財產的關心不再壓別人了，每個人將只需履行自己的社會義務，以便有可能享受全部社會財富，在那里人們才能自由地由北方旅行到南方，由織布工廠轉到耕地或者轉到任何其他的職業，並且全面地不受阻礙地發展自己的個性。

德莫連在这里所說的精神教育，且不管怎麼令人失望，對於工人階級都是空話；在工廠里的苦役勞動十小時之後，一個人哪里還有精力去聽教授的演講，——疲倦征服了他，他要睡了。工人在資本主義的工廠里擔負着過度的勞動，他們的腦子已被大工業毀壞了。

你拿起中世紀的民歌或像俄國這種資本主義工業尚未確立的國家的歌謠來讀一讀，你就會看出一切都可以檢驗我的話的正確性，這是多么驚奇的詩作。伊利亞特<sup>20</sup>，人類的最美麗的史詩，不是別的，只是民歌的結集。

隨後你再出發到北方省份去，你就會聽到那里唱着的悲慘的歌聲，你就會懂得共產主義社會的工人同資本主義工業的不幸的無產階級之間的鴻溝有多大。

假如你真心想發展人的個性，那麼最低限度按照邏輯應當要求消滅資本主義的財產，因為它壓抑着人們。

# 財產及其起源

獻給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他的學生和朋友

保爾·拉法格

## 第一章

### 現代財產的形式

#### I. 財產形式的分類

按照經濟學家的說法，財產是不服從於支配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的進化規律的一種社會現象。這些偏袒社會不平的御用辯護士承認財產只有一種唯一的和永恆的形式——資本<sup>①</sup>，他們斷言

---

<sup>①</sup> 笛卡兒派<sup>21</sup>的哲學家主張一切爭論必須從弄清爭論中所用的詞兒和術語的準確意義開始，因此，我們首先就要給資本這個詞規定一個準確的定義。一提到資本這個詞就會聯想到利息、地租、利潤和收入等一切財產。為了利息而出借的貨幣總額也像不由所有主使用而由僱傭工人使用的一切生產工具（土地、織布機、冶金工廠、船舶等）一樣可以稱為資本。但是農民私有者靠自己家庭之力而耕種的土地、盜獵者的獵槍、漁人的小船、木匠的刨子、外科醫生的刀、作家的筆等等雖然也是財產，但不能稱為資本或資本主義的財產，因為它們的所有者是把它們當作傳送自己的而非別人的勞動的工具來使用。資本這個詞是指被僱傭勞動者所使用並生產商品和使財產所有者獲得收益的財產。不勞動而獲得利潤這個觀念同資本這個詞是緊密不可分的，正如著名的傳說所講的海枯勒士<sup>22</sup>同他的大鼈長在一起一樣。

資本是永存的。为了肯定資本的永存，他們千方百計力图証明資本是从世界創造时就存在了，而且洋洋得意地作出一个結論：它既然沒有起端，那就不能有終結。为了确証这个异想天开的結論，政治經濟学教科书就像鸚鵡似地反复講述着野蛮人的历史，他們以分享猎获品为条件而将自己的弓借給伙伴。由于不滿足于資本主义财产的史前期的起源，某些經濟学家还到人类社会以外去寻找它。他們在无脊椎动物中間发现了資本，所依据的事实是有远見的螞蟻也知道积蓄貯备。可惜他們在这条光荣的道路上也只好半途而廢，因为毕竟不能找到这种昆虫积蓄貯备只是为了出卖它們并从商品流通中获得利潤。

可是，在資本永存这种薄弱的理論中是有漏洞的：它的宣傳者就不能証明資本这个詞本身是有永久性的。一只船上的繩子，除了系鐘的以外，每一條都各有自己的名称。很难設想在經濟的領域里人們反而不用同样丰富的用語并对資本这样有用的东西反而忘記了起个名称。然而人所共知的事实是資本这个詞具有我們今天的这种特殊意义只是从十八世紀才开始，正如标示資本主义制度的伪善形式之一的博爱这个詞也同样是那时开始，因为正是这个时期資本的财产形式才开始在社会上取得优势的意义<sup>①</sup>。

資本主义的财产形式对封建的财产形式的这种占优势的社会意义曾引起了近代历史的主要事件之一——法国革命的发生。

---

① 拉·庫倫·德·圣-巴萊(La Curn de Sainte-Palaye)提到“資本”这个詞时或把它当作規定某种切割的形容詞；当作名詞則使用于表示建筑或服装上的一部分(自原始以迄路易十四时代法兰西古語词典)。利特勒(Littré)<sup>23</sup>在十七世紀的手稿中发现它是当作形容詞使用的。把它当作名詞的最早記載是十六世紀的事。在里舍萊(Richelet)(1728)的词典里，这个詞是属于形容詞，只是在两三个場合才当作名詞使用。在特勒烏(Trévoux)(1771)的词典中也有同样的情形。只是在狄德罗<sup>24</sup>的《百科全书》中它才带上經濟的意义：“資本一詞意指为取得利息而贷出的金額。——公司的基金亦得称为資本。”



这个革命虽然高唱着自由、平等、博爱、正义和爱国主义的口号，而实质上是在主要有利益于资产阶级的情况下完成的。这些口号后来被金融的和政治的投机家在大綱和綱領中当作广告来利用<sup>①</sup>。与資本一詞相适应的财产形式只是由于商品生产的结果才开始获得社会的意义。而商品生产又是欧洲的經濟和政治发展的产物，它从十二世紀就已开始并由于美洲和迴繞好望角而达印度的航路之发现，貴金属向新大陆的輸入，火药、印刷术和指南針的发明，君士但丁堡的占領，各国王族之間的联姻，欧洲大国的組織以及因此而带来的相对的和平等等等而加速发展起来。所有这些因素同其它的次要因素一起促进了資本，私有财产的最完全的，也可說是最后的形式的发展。

資本形式比較晚出这一現象提供了最好的証据，証明所有制不是靜止的、不变的，而是像一切物質的和精神的秩序的現象一样是在发展着和經歷着各种不同的形式，由一种推向另一种。

财产很少停留在一种固定的形式里，甚至在現代社会里它也存在着几种形态和不同的变种：

- I. 财产的公有形式
- (A)——古代起源的公有财产：公共财产和国有的财产等等——多少世紀以来一直成为貴族和资产阶级垂涎和侵占的对象。
  - (B)——現代起源的公有财产，它是在公用事业的名义之下为国家所管理的：邮政、铁道、博物館、国立图书馆等。

<sup>①</sup> 在革命时代资本家还是社会上的初生之物，塞巴斯丁·梅尔西 (Sébastien Mercier)<sup>25</sup> 在他手編的、1802年出版的新語詞典中給“资本家”一詞下了如下的有趣定义：“资本家，这是只有巴黎才知道的东西。它是指一种怪物的所有者，一种鉄石心腸的人，只醉心于金属。說到地租，他是漠不关心的，因为他无立錫之地。怎么能要他納稅呢？好像沙漠中的阿拉伯人，搶劫旅行队又怕被人搶去而把黄金埋藏在地下，资本家也将我們的金錢埋藏起来了。”

- II. 财产的私有形式 { (A)——个人使用品的财产。  
(B)——劳动工具的财产。  
(C)——资本财产。

## II. 个人用品的财产

个人用品或私人用品的财产是财产的最原始的形式；它过去经常存在过而将来也还是要经常存在的，因为它构成生活的必须的条件。这个概念是有非常大的伸缩性的：从人们赖以维持其体力的食物一直到人们用作装饰的珠宝都包括在内。曾经有过一个时期住宅也属于这种财产的范围；人们占有住宅很像乌龟占有龟壳似的。假使文明，由于工业中采用机器，而使以前只有富人才能到手的某些奢侈品现在也能让穷人得到，那末从另一方面它又使多数公民失去自己的住宅，迫使他们住进出租的房子和设备齐全的房间里去，在丰衣足食的情况之下，它却迫使生产者满足于个人用品的财产降到最底的限度。

资本主义的文明注定了无产阶级要在比野蛮人更悲惨的生活条件之下过日子。姑且丢开野蛮人不为寄生虫发财致富而劳动这个事实不讲，让我们来看看他们是吃什么。不容争辩的，在纪元开初的几个世纪，住居在欧洲的野蛮人拥有大量的猪和其它家畜，并且有可能在野兽成群的森林中狩猎和从事捕鱼，他们虽然穿着兽皮和粗糙织成的衣服，但是享用的肉食品要比文明的无产阶级丰富得多。文明的无产阶级穿的衣服虽然是用棉毛料子而由精良的机器制成的，但是不能防御恶劣的气候。

更坏的情况是无产阶级的身体不及野蛮人这么强壮和适于应付恶劣的气候。

资产者认为自己是人类理想的体现者。他们的哲学家——自由思想家和宗教家——一致力图证明这种瘦弱的或被不卫生的脂

助損害了的生物，在它們身上疾病甚至多于惡行，是人類進化的最後產物<sup>①</sup>。但是，一切公正的觀察者都應當同意文明人的肉體的和精神的缺陷，自然也要看到例外，為了使人類回復到野蠻人的肌肉強健和感覺銳敏，必須要有高明的教育，從嬰兒時代開始繼續一生，而且要接連幾個世代才有希望<sup>②</sup>。

現代的工人被迫滿足於自身生活迫切需要的個人用品的最低限度，只因為資本家為了實現狂妄的幻想而占有過多之故。即使資本家也像神話上三個巨人那樣有五十個腦袋和一百條腿，也不能穿完塞滿他們衣櫃的帽和鞋。富者常常感嘆着不能擴大胃的容量，恨不得吞下桌上堆成山樣的食品。他們像荒淫的蘇丹似的，使後宮有人滿之患，為了尋歡作樂，他們好像有十個海枯勒士的精力似的。假如無產階級感受個人用品財產的不足之苦，而資本家最後却成為財物過度豐裕的犧牲者。苦悶壓抑着他們，病患折磨着

---

① 一個美國的進化論者考察了資產階級（照達爾文的學說，這個階級是在生存競爭中最為成功的）當中相當數量的早期脫髮和落齒的事實，預言了無髮無齒的人類。假使資本主義的文明繼續下去的話，這並非不能發生。

② 凱撒<sup>26</sup>，資本主義文明的最狂熱的崇拜者對他的某些觀察也不能不承認，他曾極口稱贊野蠻的日耳曼人在戰鬥中所表現的力量和機智。他們光頭赤膊與穿戴盔甲的士兵作戰，即使戰勝了他們，也不敢去追擊。在第七次戰爭當中，這是對羅馬唯一光榮的一次戰爭，正如拿破侖第一所說，凱撒因對粉碎維爾齊格托里（Vercegetorix）所指揮的高盧人的英勇抵抗已經絕望，於是派人到萊茵河去征募軍隊，並且命令自己的騎兵下馬，以便將馬讓給日耳曼人，他做對了。在諾維底亞奴（Novidionum）和阿勒細亞（Alesia）兩次戰役中，當羅馬的隊伍後退時，日耳曼的騎兵就打亂高盧的隊伍而取得勝利。後來，隔了百餘年，西維利士（Civilis）為了鼓動高盧人和日耳曼人起來暴動，提醒他們說，凱撒之所以能打勝高盧人只是由於得到日耳曼軍隊的幫助。

摩爾根<sup>27</sup>，罕見的人類學者之一，絕不附和那些庸俗之流對未開化的民族加以無意義的輕蔑，他主張“野蠻和半開化時期所達到的進步，或許比文明所帶來的還要重要。”

野蠻人難以適應資本主義的文明；他們失掉了自己的性質而以可怕的速度感染了文明的缺陷。然而埃及和希臘的歷史證明，半開化民族如放在良好的條件之下並得到自由發展的機會，它的物質的和精神的發展將達到怎樣的高度。

和摧殘着他們的種族，這是他們过着養尊處優的生活的必然結果。道德家與其拿那可憐的節約論去說服無產階級，反不如勸說資產階級實行節欲的善行更好些。

### Ⅲ. 勞動工具的財產

照富蘭克林的說法，人是製造工具的動物 (toolmaking animal)<sup>28</sup>，的確，工具使人同其祖先——動物區別開來。猿猴滿足于木棍和石塊。人是能磨光石斧并拿它作武器和工具的唯一動物。因此在洞穴或地層中發現的磨光的石塊正如人的骸骨一樣確凿無疑地證明人的存在。

勞動工具——不論野蠻人的石斧，或者木匠的刨子，生理學家的顯微鏡或者農民的土地，都是人的器官的附加品，有了它，人的物質需要和精神需要就易于得到滿足。

在小手工業尚存的時代，自由生產者占有自己的勞動工具。在中世紀，手工業者也像我們時代的外科醫生一樣，隨身帶着自己的工具。在土地私有制確立之前，農民暫時占有分給他的一片土地。在封建時代農奴緊緊地依附于其所耕種的土地，使他們與土地分開是不可能的。勞動工具的个人所有的痕迹還有很多，但它是在迅速消滅着：機械化的生產從手工業者手中奪去工具并把它合并于機器。機器不再是个人的工具，而是集体的工具，因而它也就不再属于生產者个人所有了。

資本主義的文明從人的手上剝奪了作為其附屬品的工具，而這個剝奪的歷史發端可追溯到主要的經過改良的工具——武器的沒收之時期。野蠻人占有自己的弓和箭，這兩者對於他同時用作武器和工具，兵士就成了第一批的無產階級，為了國家的利益，他們既被剝奪了武器，也被剝奪了工具，并由國家將他們編入隊伍里去。

資本主義的文明曾經把个人用品降到最低限度：再要繼續降

下去而又不危害生产者的生命是不可能的，而生产者对于他们是下金蛋的母鸡。现在它正致力于彻底地剥夺生产者手中的劳动工具；对于欧洲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种剥夺算是大功告成了。

#### IV. 資本財產

資本是現代社會典型的財產形式：不論在其它的什麼社會里，它至少沒有作為一般的統治的因素存在過。

這種財產形式存在的條件是對自由生產者的剝削，每天每天地剝削他們所創造的價值的一部分。對這件事卡爾·馬克思提供了無可爭辯的證據。資本的存在是建立在商品生產的基礎之上，商品生產是這樣一種秩序，在這種秩序之下勞動者的勞動產品不是為直接滿足勞動者自身的需要或封建領主和奴隸主的需要，而是為市場而生產。

在其它的社會里也有買者與賣者，但那里售賣的只是消費以外的剩餘品。在這些社會里也對生產者，農奴或奴隸，進行剝削，但是所有主對他們還承擔了某種義務：比如奴隸主人會餵養自己的勞動的動物——人，即當他們無工可做時。資本家則解除這些麻煩，把它統統推到自由生產者身上去了。仁慈的普魯塔克(Plutargue)<sup>29</sup>曾對卡東(Caton)的道德規範表示憤懣，因為他把一些衰老不能工作的奴隸賣出去。他對我們時代所發生的事情又將如何說法呢？還沒有一個資本家、基督教徒、自由思想家、反猶太教者或慈善家不把那個使他們累富巨萬的無產者趕到街上去餓死。資產階級當解放奴隸和農奴時曾大叫大喊地宣布自己是人類自由的戰士，然而他所關心的不是生產者的解放，而是資本家解脫對勞動者所負的一切義務。只是在資本主義的財產形式存在的情形之下，所有主才能隨心所欲地“使用和濫用”其權利。

\* \* \*

这就是现代社会存在着的财产形式。甚至表面的观察也能指出不该把它看作不变的，相反地，它们是在不断变革中间。例如，当古代起源的公有财产被私有财产排挤而消灭下去之时，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又转变为国家管理的公有财产；然而在达到这个形式的极限之前，资本家将从生产者手中剥夺他们个人的工具并且创造集体的劳动工具。

在我们考察了当前财产形式的这个进化之后，若还断言说在过去财产总是停滞不变的并且在取得资本（它注定是要消灭的并为新的形式所代替）形式之前没有经过一系列的形式，那是毫无根据的。

在开始描述财产进化的各种形式之前，我认为有必要谈一谈在这个历史概述里所采用的方法。

## V. 方 法

所有的人，不论种别，从生到死都经历着同样的发展阶段。在相同的年龄中，只是由于不同气候的影响而稍有差别，他们都经历着相同时期：出牙、发育、成长和衰老。人类社会也同样地经历着家庭发展的同一形式，同样的社会的、宗教的和政治的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风俗和哲学观点。

被称为“历史哲学之父”的维科<sup>30</sup>，第一个发现历史进化的这个伟大规律：在自己的《新科学》一书中他说到“所有民族的历史都要通过的理想的、永久的历史，不论它们在开始自己的文明时带着什么程度的蛮性、兽性和残忍性”。卡尔·马克思把政治界和精神界的现象同经济界的现象联系起来，革新了历史的概念，确证了维科的规律，他在《资本论》的序言里说：“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只不过为较不发达的国家指出自己未来的图景。”

假使弄清楚了某一民族由野蛮状态到文明状态的历史，它就

可用来作为地球上一切民族的历史的原型。然而連續不断地彻底追究任何民族所經過的一切阶段是不可能的。但是，假使不能从某一民族或种族的整个生活中构成这个历史，——那末可以从地球上各民族的历史中选择材料<sup>①</sup>，連在一起构成它。人类在这种方法帮助之下，即使到了老年，还是有可能認識自己的童年。

文明民族的祖先的风俗习惯在野蛮民族中还会碰到，在那里文明还没有将它们摧毁。野蛮人和半开化人的风俗、社会的和政治的制度、宗教和观念使历史家有可能把那永被遗忘的过去喚了轉来。探究原始民族，就能找出财产的起源；搜集全地球的材料，就能追究财产发展的阶段。

## 第二章

# 原始共产主义

### I. 个人财产的起源

经济学家这么慷慨地把資本贈給野蛮人只是由于他们对野蛮人的以及一切原始民族的风俗全然无知。

至今还存在着这样的野蛮部落，他们一点也不知道什么是土地所有制(不論是个人的或是集体的)，而对个人使用品的个人占有也只是刚刚开始。

菲松和霍維特(Fison et Howitt)<sup>31</sup>根据对澳洲部落生活的研究指出說：在他們那里甚至那些最带有个人性的东西如武器、裝飾

---

<sup>①</sup> 在以下各章节中讀者將讀到从旧大陆和新大陆生活中搜集来并加以整理分类的材料，目的是要証明一切民族不論其起源如何不同和往后的文化阶段如何不同，总都重复着相同的現象。

品等等，在集團成員之間這樣迅速地由一手傳給另一手，因而無論如何不能認為是個人的所有品，而只能是社會的，屬於全體成員的。

私人的或個人的所有最初以思想的形式出現：在占有任何物質財產以前，野蠻人——這些誰都想不到的唯心主義者——領受自己的名字。名字是在他們達到成年時用宗教儀式授與的，天主教的洗禮便是保留下來的遺風。野蠻人把這個名字看得像最貴重的珍寶似的。他從不向外人公開自己的名字，生怕被人竊去。而當他想用無價的禮物來表达自己的友誼時，就同自己的朋友交換名字。然而就是這種個人的所有也不是絕對屬於他的：照摩爾根的看法，名字是屬於氏族的，當受贈的朋友死去之後，這名字仍舊要歸還氏族<sup>①</sup>。

個人的財產採取物質的形式出現只限於野蠻人的貼身之物，或者說得確切些就是那些與他結合在一起的東西，例如穿在鼻子上、耳朵上、嘴唇上的裝飾品，圍在脖子上的獸皮，防治風濕病的人油，假想為神糞的水晶石以及其它裝在樹皮籃里并拴在所有主身上的珍貴之物。

這些個人使用之物就在死後也不離開它，與死者屍體一起燒

---

① 野蠻人和半開化人使一切靈魂化：超感覺的靈魂，照恩格斯的說法，這個折騰人的可厭的觀念是他們的虛構之一。在他們眼中字是活的，就是說，代表着它所標記的事物的靈魂。基督化身說是野蠻人的觀念的再版。死後脫離肉體的和活着時夢中的人的精神能夠實行復仇行為和懲罰自己的敵人，字還掌握着左右善惡的非常的力量：因此誓詞把原始人投入迷信的恐怖里去。

本文中我也像摩爾根和恩格斯那樣使用 gens (氏族)，這個詞比它的同義語克勒特人的 clan 要好些，因為 gens 一詞就它的起源和派生詞的數量之大來看，有更大的歷史流傳。拉丁文的 gens 一詞摩爾根用來表示構成部落的同一血統的集團，它與意義相同的希臘文 genos 都是從亞利安語根 gan (意指生育) 而來。gens 和 genos 專門用於同出一祖的集團，由此而有拉丁文的 gentilis (人種) 和法文的 gentilhomme (貴族)。



毀或者一起埋葬。为了使一件物品成为个人所有，就必须使它同所有主发生真实的或假想的联系。野蛮人想承认某物是属于他的时候，就要作出吃它的姿态；把它送到口边，紧贴舌头，舔一舔。爱斯基摩人购买一件小物品，甚至是一枚针，都要把它贴着嘴唇或者采取某种其余的象征性的宣告动作，借以表示想要保留它作为个人使用之物。这就是达布(Tabou)制度的起源。

使用是个人占有的主要条件。即使是某人所生产的东西也只有在他本人使用和使它们的使用神圣化的场合才属于他所有。爱斯基摩人只能占有两只船，假如他造了第三只，那就应当归氏族支配。凡是本人所不使用的一切都得归社会所有。野蛮人对借自别人的船只或者一般捕渔和打猎的工具都不负什么责任，假如他丢失了，也不考虑归还的问题。

## II. 氏族共产主义

原始人不可能有个人财产的观念，理由很简单，因为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个性，他还没有意识到与他所依以生存的血族集团分开的个人。

野蛮人碰到这么多的真实的危险又被这么多的想像的危险所困惑，以致一个人单独生活根本是不可能的；他甚至连这种思想也没有过。从他的氏族、他的部落联盟中驱逐出来，对于他等于判处死刑。史前期的希腊人和闪族人(音译塞米族 semites)也像一切半开化民族一样，杀害部落成员之一的凶手只用放逐代替惩罚。奥勒斯特(Orestes)在杀死了自己的母亲和该隐(Cain)杀死了兄弟都被迫离开故乡。在先进的文明里，如在进入历史时期的希腊和意大利的文明里，放逐仍然是最严厉的惩罚。照希腊诗人德俄尼斯(Theognis)说：“被放逐的人既无朋友，又无忠实的伴侣，放逐的主要的苦难就在于此。”离开了自己的同伴，过着孤独的生活，这对于

过惯了群居生活的原始人是一个威胁。

虽然，估計到野蛮人所生活的环境，也可以把他們称作完美无缺的人类，甚至比文明人还要完美无缺的人类，因为他們能够滿足自己的一切需要，他們同自己的部落，同自己的氏族联結得如此紧密，以至在个人所有方面也好，在家庭方面也好，都沒有表現过和沒有体现出自己的个性，像我們对它所理解的那样。在最原始的野蛮人中間，家庭根本不存在：某一氏族的妇女归另一氏族的男子所共有。儿童属于整个氏族，如像柏拉图<sup>32</sup>在他的理想国里所描述的那样；他們互相以兄弟姊妹相待，对自己的母亲及其同輩的妇女一概称作母亲。氏族对于他們就是一切，在氏族以外，他們不知道別的东西，結婚是氏族的，所有主也是氏族。

氏族內部的一切都是公共財產。布希曼人(Poshiman)<sup>33</sup>得到一件礼物时总是要把它分給本氏族的成員。达尔文<sup>34</sup>曾看到过火地島的一个土人把人家送給他的一床被按照伙伴的人数分割成若干片。假如布希曼人得到一匹牛或者其它什么东西，他也同样平均分配，而給自己往往只留下最小的一份。碰着飢荒的年景，年輕的火地島人跑到海岸边去寻找食物，假如他幸而发现一条擱淺的鯨魚，这是他們最喜爱的食物，縱使餓得快死了也不去触动它一下，而是跑回去报告本氏族的成員，他們立即赶快来到发现場所；然后由年长者将鯨魚的尸体平均分配。

比火地島土人和布希曼人較为进步的野蛮人中間，狩猎的結果也不归杀死野兽者所有，而归他的妻子的家庭或者有时就归他的妻子，并且遵照按亲属的等次制定的詳細的規定进行分配。

狩猎和捕魚这两种原始的生产形式，通常都是共同进行的，因而生产品的消費也是共同的。波多庫托斯人(Botocudos)，这些巴西的頑强的部落，他們共同地組織圍猎，非把野兽打尽不肯离开狩猎地点。在有的部落中間，共同狩猎的习惯已經过时了，可是仍然

保留着共同享用的古老遺風：幸運的獵人拿出他的獵獲物來組織宴會，招待本氏族的所有成員。在高加索的某些村落中，一家殺了一頭牛或十頭羊，就要給全村人舉行慶祝宴；大家一塊吃喝，以紀念當年的死者。喪葬宴會就是這種共產主義宴會的遺風。

摩爾根研究了這個時期的共產主義風俗之後，在他的最後的重要著作中描寫着北美印地安人共同漁獵的情形<sup>①</sup>。

住在平原而又以肉類為主食的部落，在打獵中也顯示出自己的共產主義。“黑腳種人”在獵取水牛時男男女女一大群人騎着馬追逐牛群。當追逐獸群的活動開始時，獵人把殺死的獸丟下，註給隨後趕到的第一個人所有，這種分配方法一直繼續到所有人都有了為止。有些人把水牛肉切成細長條，放在太陽里或在煙里曬干、熏干。另外一些人把獵獲品的一部分製成肉干：干燥了的和搗成粉末的肉調以油料并用獸皮卷起來。

漁季一到，部落的所有成員都集中到盛產魚類的哥倫比亞河裏來，所有捕獲的魚也一起存儲。每晚按婦女人數進行分配，每人都領到相等的一份。人們把魚剖開，放在籬笆上曬干然後用籃子裝運到林子里去。

### Ⅲ. 公共住宅和食堂

野蠻人在停止了沿着河崖海岸流離轉徙尋找自然提供的豐富食物之時起，就開始定居下來，構築房舍，但是他們的房子不是屬於個人的，而是屬於全氏族的，而且一直到向母系氏族過渡，家庭開始分立的時候仍然是公有的。這時候，一座房子可以容納好幾百人。在加羅林島(Caroline)的土人中，常有一家七百多人同住一起。

拉貝魯茲<sup>35</sup>在玻里尼西亞(Polynesia)所遇到的那種房子可算是這種公共住宅的典型。這種房子長 310 英尺，寬 20 到 30 英尺，

<sup>①</sup> 摩爾根：《美洲土人的家庭和家庭生活》，華盛頓，1881年。

高十英尺，它們的形式很像倒翻轉來的獨木船，由兩端開門，可容納百多人居住。據摩爾根說，在前一世紀末就已絕迹的那種易洛魁人的 (Iroguais) 長房子 (long houses) 有 100 余英尺長，30 英尺寬和 20 英尺高。一條狹長的過道貫穿房子中間，過道兩邊辟了許多 7 英尺寬的小房間，專供已婚婦女居住。每座房子的兩頭入口之處有門；門上有描繪的或雕刻的氏族的圖騰形象，也就是他們自認為所由發脈的動物。

波勒阿 (Borneo) 島的第雅克 (Dyaks) 人部落的村落也是由類似的房子構成的，這些房子建築在離地 15—20 英尺高的木樁上，很像瑞士的水上建築。據希羅多德 (Herodotus)<sup>36</sup> 說，波奧尼斯 (Poeouiens) 人也在布拉西亞 (Prasia) 湖中構築水上茅舍居住。野蠻人的已婚婦女有自己的特別房間，設在中央走廊里。男人和青年人，未婚的婦女和少女都睡在隔開的公共大廳之內。墨西哥的大屋 (Cases grandes) 外觀很像一架巨型的梯子，由許多層重疊而成，一層比一層縮小，每一層又分成若干小房間。

西里曼 (Schliemann)<sup>37</sup> 在阿爾哥利亞德 (Argoliade, 古代希臘的山區。——譯者) 所發現的宮殿以及現在在挪威和瑞典發掘出來的廢墟中的巨大住宅的遺迹，乃是荷馬時代希臘人的和半開化時期的斯堪的那維亞人的公共住宅。在奧維爾尼 (Auvergne) 地方直到本世紀前半葉還可碰到的家庭公社的住宅很像易洛魁人的長屋。

在這些房子里，食物是公有的，烹調和用膳也是共同的，按照共產主義的原則行事。

為了記述住在這些房子里的居民的生活，不得不向摩爾根求教。誠然，他的研究只限于美洲的紅色人種的生活而主要地以研究易洛魁人的生活為限。他在易洛魁人中間生活過，作過客人和部落的養子。但是，據他說：“假如在易洛魁人那里發現了某種風

俗，很可能在那些处于同一条件、因而有着同样需要的其他部落也会遇到相同的东西。”

住在一起的易洛魁人栽培园艺，收获果实，把它们堆放在用作公共仓库的房子里。诚然，这里已经出现了某种类似私有的东西，很快地就出现了个别家庭的所有。

例如，玉蜀黍秆用叶子一束一束捆起，吊在各别的小房间里，当某一家的存粮吃完时，别家就以玉蜀黍按需要供给它，直到它能自给为止。鱼和猎获物的储存也采取同样的办法。储存的植物食品和动物食品分给妇女并委托她们担任监督，但仍然是全氏族的公共财产。

在印第安人的村落中会遇到一种奇怪的现象：个人用品的个人所有，然而它的使用却仍是公共的。海克威尔德(Heckewelder)讲到特拉瓦尔(des Delaware)和慕西(des Munsees)两种人时指出：“在印第安的村落中或在印第安的家庭中没有一件东西没有自己的单独的主人。每一个人都知道什么是属于他的，从马牛开始直到犬、猫和小鸡止。……有时一窝产下的猫或小鸡属于许多不同的主人，假如想买母鸡，就必须同一窝小鸡相同数目的儿童讲交易。因此，假如在部落中公有制原则占着统治地位的话，那末在家庭成员之间却承认私有权。”<sup>①</sup>

事实上，个人财产是在原始公有制之下产生出来的，它不仅不与原始公有制相矛盾，像经济学家所说那样，而且是它的必要的补充。

---

<sup>①</sup> 海克威尔德著：《潘西尔瓦尼及附近各邦印第安民族的历史、习惯和风俗》(Histoire, Coutumes et Moeurs des nations indiennes, qui habitaient la Pensylvanie et les Etats avoisinants)。

海克威尔德是兄弟会的传教士，他曾在印第安人中间生活了十五年(1771—1786)，并且能说他们的语言。他的最有名的著作写进了个人的观察，澄清了庸人所散播的关于野蛮人的谬论。

其他的印第安部落，例如在(新墨西哥的)拉枯納(Laguna)村里的印第安部落，却不按家庭主婦的數目分配儲存的糧食，而是把它保存在公共倉庫里。薩密爾·加爾曼(Samuel Gorman)牧師在1869年寫信給摩爾根說：“這些倉庫通常都由婦女保管。她們比起她們的鄰居西班牙人更有遠見。她們通常總要備足一年的存糧，而當地的飢饉只在連續兩年的歉收才會發生。”

在尤卡丹(Yucatan, 墨西哥的州名。——譯者)的馬雅(Maya)族印第安人，在一間小屋裡為全村人備辦膳食，很像中世紀時期在公用爐灶上為全公社烤麵包一樣。斯梯芬(Stephen)在他的《尤卡丹旅行記》裡講到他曾經常常看見婦孺成群，手裡拿著木制或陶制的碗鉢盛著熱氣騰騰的飯菜從公共廚房走出來，然後走向各人的屋子裡去。

在易洛魁人那裡也在每一個長屋裡為它的全體住戶共同備辦膳食。由婦女們，氏族的主角，從公用鍋中取出飯菜，按照各家需要進行分配；每一份飯菜分別盛在木制或陶制的碗鉢裡面。他們既沒有桌子，也沒有椅子，也沒有盤碟，更沒有類似廚房或飯廳那樣的房間，所有人都隨便站着吃或坐着吃。飯菜的分配先是男人，然後是婦女和兒童。多餘下來的存起來，長屋裡的住戶假使有誰餓了一整天就可以去吃。午後婦女煮一種玉米面的粥(hominy)，把它冷放到次日早晨或者用以待客。在他們那裡無所謂早餐或晚餐，他們餓了就吃，屋子裡有什麼就吃什麼。一般說來他們不是嘴饞的人。

史前期的希臘也曾有過這樣的風俗：有史時期的同餐共食不過是原始公社制時代的遺風。

龐丁的(Pontius)赫拉克利德<sup>38</sup>，柏拉圖的學生，曾給我們留下關於克里特島共食的記載，在那裡原始時期的風俗保留了很長的時間。在男人(andreies)的共餐桌上每一公民領到同樣的一份，只

有执政官(archont), 酋长会议(gerônia)的成员有权领取四份; 第一份是以公民资格领得, 第二份作为餐桌的主席而领得, 其余两份作为保管餐厅和家具之酬劳。每一张餐桌都置于年老妇女的特殊监督之下, 她分配食物, 公然把那最好的部分分给议会中或战场上特出的人们。外宾分给第一份, 甚至先于酋长。一大杯掺水的酒从一只手传到另外一只手, 喝完就添满, 一直到终餐为止。赫拉克利德只记载了男人的共食; 荷克(Hoek)补充说, 在多利亚的村落中曾存在过妇女和儿童共食的风俗。这位克里特岛的历史学者的假设要比我们对野蛮人和半开化人中间存在着的经常的性别隔离的认识远为可信得多。

按照普鲁塔克(Plutarque)的说法, 所有参加共食的人都是平等的。因此他又称后者是贵族会议(sunedria aristokratika)。坐在一张桌子上的人显然属于同一氏族。斯巴达人, 同一西西迪(syssitie)<sup>39</sup>的成员, 组成相应的军事组织并且一起作战。野蛮人和半开化人在一切场合不论在餐桌上还是在战场上都是采取共同行动, 在那里他们都是按家庭、氏族和部落编组起来的。

原始部落每一成员领得自己一份食物的必要性是如此重要, 以至Moira这个词开始在希腊文中是指共食参加者每人应得的一份, 后来就变成命运的名称, 最高女神的名称, 她同时操纵着神和人并且分配他们每人一份存在, 很像克里特共食时的年老妇女给每人分配一份食物一样。值得注意的是在希腊神话里命运(Destinée)都托化为妇女: Moira<sup>40</sup>(摩伊拉), Aissa(阿伊莎)和Keres(凯莱斯), 这些名字都意味着分配食物或战利品时应得的部分。

据亚里士多德说, 共食的食品是由土地收获、畜群和属于公社的农人的代役租供给, 因此, 他补充说, 克里特岛的男人、妇女和儿童都由国家供养。他认为实行共食的风俗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

代，米諾斯(Minos) 施行于克里特居民中間，意大爾<sup>41</sup> 施行于意大利西南部的居民中間，正是这个意大爾把游牧民族变成农耕民族。这位斯塔吉里(Stagyre) 的哲学家<sup>42</sup> 由于发现了当时意大利的大多数民族中还流行着共食的风俗，因此他认为共食是由这个国家起源的。哈利卡尔纳斯的底尼西(Denys d'Halicarasse)<sup>43</sup> 提到在罗马每一个库里亚<sup>44</sup> 都有自己的公共食堂以供参加库里亚的所有氏族使用，每十个库里亚，构成三大部族之一，也有自己的公共食堂；接着他又说到拉塞德摩尼亚(Lacedaemonian = Spartan) 人的共食制并且假定这种风俗是罗马路斯(Romulus) 从李库格(Lycurque) 的立法里借用来的。<sup>45</sup>

亚里士多德的假设和底尼亚的假设一样都错了：共食的风俗到处都一样，不靠外来影响的援助或者摹仿，完全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无论是在美洲的印第安人中也好，或是在希腊人、拉丁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中也好，都没有例外。斯堪的纳维亚人用基尔特(Guild) 一词来表示共食，它后来变成为手工业行会的名称，行会的成员在入会时必须宣誓要像兄弟般互相帮助和彼此维护。

这些共食的起源可追溯到原始共产主义时代，即希腊人所称道的“黄金时代”；在希腊人中共食有着“神餐”的名称。奥德赛<sup>46</sup> 上记载着这样的一次盛宴，皮洛斯(Pylos) 的 4,500 个市民围坐了九张桌子，每桌 500 人。罗马每逢盛大节日就沿街摆设酒席招待全体人民。据克塞诺芬<sup>47</sup> 说，在雅典一年中的某些日子里，由城市负担经费，宰杀大量牲畜，祭肉分予人民。

宗教，这个古代风俗的贮藏库，也把共食当作宗教仪式保存了下来。按照宗教的命令，雅典市民应当以抽签为序赴卜里达勒(Prytanie, 古代雅典由五十名议员组成的长期元老院。——译者) 共食。谁若拒绝履行这个宗教的要求，法律就要严厉惩罚他。坐在圣餐桌上的市民，一时也成了神圣的了，并取得了巴拉西



特(parasites)<sup>①</sup>的称号。

为要证明这种宗教共食的起源如何古老，只须举出共食环境遵守的原始的淳朴就够了：在一个城市里送面包是放在铜盘里；在另一城市里却是放在陶碗里。破坏了祖宗的风俗，使用了新盘，概被認為瀆神的行为。天主教的圣餐礼(communion，如这个名称本身所示)就是原始时期的共食的遗风余韵。

#### IV. 共产主义的风俗

容纳整个氏族的公共住宅开始分散为只容一家的私宅；这个分散跟着也引起了共食的消灭，只有民族的或宗教的节日，例如希腊人为纪念过去而举行的神圣的盛宴是例外。食品虽然已被公认为属于个别家庭所有，事实上仍归全体处理。据卡特林(Catlin)<sup>48</sup>說，在印第安人的村落中每一个不论男人、女人或者儿童，假如他饿了，都可以走进任何一家住宅，甚至是部落酋长的住宅，去找寻吃食。即使是部落成员中最贫困的、最无用的人，假如他太懒了，不想去为自己猎获和采掘食物，可以指望着第一个闖进去的家庭的住户会拿出其所有的食物来分给他吃。然而，假如这个人确有能能力打猎而出此一举，那他就得为自己的食物付出高昂的代价：人們将用懦夫和乞丐这样可耻的名称去羞辱他。

加洛林群島的土人出門旅行无需隨身攜帶糧食。要是餓了的時候，他就走進第一家碰到的小屋里去，不必請求允許，便可以伸手到桶里去取餈餈(Popoi——一种用面包果的果实和好的面)吃。吃飽了，他就走，甚至不必向主人道謝：他只是使用了自己的自然权利，完成了世界上最簡單的事情。

到处流行的这些共产主义风俗在拉塞德摩尼亚(Lacedaemo-

<sup>①</sup> “Parasites”，按拉丁語原意為“同巢共食的人”，后轉為“吃白食者”、“食客”。——譯者注

nian)一直繼續到斯巴達人脫離了半開化狀態之後。據普魯塔克說,李庫格,這位神話人物(人們把全部法規的制訂都歸功於他),曾經禁止人們鎖門,以便每個人可以進屋並拿取他所需要的食物或家具,甚至當主人不在的時候。每人也可以不經允許騎馬,使用獵犬甚至任何別的市民的奴隸。

私有觀念對於一切資產者是非常自然的,但當初跑進人們的頭腦卻不那麼容易。當人們開始思想時,恰恰相反,他們首先想到的是一切應當歸大家。

黑克威爾德說,印第安人相信大神(Grand Esprit)為了全人類的共同幸福創造了世界及世界裡包羅的一切。他使土地上有居民和使森林裡充滿了野獸,他之所以這樣做不是為了少數人,而是為了全體人類的共同利益。一切東西通統都應當遺交人類的後代。在地面上呼吸和在土地裡生長的一切,河流水澤中居住的一切,都是全體人類的財產,每個人都有權享有自己的一份。好客在他們不是美德而是義務。他們每個人都寧願自己挨餓老早躺下睡覺,而不願受到沒有執行義務的譴責,說他沒有滿足客人、病者或貧者的需要;因為所有他們都有權取得“公共基金”的幫助;因為供給他們吃的野獸,假如它是在樹林裡找尋來的話,那它前此一直是公共財產,而敬客的蔬菜和玉蜀黍生殖在公共土地上是按照大神的意志而不是按照人的意志<sup>①</sup>。

凱撒曾經有機會在日耳曼人中間觀察到同樣的共產主義。但是他拿文明民族的思想去看待它並認為這些共產主義的風俗目的

---

① 霍布士(Hobbes, 1588—1679),近代最有才智的思想家之一,也同意這種觀點:“自然,——這個無情的邏輯說,——給予我們每個人對於萬物的同等權利……”

所謂自然狀態就是所有的人都可做他思想的一切,取他思想的一切。由此得出一句流行的話,‘自然把一切東西給一切人’和結論:‘在自然狀態裡權利的條件就是效用’。(《市民》)

是在于“維持他們之間的平等，既然在他們那里一切人都处于相同的条件之下，都是最强大的”。似乎原始共产主义和現代的資本主义是人类意志的产物，而不是前者从自然环境的需要发展起来，后者从經濟的和人为的环境中发展起来，因为它是人創造出来的。然而，确信无疑的事实是生产和消費中的共产主义是以氏族和部落成員之間的完全平等为前提，而且保持了这种平等。这种原始的共产主义不仅保持了平等，而且发展了友爱和寬恕的情感；这种情感使得如此大吹大擂的基督教的仁慈和名气也很不小的哲学上的博爱变得滑稽可笑。这些高貴的品質深为那些認識了野蛮部落的人們所贊叹不已，野蛮种族只是由于酒精、基督教、粗暴的重商主义<sup>49</sup>和文明民族的有害的疾病的侵蝕才变坏了的。

不論在人类发展的任何时代都不会碰到这样周到、这样慷慨和这样率真的好客风气。据摩尔根說，假如有一个人在無論什么时候走到易洛魁人家里去，不管这个人是本村居民、本部落成員或外部成員，家主妇的第一个义务是供給他食物。蔑視这个規矩是不禮貌的，几乎是侮辱。假如客人餓了，他就吃，要是不餓，他总要講点禮貌，应当尝尝食物和道謝一番。

詹姆士·阿德尔(James Adairs)說：“拒絕援助貧困者被認為犯了大罪，誰犯了这种罪，不仅本人蒙受耻辱，而且敗坏全部落。”<sup>①</sup>客人被認為是神圣的，即使他是一个敌人。塔西佗(Tacite)<sup>50</sup>在剛剛踏出原始共产主义的日耳曼半开化人中間也发现了同样的风俗。他說，無論在其它任何民族中都不会遇到这样丰盛的宴会和这样慷慨的好客风气。拒絕招待客人，無論他是誰，都被認為犯了罪。每个人都尽其所有款待客人。当食物貯藏告罄时，招待宾客的人就可以把客人引到新主人家里去，他們不待邀請一起进入邻家，然而这不会妨碍他們受到殷勤的接待。既然把好客当作义务来履行，

① 詹姆士·阿德尔：《美洲印第安人历史》，倫敦，1775年。

因而对朋友和对外人都是一視同仁。

这种寬厚的、友爱的殷勤在共产主义时期的人们中間是如此发展,以至一直繼續到这个时期的終結还存在,而只是到文明化的资产阶級时代才消灭。在集体主义时代的村落里撥出一部分公有土地来满足客人的需要,这些客人被安置在特别的房子里,这种房子由客人支配并且常常有“客人之家”(maison de l'hôtel)的称号。这些事实不仅在印第安人的公有制村落中可以观察到,而且在十九世紀初期存在于俄維倫和摩尔万(法国中部山岳地帶的两个地名。——譯者)的乡村公社中也能找到。

塔西佗以及后来四世紀末馬賽的主教撒尔文(Salvein)都曾向文明的羅馬人举出他們的邻居半开化人来作榜样。美国的旅行家卡特林自1832年到1839年曾生活于北美洲的最野蛮的部落中間,他写道:“我敢保証,文明人向他們宣傳善行和道德是白費。”所有旅行家,只要不像斯当納和布拉撒(les Stanley, les Brazza)<sup>51</sup>那样粗野、貪婪和殘酷的商业推銷員,便不仅要承認和贊揚他們所訪問的野蛮人和半开化人的非常的品質,并且还会毫不猶豫地承認这些品質是在他們中間占統治的共产主义的結果。耶穌教徒沙尔瓦(Charlevoix)<sup>52</sup>說:“印第安人中的友爱精神或多或少是由于‘我的’和‘你的’,像約安·茲拉托烏斯特(又名 S. Jean de Chrysostome——347—407,君士坦丁的大主教,以辯才著名。——譯者)所称呼的这种冷酷的字眼对于野蛮人还完全不知道。他們对孤、寡和殘廢者的同情,他們的著名的好客风气只是由于他們相信一切东西都应当属于一切的人的結果。”<sup>①</sup>

自由思想家拉翁登(Lahontan)<sup>53</sup>,沙尔瓦的同时代人和批評家,用以下的話来肯定他的見解:“野蛮人不知‘我的’和‘你的’这种字眼,因为人們可以說,属于这个人的一切,同样也属于另一个

① 沙尔瓦:《新法兰西历史》,1741年。

人。只有住在我們城門口的耶穌教徒手里才有錢。其余的人不想要錢，甚至連看也不想看，稱呼它是‘法蘭西的蛇’(serpent des Français)……一個人比另一人有更多的錢，錢多的人比錢少的人受到更大的尊敬，這在他們看來是奇怪的。……他們彼此之間任何時候也不爭吵，不打架，不偷盜和不誹謗。”<sup>①</sup>

\*                     \*                     \*

這種不知道商業，從而也不知金錢為何物的原始共產主義開始只出現於為數幾千人的野蠻部落中間，往後也在一個國家的廣大範圍內實行過，雖然它的農業和工業比較不發達，却也保證了幾百萬人的享福和大的國家的繁榮。<sup>54</sup> 當秘魯被征服的時候，其居民已進入家族集產的階段。代替土地的共同占有和共同耕種，他們每年按村落中的家庭進行分配。可是有相當大的一部分土地，約三分之二要保留給他們的太陽神和印加斯(Incas——秘魯印第安人的統治階級)。這些土地是共同耕種的。收穫用於滿足祭祀、印加斯和行政機關的需要；余下的部分則用於公益事業和按需要分配給全體居民。放牧於山區(cordillera)大群的美洲駱駝的毛和平原地帶所產之棉也分配給每一家庭，盡量使每家的成員都有足夠的衣著。

公共土地的耕種和糧食收穫的組織做得這樣好，致使那些從貧困、淫蕩和盜竊統治之下的歐洲跑出來的西班牙的“文明傳播者”投身於一個不知災禍為何物的國家。那里的倉庫豐盈，不是玉蜀黍，就是其它谷物。波羅·翁得加多(Polo Ondegardo)，法學家之一，被派去保護西班牙王國的利益以對付毀滅秘魯的殘暴而野蠻的冒險家，據他說某些倉庫“存糧足夠十年之用”。普列斯柯特(Prescott)<sup>55</sup>曾引用了一個取名塞納·萊日士馬(Sierra Lejesema)的侵略者之一所寫的文件，那上面承認了當西班牙的所謂南美洲開拓者(他自己也屬於這類貨色)破壞印加帝國時，那里的人民管理得

<sup>①</sup> 拉翁登：《拉翁登旅行記》。

非常好，以致在他們那里既沒有偷竊者，也沒有懶漢，也沒有蕩子，也沒有操不正當生涯的婦女……，山脈、礦山、牧場、森林和豬場都管得井井有條，而且也分配得很好，每個人都知道他所應得的一份，其所領有的財富不必耽心會被別人搶去，因而也從不發生為此涉訟的事情……。當西班牙人在自己的住屋上加門置鎖的時候，當地土人還以為這是由於他們害怕被印第安人殺死，他們怎麼也想不到有誰會去搶奪別人的財物。當他們一旦發現我們中間有偷盜和荒淫浪蕩的行為時，便立即改變了對我們的尊敬。

法學家翁得加多看到了印加統治之下“沒有一個貧窮的或者困乏的印第安人”，他相信這種有遠見的共產主義制度只有魔鬼才能建立，因為只有魔鬼才希望兒童的心腸變硬，不再敬事自己的年老而貧困的雙親，才希望仁慈的情感消滅，既然富人解除了給窮人施舍恩物的必要性<sup>①</sup>。

共產主義秘魯帝國公共建築的廢墟，當它被侵略的時候，其中可以容下二十萬人的軍隊，像古代的共產主義埃及的廢墟一樣，足使現代的建築師為之驚嘆不已。通過康台蘇(Condesuyu)地區的導水工程<sup>56</sup>之一有六至八公尺長，靠蓄水池和自然湖之助把水送到山的中心點去。由吉托到庫斯柯<sup>57</sup>的大道長2,500—3,000公尺，沿路每隔十五公尺就有堡壘和軍事工程，圍以規模巨大的石胸牆。車輛通行的部分寬七英尺，路面鋪上大石板，有些地點蓋了比花崗石還硬的水泥。這條修建在山區的道路常為急流和懸崖所截斷，因而架設了許多木橋。洪堡爾德(Humboldt, 德國十八、十九世紀著名的自然科學家和旅行家——譯者)在十九世紀初訪問秘魯，親眼看到這條道路時，不能不極口贊揚，他說“這種邊緣圍以巨石並且和羅馬的最好道路不相上下的道路，我曾在意大利、法蘭西和西班牙看到過，……印加的大路是迄今人類所完成的最有用的并

<sup>①</sup> 威廉·普列斯柯特：《秘魯征服史》。

且同时也是最巨大的工程之一。”<sup>①</sup>这种巨大的工程是由沒有牲畜和不知用鉄的共产主义的民族所完成的。

## V. 土地的公有制

到此以前，野蛮部落依靠狩猎和采集为生，除了間或有犬之外尚无任何一种馴养的动物，他們沿着河海岸的陆地流离轉徙，哪里发现有丰富的食物，就在那里停下来，关于建立猎場的公有制——土地所有制的第一种形态，他們連想都沒有想过。野蛮人为了获得足够数量的食物，必須利用土地的广大空間，因为在他們那里农业还处于萌芽状态，他們大部还得依靠自然提供他們果实、魚和兽。因此当某地人口密度增加了的时候，就不得不在当地居住的部落之間分配水和土地。

土地第一次分配所取之形式是猎区的划分；以后，当家畜繁殖开始时，牧场也实行分配。这样分配的土地是属于一个部落或几个部落的联盟或同血統的几个部落的公有财产，这些部落又将分得的土地再在組成本部落的氏族或种族之間进行分配。土地个人占有的观念进入人类的意識很困难，而且很晚。亚美利加的娥馬哈(Omahas)人說：“土地像水火，‘它不能属于任何人’”。土地只能是整个部落的公共占有物，不仅属于現有的成員，而且甚至还属于尚未出生的成員。新西兰的英国当局根据自身的經驗，很知道这一点。向毛里斯(Maoris)人购买土地虽然取得了全体部落成員的同意，然而每当一个新的嬰兒降生，他們就会繼續收到索付新的地价的要求，因为据毛里斯人說，他們虽然出卖了自己的所有权，然而不能处理尚未降生的成員的权利。当局只好撥付部落一笔年金，使新生的嬰兒能領到自己的份額，这才脫出难境。上帝是不贊成土地私有的：“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們在我面前是客旅、

<sup>①</sup> 洪堡尔德：《柯迪亚勒斯見聞录》。

是寄居的。”(中譯本旧約《利未記》第二十五章,第二十三節;《历代志》,第二十九章,第十五和十六節)

教皇利奧第十三在其有名的反社会主义者的通告<sup>58</sup>里充当了土地私有制的卫士,大概已經把自己的上帝的遺訓忘記干淨了。不仅如此,犹太教徒和耶穌教徒为了財神(Dieu-Propriété)早就把对耶和華<sup>59</sup>的崇拜丟到九霄云外了。

人类必須經歷一个又漫长又艰难的发展时期,这才达到土地私有制。

\*                     \*                     \*

火地島人在他們狩猎和属于全部落的土地四周用大片无主的土地作界。据凱撒說,瑞夫(Séuves,日耳曼民族之一,即今之Souale。——譯者)人也有这个风俗。这种分隔两个或几个部落的中立地带,日耳曼人称之为“分界林”,斯拉夫人則称之为“防护林”。在北美洲在說着共同語言的部落、同血統的部落和联盟的部落之間通常也有这种地带。

旧大陆和新大陆的野蛮人和半开化人之所以要在自己土地的周圍設中立地带,为的是保护自己的生存資料,就是保护在他們的森林里自由地放牧的野兽和猪群。一切外来人只要在别的部落的土地上被人碰到,就会被追逐;若是被擒就会打成殘廢,有时甚至被杀。据黑克威尔德(Heckwelder)說,印第安人在自己的土地上不論碰到誰都会割去鼻子和耳朵,并且放他回去告訴他那部落的酋長說,假如下次再犯,就要削去头皮。

“誰有土地,誰就要打仗”这句封建时代的諺語还在野蛮时代和公有制产生时代就被証實了。狩猎权的破坏是相邻各部落之間发生糾紛和战争的主要原因。

无主地带开初是为防止侵入別人領土而設,以后变成为市場,相邻各部落的成員的剩余品就在这里进行交換。英王哈罗尔德



(Harold)在1063年打敗了經常侵入薩克遜領土的康布連(Cambniens)人,和他們簽訂了條約,若在八世紀時由國王奧發(Offa)所修築的工事以東發現任何一個康布連族的帶武器的人員就要砍斷他的右手。薩克遜在自己這一面另築一道平行的工事,兩牆之間的空地變成中立地點,作為兩民族通商之用。

## VI. 勞動分工的起源

旅行家非常惊奇地發現,在野蠻民族中兩性間存在着道德的和物質的障礙而且分別居住。這種性的隔離之所以發生顯然是同原始的雜交和兄弟姐妹間的性交的停止有關係的,性的混亂開始是平常的現象。這種隔離起初是因家庭道德的利益引起的,後來又由兩性的職務的差別以及由於所有制而被鞏固和加強起來。男人擔任的職務是覓取食物和保衛安全,而婦女則為氏族保管、分配和烹調食物,製造衣服和家具。一個古爾納(Kurnai)人對菲松(Fison)說,男人只是打獵、打仗、捕魚和打坐。這就是說,所有其餘的都是婦女的事。勞動分工就是這樣開始的,依照馬克思的意見<sup>60</sup>,分工一開始是建立在性的差別之上。每一性別因有自己的特殊的職務,因而就有相應的某種財產。

只有當作使用的結果和使它神聖化,野蠻人才能理解個人所有的存在:凡是通過使用不能據為己有的東西就不屬於他所有。武器、馬匹、漁獵工具都應當屬於男人——戰士和獵人——所有。食物、家具以及其他與婦女的職務有關的東西都歸婦女所有。如同男人隨身帶着自己的武器和獵獲品一樣,婦女也把一切屬於她的東西通統背在身上,連自己的小孩也不例外,孩子是她的所有物,而不是父親的所有物,因為父親通常是難辨認的或者干脆不知道。

經營農業是土地分散的主要原因,在此以前土地都是部落共有的。經營農業更加加強了兩性的分隔。

男人从事战争和打猎，把一切田间工作完全委托给妇女，只在收获季节才偶尔同意给妇女以帮助。在游牧民族中男人担负管理畜群，管理畜群最后被认为比农业种植更高尚。在卡菲尔人(Caffres, 南非洲的一种黑人。——译者)中，放牧畜群被看作是贵族的职务。亚利安人<sup>61</sup>的古代法律禁止居首位的两个阶级——波罗门教徒和刹帝利或武士——从事农业，把农业看作是低卑的职务。马鲁(Manou)<sup>62</sup>说：“有德行的人之所以谴责从事农业的波罗门教徒和刹帝利就因为犁头的铁尖损伤了土地和住在土地上的人们”(《马鲁法》第十章)。神怪小说中的国王总是娶牧女为妻，人们都认为牧女的出身高贵。

野蛮人中间产生财产之唯一可能的和可以理解的理由就是使用。因此家庭的土地所有在其产生时是被认为属于妇女的。在一切父系家庭形式尚未排除母系家庭形式的社会里，土地财产都由妇女掌管。在埃及人中，在马拉巴尔(Malabar)海岸的纳伊尔(Nairs)人中，在非洲沙漠的都阿列格(Touaregs)人和比利牛士(Pyrenes)山的巴斯革(Basques)人都可看到这种现象。

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全斯巴达有五分之二的土地都归妇女掌管。

土地财产本来应当使它的占有者得到解放而将它交给社会管理，但是开始时却是隶属的原因：妇女注定从事繁重的田间工作，像后来的奴隶似的。农业引导人们达到土地私有制，它也引进了奴隶的劳动。

## VII. 土地的共同耕种

在原始共产主义存在的时候，土地属于部落，耕种是共同地进行的。亚历山大·马其顿<sup>63</sup>的海军统帅之一，名纳阿桂(Neaque)，他是纪元前四世纪所发生的事件的见证人，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在

印度的某些地方，土地是由部落或許多家庭群共同耕种的，年終大家分配收获物。摩尔根曾引証过的那位斯特芬(Stephen)描写約加丹的馬雅(Maya)印第安人的帳幕，說他們的土地是共同占有，耕种也是共同的。第奧多尔(Diodore)<sup>64</sup>說，在西西利海岸的利巴里(Lipari)群島的居民中間，土地是共同占有的；一部分居民从事耕种，而另外一部分則專門对付台萊尼安(Terreniens)海的海盜。后来当他們所居住的利巴里島用抽签的方法进行分配的时候，其余的小島仍然是共同占有并由居民共同耕种。据凱撒說，瑞夫人，“全日耳曼的最慍悍好战的民族”，沒有私有的、分割的土地(*privati ac separati agri*)；每年由一百个村落选出一千名士兵出国远征；留在家乡的人就应当耕种公共土地。这种共同占有土地和共同耕种的习惯甚至一直保留到共产主义时代的終結。在血族集产制占統治的俄国农村里經常会碰到共同耕种的土地，即所謂“共耕地”(Terres labaurées par la commune)；收获物也在所有参加“农村公社”(Mir)的农户之間进行分配。在其余的村子里土地只是在共同耕作之后才分配給各家。頓河流域的哥薩克有时共同收割未行分配的草場上的草，只有割下的草才进行分配。这种共产主义文化的遺风不仅存在于血族集产制的古典国家。1877年，穆勒(Miller)由新墨西哥的印第安村落陶鄂斯(Taos)写信給摩尔根說，在每一普埃不洛(*pueblo*)<sup>65</sup>中玉蜀黍地都是共同耕种的，玉蜀黍地的收获是在酋长监督之下进行，收获物由貧困者支配。九世紀所制定的威尔斯法律規定每一家庭应領得大約两公頃土地归私人使用，但是大部分土地应当使用于公共耕种。

未行分配和共同耕种的土地上的收获物有时不在乡村居民之間分配而用作公共开支。哥姆(Gomme)在他的《共有村落》(Village community)一书中引証了爱尔兰的墨特(Meath)省的一个村落，在那里公有地上的收获是用以支付十一稅和其它稅賦。在印度的

某些公社里，公有地上的收获是用于支付为全公社成员服务的公职人员（铁匠、牧师、学校教员等等）的薪金。从《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我们看到在希腊也像在秘鲁一样存在着一种单独的神圣土地（*tēmenos*），专门用以供奉地方神和军事首长（*Basibus*）。

在苏格兰魔鬼也有自己的土地，因为魔鬼要求对自己采取有礼貌的态度，他们称呼这土地为“善人之地”（*gude man's land*）。他们常常听其荒废而不耕种。

雅典国家出租自己的公有地，租地收入的一部分用以供养神圣的妓女，她们为贵族服务却得不到报酬。

秘鲁全部可耕地的大约三分之二是公共财产而属于太阳<sup>66</sup>和印加。居民在耕种每年分给他们的土地之前，都得共同耕种太阳的土地，其收获首先满足祭祀之需，然后分给大家。共同的劳动像过节那样兴高采烈。天一拂晓，就登上塔顶或高岗把全体居民召集起来。男人同妇女和儿童穿着节日衣服，带上最好的饰物，纷纷赶来集合。人们一面工作，一面唱着颂扬印加的伟大业绩的赞美歌，他们劳动时的这股热情和乐趣只有在半开化人和野蛮人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共同劳动中才经常出现。

### VIII. 动产的公有制

现在确实知道，土地及其产物（谷类、鱼和兽）当初在部落和氏族内部都是公有财产，甚至野蛮人手中的最初的、为数极少的动产（武器、船、捕鱼用具和最简单的家庭用具）也被认为是公有财产。

这种共产主义甚至一直维持到半开化部落中的动产（畜群、奴隶、宝石和贵金属等等）已经增多起来的时候。正是这种动产助长私人财富的积累和商业，在几千年间仍然是人类的灾难，引起未来的巨大变革；这个变革把妇女从先前的崇高的社会地位降下来并驱使薄弱无能的和毫不自觉的人类在原始共产主义和血族集产制

的廢墟上建立起倒霉的私有制。

当农业和工业尚停留于萌芽状态时，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内奴隶制度是没有位置的；战争俘虏都被杀掉或者收容在那些缺乏战士的氏族之内。土地的耕种，工业的成就和驯养动物引起奴隶制的发生：现在在保存奴隶和获得奴隶中发现了经济上的利益，因为可以把他们使用于各种各样的劳动。以前在各部落之间进行的战争只是为了达到夺取或保护猎场的目的，随着动产积累的程度，战争变成了获得谷物、畜群、奴隶和贵金属的手段。半开化人的战士和狩猎者以前是厌恶劳动的。与其在农业劳动的重荷之下弄弯腰背，还不如致力于当海盗、战士或匪徒。抢劫行为与动产的积累同时出现。

史前期的希腊人也是勇敢的海盗，他们出没于地中海沿岸，随身带着获得物藏匿于依山岩而建的像鹰巢似的堡垒之内。希腊人的战歌( *Skolion d'Hybrias* )的珍贵的片断使我们得以理解半开化人的战士的生活和感情。他们的英雄歌唱着：“我的财富是我的梭标、我的利剑和保护我的身体的盾牌；我使用它们来耕种，使用它们来收获，使用它们来采集甜葡萄汁，它们使我成为木诺雅( *mnoia* , 公社的奴隶)的主人。谁要是不懂得披坚执锐，就让他跪在我的面前，像跪在主人面前一样，而且称呼我为伟大的首领”。

莱宁卡曼( *Lemninkaimen* ), 是芬诺族( *Finnois* )叙事诗卡列瓦拉( *Kalevala* )的英雄，也这么唱着：“我的金子与月亮一般古老，而银子与太阳同寿；它们都是勇敢地战斗夺取来的，……一枚小小的钱币得之于战场，要比用犁头取得的全部金银还贵重。”<sup>①</sup>

陆上和海上的抢劫是半开化人醉心的职业。甚至已进入农业

<sup>①</sup> 中世纪之末，因被十字军征战弄得破产并失掉了土地、过着流浪生活的骑士，专以战争为生。他们像希腊的英雄一样，把从战争中取得的战利品称作“利剑的收获”( *moisson de l'épée* )。照这时期的诗人的说法，利剑是他们的衣食之源( *gagne-pain* )。

时期，他們仍未放弃海盜生涯。据凱撒說，瑞夫人同时从事两种行业：每年他們公社的一部分战士耕种土地，另一部分則派出远征；当他們归来时，第一部分又輪派出征。他們帶回的战利品大概都要分配給大家，因为留家的必須耕种公社的土地。不論是在农业中还是在搶劫中他們都是共产主义者。以后共产主义虽然消灭了，但是搶劫的热情仍未稍减。私有制全盛时期的雅典人还是保留着搶劫之风。梭倫<sup>67</sup>曾在雅典办过海盜学校。据修昔底得(Thucydide)<sup>68</sup>說，“古代人并不認为海盜行为有什么不光荣”。就是資本主义的民族对它也还保持极大的敬意，因为一切現代的殖民事业也不过是些海盜战争罢了。

地中海沿岸的半开化人的英雄掠奪男子、妇女、家畜、粮食和动产。当土地公有时，被投入奴役的男子就成了公有财产；后来他們被抽签分配了。在克里特的諸城市中間，这是被这些勇敢的海盜所夺取的第一批島屿，在亚里士多德时代还存在着成群的奴隶，称为“墨諾丹”(mnote)，他們耕种那供养全体公民的国有土地<sup>①</sup>。这种奴隶的公有制也可在印度这个太古风俗的寬广的保存所里碰到。荷德遜(Hodgson)曾在1830年描写了馬德拉斯西北四五公里的一个村庄，那里的居民都靠奴隶种地，这些奴隶无疑是公有的，因为当某人出卖或典当公有土地属于自己所有的部分时，他同时也就將附属土地上的奴隶一并出賣<sup>②</sup>。中世紀的城市以至某些乡村里农奴也是共有的。

在一切国家里，土地、土地产品、家畜和奴隶起初都是部落和民族的公有财产。共产主义是人类的搖籃。文明所到之处，这种

① 在希腊存在两种奴隶阶级：国家的奴隶(koiné douleia，即属于国家所有的成群的奴隶)和用抽签分配而归个人所有的奴隶(klarotes)。雅典拥有大量的国家奴隶，他們不耕种土地，而担任刽子手、警察、行政机关的下层官吏等公职。

② 英国亚洲学会报告书(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830.)。

原始的共产主义就被破坏，尽管贵族和资产阶级的贪得无厌，而这种制度的尚存的残迹仍然表现着自己的公有财产的特点。可是，文明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在破坏；另一方面它又在建设。所以，当它击毁野蛮和半开化时期共产主义制度之时，它又在创造新的共产主义的因素。

我們应当从破坏和建设的双重运动都研究这个文明。

### 第三章

## 血族集产制

#### I. 氏族分裂为母系氏族家庭和父系氏族家庭

所有制的历史在其发展之初是同家庭的历史紧密联系着的，因此必须对后者之转变讲几句，同时还向读者介绍恩格斯的《家庭之起源》一书，在这书里对此问题作了极有权威的和深刻周到的研究。<sup>69</sup>

氏族或克朗(Clan)最初组成一个大的、不能分开的家庭，所有成员都住在一个屋顶之下，过着共同的生活。全部儿童都属于氏族，彼此以兄弟姐妹相待，对他们父母同辈的男人和女人一律称为父亲和母亲。可是这种混乱并不妨碍母亲认识自己的子女，有时比某些文明的母亲当她们的子女经常被乳母暗中偷换时还要确切些。儿童们自然都集合在自己的真正的生母的周围，特别是在这样的场合，即当同一氏族内部的性交关系已被禁止，妇女不得不到另一氏族为自己找一个或几个丈夫的时候，父亲于是成了“外人”，有时是短暂的过客。自然，在这样的条件之下母亲便成了成长中的家庭的首脑。现在已确切无疑地肯定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一

切人种中都有过相同的经历。

从上面所述我們知道在氏族的公共住宅中已婚妇女都有自己的单独的房間，在那里保存着按妇女数目而分配的公共食物。个人的家庭当时是以母系形式从共产主义的家庭——氏族之内产生出来的。当妇女带着自己的孩子、年輕的未婚的妹妹和妻室住在其他氏族的兄弟分出来独立居住的时候，公共房屋就按家庭数目而分为若干个人的房屋。母系形式的家庭的个人化引起公共住宅的瓦解。母亲成了房主，統治者(daspoina)，正如拉塞得摩尼亚人(Lacédemonieus，即斯巴达人。——譯者)所說的。到这时期家庭的土地所有制也开始萌芽。

这种财产开始时是很小的，只限于修建房屋所占用的那片土地。这叫做 terra salica<sup>①</sup>。

在母系氏族占統治的时期，动产和不动产是按妇女系統承繼的。遗产是按母亲及其亲属而不按父亲及其亲属繼承。在爪哇，那里还存在着这种家庭形式，男人的动产应轉归其母亲的家族，若不得兄弟和姊妹，他的自然的繼承人的同意，他就无权把任何东西給予自己的子女，这些子女同母亲一起住在别的氏族中。就我們所知有关埃及和其他民族的生活来判断，男子在母系氏族家庭中是居于从属的地位。在巴斯格人(Basques，住居于法国和西班牙交界处的 Pyrenees 山区的土人。——譯者)中，虽然那里已有了

---

① terra salica 一語曾引起无穷爭論。在十八世紀之前历史家都把它譯作貴族的土地，克洛維(Clovis，五至六世紀之交法兰克的国王。——譯者)为服兵役而分配的土地，等等。馬布利(Mably)在自己的《法国历史初探》一书中把这个字解釋为被留作遗产的不动产，薩利法兰克人(Franks Saliens)的祖业，而不把它看作恩賜的領地所有权<sup>70</sup>。

蓋拉尔(Guérard)才找出了它的真正意义，他說 salica 这詞来源于古日耳曼語 sala——房屋。因此，terra salica 就字义而言即指房屋的土地，建造房屋所占用的土地，这土地开始属于以母亲为代表的家庭，后来又属于以父亲为代表的家庭。



基督教和文明，却仍旧保存着原始的家庭风俗，长女继承着其母亡故后的家庭财产，同时就取得对年幼的弟妹的管理权。男人在自己的家庭中处于托养的地位；一个男人终其一生，当儿子、当兄弟或当丈夫都必须从属于妇女的管轄。他的全部财产仅仅限于当他结婚时从他的姊妹那里取得的东西。巴斯格人有句俗語說：“丈夫是自己的妻子的第一个僕人。”<sup>①</sup>

男子对女子的这种从属往往同男性的嫉妒的仇恨和同两性之分成敌对的阶级结合在一起，这特点表现在宗教仪式和特殊的隱語上。对于密士士比山谷的野蛮部落的武士和对于荷馬时代刚刚走出母系氏族的希腊人，假如有誰称他是妇女，那是难堪的

<sup>①</sup> 在人类初期妇女的这种崇高的地位証明，男人在肉体上和精神上的优越性其实并不是原有的生理上的必然，而是繼續許多世紀的經濟的和社會的環境的結果；这种环境使男人比处于从属地位和成为家庭奴隶的妇女更能自由而全面地发展自己的能力。布罗卡(Broca)在与格拉底亚来特(Gratiolet)爭論大腦的容积与重量对智力的关系时提出这样一种看法：妇女智力发展的低級阶段或許同她們所受的教育不完善有关。

馬努弗里埃(Marouvier)，布罗卡的学生，巴黎人类学院教授，曾发现由他所測量过的石器时代的男子头盖骨的容积差不多与现代巴黎男子头盖骨的平均容积相同；至于說到女子，那末，按照他的意見，现代巴黎女子的头盖骨要比石器时代女子头盖骨的容积为小。

現代巴黎人头盖骨的平均容积

測量过的头盖骨数目	容积(单位立方釐)
77 个男性的	1,560
41 个女性的	1,338
石器时代头盖骨的平均容积	
58 个男性的	1,544
30 个女性的	1,422

野蛮人男性头盖骨的平均容积要小 16 立方釐，而女性头盖骨的容积則大 84 立方釐。

(L. Manouvrier, De la Quantité de l'encephale [Mémoires de la Société d'anthropologie de Paris, III, 1885].)

侮辱。

据希罗多德說，塞索士特里（Sesostris，古埃及国王。——譯者）为了永久紀念自己的胜利，在被征服的民族內豎立了許多方尖碑，为了对那沒有反抗他的人表示輕蔑，在碑上雕刻了妇女的生殖器作为懦怯的象征。在法国的民間語言里也保留着这种感情的遗迹，在这种語言里也用相同的器官的名称去称呼愚蠢的人。相反地，对于达阿麦人（Dahomens，法属西非地名。——譯者）部落的好战妇女，男子这个别名又被認为是罵人的話。当男子代替女子掌管家庭的时候，男子就摧毀了女子的統治权，占有了财产和滿足了自己的嫉妒的感情。

这个家庭的革命大概是在动产积累的影响之下发生的，由于动产积累而有利于剝夺妇女的統治权。这个变动的剧烈程度随民族的不同而有所差别。拉塞德摩尼亚（古斯巴达。——譯者）的妇女直到进入历史时期还保留自己的部分独立和财产，这使得亚理士多德有理由說，只有在极端好战的民族中妇女才享有最大的权力；在雅典和因商业而早已繁荣起来的其它濱海城市里，妇女已被强制剝夺了自己的权利和财产。阿特加的妇女手拿武器保卫自己的特权并作着殊死的决战，关于这些英勇斗争的記載不仅保存在神話里，而且甚至也保存在希腊历史里。

从家庭进化的这个簡述中我得出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个体家庭的建立，先是母系氏族的形式，而后是父系氏族的形式，打破了氏族的共产主义。在氏族內部形成了独立的家庭，它有自己的、离开氏族而独立的个人的利益。后者已不复是氏族全体成員的統一的共同的家庭，而只是按同血統，即出自共同的祖先組成的許多家庭。

氏族的公有财产因此也就不得不分散开去而形成分开了的家庭的私有财产。

## II. 血族集产制的财产

氏族虽然分裂为个人的母系氏族的或父系氏族的家庭，土地却仍然是公有的，但土地的耕种和产品的消费已经不再是由全氏族来共同施行了。收获一年一度在氏族的所有分开了的家庭之间进行分配。每一家庭耕种自己的一块土地并且单独占有靠独自劳动所获得的产品。这还不算是土地私有制，而只是土地的私人使用权。

家庭不是由一对夫妻，而是由血统关系密切的许多对夫妻组成的；它是一个“灶”或户(un feu)，用中世纪的话来说，就是营共同生活，“吃同样的食品和使用同样的瓦罐”并围绕着一个炉灶的一群家庭。

氏族共产主义位于因血统而联系起来的若干家庭的共产主义。于是就出现了血族集产制<sup>①</sup>。

可耕地分割成狭长的地带，然后按入灶的家数连成若干地段；由不同地带构成的这些地段应当完全一样，因为在分配时非常注意遵守平等的原则；每家所得土地相当于两头牛在两日内能耕完的数量。在印度，这个计算单位等于一把犁能立刻耕完的土地数量的两倍，而在罗马则等于两个尤格拉(Jugera)<sup>②</sup>。

<sup>①</sup> 血族集产制的财产有米尔(Mir)、马克(Mark)、农村公社(Communsauté de Village)等等名称，研究这个问题的人在德国有哈克陶孙(Haxthausea)、莫勒尔(Maurer)、恩格斯等；在英国有肯布尔(Kemble)、梅因(Mainie)、哥姆(Gomme)等；在比利时有拉维勒(Laveleye)；在俄国有叶菲连柯(Ефипренко)和柯瓦列夫斯基(Ковалевский)；在法国有保尔·维约来(Paul Viollet)。

我称这种财产形式为血族集产制是为了使它区别于其所来源的原始共产主义，更由于开始时那些有权每年分配一次公社土地的家庭通常都发源于一个共同的祖先。

<sup>②</sup> 瓦龙(Vuron)和布倫(Pline)说：罗穆拉斯(Romulus)先把土地分给祭祀和公共使用，然后像秘鲁人的办法那样把余下的土地分配给三大部族，每一部分又再分为三十片分给三十个库里亚，而这些库里亚又把得到的土地再细分为更小的部分，因此每一家庭所得到的土地相当于两个尤格拉(Jugera)。

Jugum 或 jugerum 是面积单位，表示一套牛能在一日之间一气耕完的土地数量。

留下来沒有分配的一部分土地准备供給人口的增加，用以支付公共費用，納稅和支付村落中公職人員的薪資等等。这种保留着的土地开始还是共同耕种，后来也出租。

为避免不公平和引起不滿起見，土地段的分配采用了抽签的办法。这种土地分配和分配地段时的抽签办法在一切民族中都可碰到。

上帝命令以色列人(Israélites)一登上乐土就要把土地分配給各宗族和各家庭，按其成員数目之多寡而有所不同，分配应由抽签决定。在希腊文和拉丁文中抽签(kleros或sors)一詞也意味着世襲領地；因为各个家庭的父亲都是由抽签取得家庭的財產。假如有人不滿意，而他的申訴又是理由充分的話，在这种場合可从保留地中拿出一部分土地来补偿他，借以糾正錯誤。

凡亲眼見過这种土地分配的人对于这里面的平等精神和普通农民的土地測量技术特別感到惊奇。哈克陶孙(Haxthausen)写道，“遵照俄国国家財產大臣基塞列夫伯爵的命令，在沃罗涅日省某些地区由业务精通的專門土地測量員和估算家对土地进行了測量和估算。这件工作的結果証明了先前农民所进行的測量除了若干无关紧要的細节外，各方面都是正确的。而誰又知道在这两种測量中哪一种更可靠呢？”<sup>①</sup>

牧場、森林、沼澤、打猎和捕魚的权利、各种使用权和征自商队及商人的稅收等等收入仍然沒有分配而归于村落全体居民的公有財產。

虽然可耕地在各家庭之間定期进行分配，收获也归各家所有，而土地的所有权仍归村落，即构成村落的家庭总体。土地的耕种是在酋长會議或他們的代理人的監督之下进行。据农学家馬歇尔

---

<sup>①</sup> 哈克陶孙：《俄国国内情况、国民生活和农村制度的研究》，法文版，1847年。

(Marshall)談及十八世紀英國集產村落時說：“單獨的家庭不能按照自己的意願耕作自己的土地。它應當在自己的土地上播種村社其他家庭所種的相同的種子。”<sup>①</sup>甚至在土地的定期再分配停止之後，也只是土地的表面屬於它的所有主。土地下面的任何蘊藏都不屬於土地所有者，而是歸於公有。經過爆破地面才能採掘的金屬和煤炭也適用同樣的原則。所有這些權利都被封建領主和國王為其獨占的利益而掠奪去了。法國礦山的永久租契是對社會權利的破壞。

在村公社里耕作通常都實行三田輪栽或四田輪栽制。村落所有的可耕地分成平均的三部分，輪番播種：第一部分種秋播糧（黑麥和秋播小麥）；第二部分種春播作物（大麥、燕麥、豌豆等等）；到第三年它們都要休耕。

播什麼種籽，何時播種和收穫都由村公社的會議來決定。在印度，正如康培爾(Sir G. Campbell)所說，每村都有自己的星相家，所謂婆羅門——曆書，他的任務就是指示什麼日子最適於播種和收穫。哈克陶孫，俄國的“米爾”的集產制風俗的細心的和公正的觀察者，發現了田間工作中也有像軍事紀律似的完善的秩序。所有農民在同一天和同一時間一起下田，各人做各人的工作，一個耕地，另一個耙地等等，收工後也一起回去。“這種井然的秩序不是靠村長的權力所規定的，而只是俄國民族所特有的合作精神和村公社所特有的團結和秩序的需要所致。”使俄國官吏驚異且認為是俄國民族所特有的這些特點實是財產之集體形式的遺迹，而且到處可見。

梅因(H. S. Maine)，他曾充當英國政府在印度的法律顧問而有充分的可能研究村公社問題，寫道：“首長會議不發什麼命令，它

---

<sup>①</sup> 馬歇爾：《關於土地財產之基本的和實際的探索》，1804年。

只宣布习惯是什么样子就够了。它并不制作那被认为最高权力所当颁发的命令。对这个问题最有权威的人士确信印度人的习惯的基础并不是宗教的或政治的批准，习惯的古老便给盲目服从提供了充分的理由。”<sup>①</sup>

哈克陶孙所说的军事纪律是完全自然的而远远不像兵士的动作或美国西陲的大型农场（Bonanza farms, 采用最新农具而致富的大型农场。——译者）的工人的动作那样一种强制的纪律。

收获一完，分配了的土地又重归公有财产，全村的每一个居民都有权在那上面放牧牲畜。这种土地复归公有以供放牧使用的习惯，在土地私有制发生之后还在法国保留了很长的时间；它还扩大到贵族的土地。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对于古代共产主义权利的这种最后残余深致怨恨。据贝桑松（Besancon, 法国东部法郎希-康台的省会。——译者）学院一位获奖者说：“这权利（道路和公共牧场之权）减弱了财产权。承担了此项权利的地产——当它的业主在他指定的日期结束收获之后立即转为公共的财产。它的财产权停止了而暂时让给社会。”<sup>②</sup>

起初土地只在家庭的父亲（第一批占有这土地的人们的后代）之间进行分配，因此每个村民都应当知道和懂得证明自己的族系。在印度的某些公社中有批特殊职务的阶级，专管族谱的编制和保管工作。他们能够一个不漏地说出所有祖先的名字。在阿特加，家庭登记做得很细致，假如把一个依法不属于本部落的婴儿错登家谱，就要受严厉的处分<sup>③</sup>。巴伐利亚人和盎格鲁萨克逊人把村落

① 梅因：《东西方的村公社》。

② 爱特士·得·诺维昂（Ethis de Novéan），法郎希-康台军需机关的一等秘书，所著《回忆录》曾获贝桑松学院奖金，刊登在《1767年的商业、农业和金融杂志》上面。

③ 贝里克尔（Pericles）在他的权力鼎盛时，曾不得不在雅典人民会议面前为了他与阿斯巴西（Aspasi）所生的儿子登上了祖国的登记簿这件事进行辩护，因为阿斯巴西是个外国女子，不能算作他的合法妻子。

土地称作 *terrae aviaticae, aloud parenutum, genealogiae*; 在野蛮的中世紀的拉丁文中, *genealogiae* 一詞的含義相當於 *proprietas, bona avita* 和村落 (Du Cange) (*Lex Alamanorum*)。

作為祖先的財產, 土地屬於家庭的父親——家庭的代表——並被稱為 *patria, fatherland*, 即父親的土地。在古老的斯堪底拉維亞的法律中, 祖國和房屋這兩個詞是同義語: 有房屋就等於有權分土地——有權愛祖國。同樣, 只要有權分土地, 就能獲得祖國和政治權利。家庭的父親和兒子全都負有保衛祖國, 即保衛他們的財產之責; 也只有他們才有攜帶武器之權。不合邏輯的, 和與過去一切相矛盾的資本主義的文明把祖國的保衛托付給寸土毫無人的人們, 又把政治權利交給那些被剝奪了一切財產的人們。

### III. 土地私有的起源

半開化人和野蠻人的邏輯智力已能理解凡是他自己親自製造而又經常使用的物件可以占為己有; 但是那不是任何人所創造且一年中又只有部分時間使用的土地也成為個人占有的這種思想在他們是會發生的, 這種思想只是經過迂迴的道路才最後進入人們的腦中去。

土地私有制並不像盧梭<sup>71</sup> 的感傷的學說所講那樣是從被圍的耕種過的地開始, 而是從房屋修建所占用的那些地段開始, 因為房屋被認為是動產, 可以歸屬於修建房屋和住居其中的個人所有。因此在許多野蠻人和半開化人中間, 房屋也同死者的其餘動產 (如武器、心愛的家畜等等) 一起焚毀。最古老的英國法律和某些法國的習慣法<sup>72</sup>, 例如里爾 (Lille) 城的習慣法都把房屋算在動產之內。

共產主義的野蠻人和半開化人的個人自由是不容破壞的。作為被占有的財產的房屋亦如它的占有主享有同樣的不可侵犯的權利, 甚至在人失去了這種權利之後, 房屋還在很長時間內保留着

它。在市民为债务可能坐牢和甚至被卖作奴隶的那种社会里，他的房屋仍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得家长的允许任何人不能进去。国家的执法者停止于它的門坎之外，假如犯罪者躲藏在自己的房子里或者甚至只是触及房屋的門門，他就可解脱社会的惩罚而处于只对父亲的依属的关系，因为家庭里的立法和行政之权是属于父亲的。紀元前 186 年，羅馬元老院判处了几个羅馬妇女的死刑，因为她們的狂飲濫醉攪乱了共和国的安宁和道德。它不得不把这个判处的执行委諸家长，因为关在自己屋子里的这些妇女只服从家长的管轄，法律是达不到的。这种不可侵犯的权利非常严格地被遵守着，以致一个羅馬人为了管教自己的不肖之子不能求助于法庭和社会的权力。在中世紀，牟罗茲 (Mulhouse) 的一位市民可以躲在自己的房子里而逃避城市法庭的裁判，法庭审問只好搬到他的門前去进行；他可以走近窗戶来回答对他所提出的問題。后来的多神教庙宇和耶穌教教堂保留了避难所的权利，就是住宅不可侵犯的这种权利的变态。教堂，如以下将說到那样，是公共的房屋。

野蛮人的村落里的房屋彼此互不相連，而是周圍用土地帶分隔开的。塔西佗也像后来的許多历史家一样認為这种隔离是預防火灾的措施，由于这种房子通常都是木結的和盖了麦秆的屋頂，因而火灾危險很大。但是，这样普遍的习惯的原因显然不在这里。前面已經說过，野蛮人和半开化人的部落狩猎的地段周圍都有一中立地帶；同样情形，住宅为了与邻居的房子离得远一点，彼此之間也隔着一条无人占有的地帶。后来这土地与房子連成一起并被宣布为私有財產。这时在它的四周圍安上了柵栏或石牆。野蛮人称这片空間为“合法的院子” (curtis legalis, hoba legitima)。隔离住宅被認為如此必要，以致在十二銅表法<sup>73</sup> 上規定了城市中房屋的間隔应留二呎半寬的空地(銅表法第七條，第一款)。



不仅是房屋，而且連属于各家庭的地段都应当隔开，而这种預防自然不是为了防火。按照十二銅表法的規定，不同的土地之間都应当留出一條寬五呎的未耕的地帶（銅表法第七條，第四款）。

#### IV. 正义和盜竊的起源

氏族或克朗的公有財產的一部分分割成若干地段，分給各家庭暫時占有，是一項比我們時代再將不動產復歸為公有財產還更帶有革命性質的新措施。土地的私人使用和土地產品的個人占有經歷了很大的困難才成功，而且只有把它放在神和懲治的法律的庇護之下才能維持。應當補充說明：法律一般地只是為了保護這種新措施才發明出來的。正義不是近親復仇<sup>74</sup>（古代的報復）的滿足，它只是作為私有財產的產物才出現在人類社會中。洛克說：“凡是沒有財產的地方，就不可能有非正義。這條原則正如歐几里德（Euclide）<sup>75</sup>的任何定理一樣確切無疑。財產的觀念是對某物的權利，而非正義則意味著對這權利的領域的侵犯，或者對它的破壞。”<sup>①</sup>連格（Linguet）<sup>76</sup>機智地對孟德斯鳩<sup>77</sup>說：“你的‘法律精神’只是財產精神而已。”宗教的儀式曾把那與財產的共產主義性質格格不入的私有財產的崇敬印入原始民族的迷信的想像中去。在意大利和希臘，在一年的某些日子裡家長們沿著自己的邊界土地繞行，前面趕著一群待屠宰的牲畜，唱著贊美歌和向那標示邊界的界石致祭，這界石羅馬人認為是神——termes——，而希臘人則認為是神界。耕地者不應當接近界石，假如他不想聽到被犁鏵驚動了的神向他高喊說：“停止吧！這是我的地，那邊才是你的。”（奧維德<sup>78</sup>，歌第二章）。耶和華不得不用無數的教訓和恐嚇來使人尊敬他人的田地：“不可挪移你鄰舍的地界。”（《申命記》，第十九章，第

① 洛克：《人類悟性論》，第四卷，第三章，第十八節。

十四节)<sup>79</sup>，“挪移邻舍地界的，必受詛咒。百姓都要說：阿們！”（同上书，第二十七章，第十七节）。約伯(Job)，这个私有欲极强烈的人，曾把破坏界标的人算在最坏的人之列（《約伯記》，第十四章，第二节）。当論到财产时，柏拉图就忘記了自己的理想主义。“我們的第一条法律应当是这样的：任何人也不得触动分隔他的田地和他的邻居的田地的界标，因为界标应当是不能动的。任何人也不得移动他曾經发誓过而在某一地点所設下的界标。”（《法律》，第八章）埃特路斯貴人(Etrusques)使用了一切恶毒的話来咒罵破坏者：“凡触动界标或拔去界标的人必遭神譴：他的房子将被毀灭，他的氏族将要灭絕，他的土地将不再結实。冰雹、鏽病、天火将摧毀他的收获，他的四肢将滿布裂口而潰烂。”<sup>①</sup> 私有财产帶給人类的远不是对待自己同类的友爱关系。

詛咒对于原始民族的紊乱的、好作幻想的想像力曾发生过十分强烈的影响，但当詛咒的道德力量尚不足以阻止哪里有可用的物件就到那里拿取的习惯时，便不得不訴諸空前殘暴的肉体懲罰，这种体罰是同野蛮人和半开化人的风俗和情感极端矛盾的。为了应付繼續不断的斗争生活，他們的确互相引起可怖的折磨，然而这种折磨任何时候都不帶有懲罰的性质。正是这些私有者的祖先才想出了“爱他就要打他”(qui bene amat, bene castigat) 的可怕办法。野蛮人是不打自己的孩子的。卡特林說，一个北美印第安人部落的酋长很奇怪地向他說他“在边界上看到白人打自己的孩子，这是非常殘酷的”。

流本族人的血，杀死本族的一个成員，——这是野蛮人和半开化人可能犯的最可怕的罪。为了給他复仇，全氏族都应当起来。当氏族成員之一犯了杀人罪或其它罪行，为了不使其他成員受到玷

<sup>①</sup> 神圣的公式，富士台尔·得·孔朗格(Fustel de Coulanges)在他的《古代城市》一书中曾加以引用。

辱，那末，將罪犯打一頓之後即趕走他和把他獻給地獄之神。當雅典脫出半開化狀態之後很長時間內從市民中找不到肯去擔任警察任務的人。不得已而求之於奴隸，于是就出現了奴隸打自由人的奇怪的現象。

財產一經產生就教導半開化人蹂躪所有這些神聖的感情。這就出現了用死刑來懲罰敢於侵犯財產者的法律。十二銅表法上說，凡在夜間偷割鄰田的庄稼或在鄰田縱放家畜者將被獻給采來拉<sup>80</sup>和處以死刑，假如他是成年人的話；假如他未達成年，那末照法庭的裁判將受杖責并被科以兩倍於損失的罰金。敗露了的賊（犯罪者當場被捉），假如他是自由人，則於杖責之後貶為奴隸；縱火燒小麥塚者應受鞭打并置於篝火上燒死（銅表法第八條，第九、十、十四款）。布爾貢得（Burgonde）的法律，其殘酷甚至超過羅馬的法律：婦女和十四歲以上的兒童犯了偷盜牛馬之罪，假如他們的父親和丈夫不立刻舉發，法律就要判他們當奴隸（第四十七條，第一、二款）。財產把告密也帶到家庭里來了<sup>①</sup>。

這些道德的咒語和肉體懲罰在一切民族中都可碰到，到處一樣殘酷：它們證明了私有財產進入共產主義的部落會遇到多么大的困難。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為在實行血族集產制之前，野蠻人總認為氏族所占有的一切也是屬於他的，他可以按需要或隨心所欲地使用它。有些曾經親自試驗過隨手拿東西的權利的旅行家稱野蠻人是賊，似乎在尚無私有財產的地方就可能存在着盜賊。

然而只是在集產制確立之後，那種見到什麼就占有什麼，想要什麼就占有什麼的習慣才變為犯罪。既然集產制已擴大到氏族各

---

<sup>①</sup> 財產常常總是血腥的和殘暴的；還在不遠的過去，在非常篤信耶穌教和非常耕博愛的國家里，當絞死盜賊的時候，假如有時間的話，總是先行拷打一頓。不久之前，在英國對偽造紙幣者還判處死刑，而在一切文明國家內，他們只判終身苦役。1848年6月和1871年5月無數犧牲者的血也是為財產的祭壇而流。

个家庭的收获物和畜群，为了战胜这种根深蒂固的习惯，便有必要求助于宗教迷信和肉体惩罚。

非正义的和可怕的审判以及惩罚过失和犯罪的丑恶的法典只在私有财产确立之后并作为它的必然后果才出现在人类的历史上。

## V. 集产制的基本特点

父系氏族的家庭是许多家庭的结合体。家长是同自己的兄弟、子孙和他们的妻子与儿女生活在一起，这些人都服从他的统治。父系氏族家庭的命运是这样紧密地同集产制的形式联系在一起，以致后者成了它生存的必要条件，只是当集产制开始分解，如像氏族的公有制曾经发生的分解情形那样，父系氏族的家庭才解体。被先前的公有财产结合在一起的一切单个的家庭都各别地组成并建立起现代的家庭，进而达到最简单的和最后的形态——一夫一妻制。

家庭和财产经历着相同的发展阶段。氏族开始是全体成员的公共家庭，后来它才分为母系氏族的家庭，继而再分为父系氏族的家庭。父系氏族的家庭是由许多家庭组成的集体家庭，而父系氏族家庭反过来又分解为单个的家庭。

公有财产过渡到母系氏族家庭或父系氏族家庭的集产制，而当它被一个家庭或组成父系氏族家庭的几个家庭占有的时候，它又被改造成私有财产。

古代社会都承认财产对维持家庭的重要性。在斯巴达，在平等的古典的土地之内，凡失去了家庭财产或者浪费了家庭财产以致无力支付公共费用的公民就要被逐出平等的（omoioi）贵族的圈子之外，而只有这个圈子里的人才具有政治权利。雅典的国家很注意家庭财产的管理。一切公民都能要求剥夺家长的权利，假如他管不好自己财产的话。集体财产既不属于家长，也不属于家庭

的現有成員，而屬於家庭整體——一個不死的生物，它會一代接一代地活下去。它屬於過去的家庭、現在的家庭和未來的家庭。它屬於留下了祭壇和墳墓的祖先和在世的成員，他們享用財產並且應當繼承傳統和維持家庭財產，使它完整保存好傳給後代。

房屋是家庭財產的核心。雅典的法律允許出賣土地，但禁止出賣房屋。土地財產不能詛渡。它不能越出家庭的範圍，甚至不能分配給家庭的成員：當父親沒有留下男性後代的時候，希臘的女繼承者就應當嫁給自己父親的親屬，這個男人於是便成了繼承者。法蘭克和其他日耳曼部落的法律上說：“假如死者沒有留下兒子，那末金錢和奴隸可以傳給他的女兒，而土地則應歸於父系的最近的親屬。”(Lex Thuringorum) 家長有時是推選的，他管理財產。他應當留意土地耕好了沒有，房屋整理好沒有，應當關心家庭公社成員的需要。他應當把財產傳給自己的後代。正像他從已故的先輩接管過來時那樣興旺。為了有可能執行所有這些義務，他就享有獨裁之權。他是立法者、審判官和執刑者。他審訊、宣判和（肉體上）懲罰受他統治的公社成員。他的權力擴大到可以把自己的兒女賣作奴隸和使其下屬遭受死刑，這裡還包括他的妻子在內，雖然後者是在自己娘家的庇護之下，而這種庇護是很不可靠的。

分給每一家庭公社的土地數目通常都按照組成公社的家庭數目為比例。公社的社長為了增加家庭公社的人數，就使幼齡的男童同年長的女子結婚，這些女子便變成他的妾和公社的奴婢。哈克陶孫說，在俄國的鄉村里曾看到成年和壯年的婦女手上抱着自己的小丈夫。

家庭是國家的基礎這句平平常常的話，道德家和政治家已經反復講得令人生厭了，目前自然已不正確，但在實行集產制的時期却是真理的語言。

所有建立在集產制基礎上的村落都是一個自營獨立生活的小

国家<sup>①</sup>。它的政府就是享有平等权利的家长組成的家长會議。在印度，那里财产的体系达到充分的发展，公社有許多的公務員：手工业工人（大車匠、紡織匠、裁縫、担水工、洗衣工等等），学校教員，他們把字写在沙上来教学生念讀；家譜員，他們应当記住每一家的来历；天文家，他們預言播种和收获的吉日；为全体居民放牧家畜的牧人；供宗教仪式之用的婆羅門以及舞蹈員。所有这些公務人員都靠公社經費維持并且应当无代价地給第一批移民者遺下的家庭服务，但是不为晚来的异族服务。康伯尔（G. Campbell）順帶还讲了以下的奇异的細节：鉄匠和还有某些手工业工人所得的报酬优于僧侶。

村落选举村长要看他的智慧、管理的能力以及魔法的修养如何。村长管理公社的财产；只有他有权同其他的米尔进行交易，出卖多余的畜群或农产品并买进本公社不能制造的物品。照哈克陶孙的考察，交易只限于躉卖，这是非常有利的，因为假如让农民各自去做，有时就会被迫以低于产品的实际价值和在不利的时机出卖自己的产品。相反地，假如交易掌握在村长之手，那末，由于自己同其他邻村村长的联系，他可以等待漲价才訂契約并利用一切有利的情况。凡是知道法国的商人如何横蛮无礼地掠夺小农，便会承認以上的想法是正义的。资产階級像一群餓狼似的扑向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从事掠夺和搶劫，他們对于不能与阿拉伯人发生直接的和个人的关系而只能同小公社的首領打交道深致不滿。资产階級的代表經常过甚其詞地議論这些貧苦的阿拉伯人的命运，說他們連被欧洲商人掠夺的自由都沒有。

建立在集产制基础上的这些小社会具有任何一种其它社会結構的形式所沒有的生活力和牢固性。梅特卡尔夫（Metcalf）勋爵

---

<sup>①</sup> 俄国的农民生老病死都在公社之內。在他們看来，在公社以外一切都不存在。因此米尔（mir）这个词的含义既指世界，又指农村公社。

曾当过印度总督，他在1832年研究过这个问题之后写道：农村公社是一些小的共和国，他们几乎生产自己所需要的一切，几乎不依赖外界。它存在于任何别的东西都不能站住脚的地方。王朝换来换去，革命接着革命：印度人、巴当人(Patans)、蒙古人、麻拉达人(Mahratta)、西克人(Sicks)和英国人轮流当过这个国家的主人，而农村公社始终不变。在风暴的日子里，他们便武装起来和修起堡垒。假如敌人的军队通过国境，公社就把家畜赶走而不予抵抗地让它过去。假如劫掠和破坏向他们袭来，而攻击的力量又不能抵挡，他们便逃跑和躲藏到友邻村落中去；当风暴过去，他们又回来重理旧业。假如连年不绝的杀戮和劫掠把这个国家蹂躏得不能安身，居民就向四方分散；但是只要一出现恢复和平事业的可能，他们立即重新归来。一代人可能消灭，但是下一代又恢复起来。儿辈重新占领祖先的土地；村落将在同一地点建立；房屋将有同样的布局；而后辈将有同样的土地。……想把他们从那里赶走是不容易的。他们往往顽强地顶住了长时期的骚扰和风暴而终于获得了足以战胜劫掠和暴虐的力量。接着梅特卡尔夫勋爵带点忧伤地承认“这些农村公社任何外力都无法毁损，可是却被我们的法律和法庭轻易地破坏了”。

资本主义的剥削不容与集产制并存。它无情地消灭了它，代之以个人所有制。目前在印度和阿尔及利亚所发生的事情，过去也在法国发生过。农村公社曾通过了所有封建的时期而一直保持到1789年，这才被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和革命之后所创制的法律的力量破坏了。伟大的革命的法学家麦林·嫌疑者(Merlin Suspect, 因他是共和国嫌疑犯法律的报告人而得名)，只是他一个人在促进公有财产之消灭和解体并把它从农民手中“解放”出来上面就比封建领主在过去的许多世纪里所起的作用还要大得多。

除了政治原因迫使专制政府保护建立在集产制基础上的家庭

的和公社的組織之外，行政秩序也是很重要的原因。每一个公社都是一个行政单位。村长統治着公社并以公社名义进行貿易。政府委托他担負收稅征兵及其它无报酬的任务。在俄国，帝国政府給村会(1861年后帝俄的基层行政单位。——譯者)以支持，要求执行它的决定，凡違反者就要送去当兵或流放西伯利亚。1789年以前法国国王曾作了許多努力来保护公有財產和保留农民的特权及其共产主义的組織，往往都能获得成功，这些东西即在农民由自由的私有者变成了农奴之后仍然保存着。

氏族的共产主义組織和集产制，虽然后者把共产主义縮小为几个家庭在一个屋頂之下的共同生活，在农奴里面仍然繼續存在，农奴在自己的村子里修筑了公共畜棚和粮仓。

这些农奴公社的住宅往往都建筑在設有防御工事的城堡脚下，称为茅舍(collae)。許多村落至今还保留着这种名称。以前的农奴虽然获得了自由，却繼續过着公社的生活，一直到法国大革命之前，貴族的土地都是由农民的共产主义协作进行耕种，貴族認為这是有利可图的事。他們从未想到要去破坏这些公社的組織，相反地，当給土地让农民耕种或将它让給农民所有时，他們反而要求农民把公社保存好。伯里西奥(Perreiot)(第一卷，第五章)提到1549年布尔古丁的僧侶与貴族共同公布的告示，那上面禁止脱离了农奴地位的农民成为土地所有者，假使他們不組織为公社的話。达諾斯(Dalloz)(普通的法学家)說到十七世紀的一張契約，在那上面領主拉·瑪尔舍(La Marche)把自己的土地交給永久的对分制租佃，附了这样一个条件，就是“农民租佃者将使用共同的鉄鍋，共同的灶和共同的大圓面包并将經常过公社的生活。”十八世紀的法学家杜洛得(Dunod)在其所著《Traité de la mainmorte》(《产业永不变更專論》)一书中解釋領主这种要求的原因：“他們之所以要求农民贊同共同耕种是因为老爷的土地只有这样才能耕种得



好，公社有可能比个体家庭向領主繳納更多的租稅。”而資本家向我們說，在共产主义之下劳动者也像他們自己是些懶虫和一些毫无用处的人！

## VI. 农民的公社

鼠目寸光的經濟学家把現代的被私有制敗坏了的农民所有制視為农民的永久的典型，并且郑重其事地想使人相信农民因而常常是敌視共产主义的，农民什么时候也不可能共同劳动和共同消費他們劳动的果实。从幻想領域中汲取来的这条原則无数次重复着，最后竟被認為是資產階級智慧的不能辯駁的真理。然而如欲証明其虛偽性，只要翻一下波馬諾阿（Beaumanoir）和格·柯基尔（Guy Coquille）的著作便足够了。他們在相距三百年的期間（波馬諾阿在十三世紀，柯基尔在十六世紀）收集了大量的关于法国农民公社的証件。

构成公社的“同志”、“同事”，柯基尔称之为“大田的农户”（mesnages des champs），他們耕种領主的土地，他們是那些命运相同按抽簽法平均分配土地的半开化人“同伴”的后裔。

拉菲里尔（Laferrière）說得不錯，“联合为公社的这种习惯（的起源）应追溯到民族大迁徙以前的半开化时期”，并在其中看出“古代克勒特人的民族的遺迹”（Histoire du droit français）。这种意見还有更正确的一面，就是認為这些公社只由血統共同的人們組成；后来，当它們也向其他的人开放时，为了容納族外人就需要特殊的契約（如德萊〔Drou〕及舍尔特拉〔Chartres〕的习惯法等）。

然而当綿延几世紀之久扰乱国家的混乱的后果，家庭分解了，家庭成員离散了，但是共同生活的习惯在农民中終究非常強烈，以致公社單純地由同一村子的居民来重建。波馬諾阿說：“社会是靠

习惯的力量建立起来，以便共同食用粮食和其它食物，因为公社成员的财产是共同所有的。”这不是那样一种社会联合，在共同行动之前它的组织条件已经经过深思熟虑和经过讨论才作出；决不是的，这种公社是从默契，用中世纪的话来说，即单纯地从很短时间内的共同生活中产生出来的。

据柯基尔说，“集体地从事最辛苦的田间耕种工作的”家庭是由许多人组成的：“一部分耕地和赶牛，这是一些缓慢的牲畜——按照习惯，拉一具犁需要套上六头牛；另一部分应当把母牛和母马赶到田里去，第三部分赶母羊和母绵羊，而第四部分担任放牧猪群。”这些详细的叙述是重要的，它证明畜牧业和农业在这里结合起来。“所有的人都是按年岁分配工作，服从于公社的一个首领，称为共同体的主人 (maître de communauté)，专为这件事业和统治其他人而选出来的……在桌子上他坐首席……管理城市中、家中和其它地方所发生的事；假如事情关涉到属于公社的动产的话，便可以强迫自己的同辈 (parçonniers) 听从他的命令；只有他有权分配租赋和其它的税赋。”

这样一来，这些农民公社的首领便执行了印度的村长和俄国“米尔”的长老的全部职务。

“在这些公社里对尚无做事能力的儿童期望着他们将来能工作；对青壮年则打算他们现在就能工作；对老年人则打算听取他们的贤明忠告和介绍他们过去劳动的经验。所有不同年龄的人们就这样千方百计地彼此扶持并组成一个政治的整体，它靠新陈代谢而长期存在下去……依据这些材料可以看出，这些公社是一个整体、一个家庭、一个学校，它意识到自己的利益，组成一个统一的机体，总之不是彼此孤立的。博爱、友谊和经济的联系——就是靠这些东西把他们联结成统一的机体。”

几乎在全法国都能找出这些农民公社的遗迹，柯基尔把它比

作一个身体，它的各个肢体是靠共同的感情和利益联结起来<sup>①</sup>。格納尔(Guerard)在那些耕种圣日尔曼·德·勃来修道院土地的九世紀的农奴和佃农中間发现了这种制度，它一直保留到革命以前。但是十八世紀后半期的土地所有者不再像以前的貴族那样保护这些公社了，认为公社对于土地收入是有害的而要求消灭公社也同时一并消灭那些累世相傳的权利，这些权利农民們甚至在失去了被封建領主夺去的土地之后还保留着。資產階級历史家把这个革命說成是为了农民的利益而完成的，其实革命既夺去他們的权利，又破坏了公社。

在1787年貝利(Berry)省議會會議記錄中有一份关于貝利衰落原因的報告，那上面扼要讲到地主对农民和他們的“大田的农户”的主要抱怨是什么。

衰落的第一个原因是劳动階級的懶惰。“貝利的工人的这种恶习一定是由来已久，因为在布尔日(Bourges)市政府所应許的特权中間，我們找出了一种，它在欧洲任何一个城市中都已不复碰到，这就是規定每年葡萄种植者的工資数额及其劳动时数的权利。”这个報告由于不明情况而犯了錯誤，事实是不論在法国也好，甚至在欧洲也好，到处都是地主把規定最高限度的工資和最低限度的工时之权据为己有，他們把它强加于城乡的工人。而現在是工人起来要求規定最低限度的工資和最高限度的工时了，仅仅这一事实就足以証明从1789年起工人的状况已如何恶化。

大家都曾設法支持引起地主老爷如此失望的这种可詛咒的懶惰，支持这些劳动的功臣。

“貝利的习惯法是由那些只知忠于古风而不知有其它更好办

---

<sup>①</sup> 多尼奥尔(Doniol)說：“在寺院文书和地方习惯法汇編里的地图上标出的大部分村子、农户、小村庄和农庄，假如它們的名称沒有指出該地地形的明显特点且在其前置一小品詞 Les，那末它就指出这里存在着这样的公社。”(亨利·多尼奥尔：《法国农民階級的历史》Histoire des classes rurales en France, 1865年。)

法的人們編訂的”，習慣法上規定，“長滿了千金榆、帶石南和灌木叢的未耕種的地点以及熟荒地任何時候也不能成為禁區；森林在五月間，每隔三年一次……和牧場從七月十五日到三月十五日也不能被認為是禁區。”因此，像在集產制時期一樣，它們仍然是農民家畜的牧場。“從以上所述得出在貝利任何人都不能認為自己是絕對的和完全的私有主”——而習慣法的“目的是在於保證家畜處於這樣一種境況，即它們的主人可以不必操心它們的飼料。”圈地權是革命前地主的基本要求。

但是公社引起了貝利地主的特別的憤怒。“大多數個別的家庭聯合為公社……三、四個已婚婦女生活在一起並不少見。不僅夫和妻的財產在那裡被認為是共同的；習慣法的制訂者秘密地規定了兄弟和姊妹乃至外人的財產的共同性，只要這些外人是過共同生活，實行共同開支，分享收入、利潤和分擔虧損。……其結果便發生了幾乎是永久的公社，它存在越久，要想消滅它越是困難。”

“……每一公社都應當有首領和主婦……習慣要求，假如兄弟姊妹生活在一起，長兄就成為首領，而主婦卻是比較年輕的婦女。因此，一個公社是一個共和國，在這共和國里力求規定權力的平衡。每人都有權享受公社的收入，就是享有靠公社經費得來的，而常常是靠地主供給的住宅、食糧、衣服和鞋子……由此產生的結果是：地主養活了許多人，而他的領地卻沒有改善，人手雖多，工作卻做得很少。除了懶人之外，還要加上許多多餘的人口，凡是有三、四個生孩子的婦女的地方就免不了出現這種現象。你這就會明白為什麼雖有肥沃而又寬廣的土地，而其收穫僅足養活佃農家庭。”

“在我們所描寫的共和國中應當統治着相當嚴重的無政府狀態。但是它的首領享有很大的權力：他賣出、買進、轉賣，——一句話，他可以隨心所欲；這是一個不做工作的人……

最後，既然有許多閑暇的時間，那末就出現了愉快的消遣。而

游手好閑就成了我們所描写的人們的快心之事。但是也还需要消遣，以便把一天中的大部分空閑時間填滿。一部分人喜欢捕魚，他就成为公社的捕魚者；另一部分爱好打猎——他就是猎人；第三部分喜欢做套索，他为了摆設这玩意和監視它一天要消磨掉四、五小时；只要他帶回猎获品，人們是不会責备他的。”假如公社使十八世紀的資產階級私有者不高兴的話，那末它們無論如何，給予农民的自由和幸福比資產階級的历史家和政治家說的那次为农民利益而完成的1789年革命所給予农民私有者的要多得多。

支持着法国和欧洲农民的共产主义本能的这种集产制保證他們免于穷困。哈克陶孙写道：“无产階級在俄国还没有，而当‘米尔’存在的时候，无产階級也不能形成。一个人在这里也可能变穷和耗尽自己的財產，但是父亲的不幸和过失是不会影响儿輩的命运的，因为后者不是向家庭，而是向公社提出自己的权利，所以也就不繼承父亲的穷困。”正是这种抵御穷困和无产階級状况的保障使得資產階級不喜欢公社，因为資產階級的发財致富是建立在工人的穷困上面。

集产制具有显著的生命力和穩固性，它把这种生命力和穩固性賦予靠它生存的小农社会。它給予农民幸福和培养他們好客、友爱和团結的感情。并且由于它所完成的事业而輝煌灿烂。欧洲的土地并不像宗教傳說所講那样是由僧侶而是由实行集产制的半开化人开垦和耕种的。<sup>①</sup> 随着村落人口的增多，公社每个成員分得

① - 僧侶和牧師参加耕地时，他們把征自奴隶、佃农和家臣的貢賦拿来大吃大喝，同时他們帶着一种比贊美上帝还要狂热的心情唱着下面的歌詞：

美好的可口的酒……生活的快乐……祝福你，賞心悅目的顏色……祝福你，芬芳四溢的香气……祝福你，入口生奇味，甜蜜地封住了舌头。篤敬宗教的僧侶群，所有他們的僧困，开怀暢飲——現在和永远。幸福啊！你进入的胃脏，——幸福啊！你浸潤的舌头，——幸福啊！你洗滌的口腔，——嘴唇也怡然自得。我們恳求你多来一点吧，——使我們的盛筵笑語喧嘩；——使我們生气勃勃，快乐地高歌——讓我們来过愉快的生活！

这首歌的变体曾由梅里尔的爱得勒斯坦 (Edelestand du Meril) 重刊于《中世紀拉丁民歌》里，这是在法国、德国和苏格兰的修道院里找出来的。

的土地便相应减少；为了获得新的可耕地，森林被砍伐掉。柯瓦列夫斯基說：“这件清除的工作很少是由个别的家庭来进行。由共同的努力完成了开拓之后，整个的群就共同占有土地……十六和十七世紀俄国的公文上証明着这类的事实。这样的事直到今日还經常出現，因为主要的公社(La commune métropole)拒絕承認自由的土地(这在古代法国的法律上称为‘essarts et purpises’)可以属于个人所有。”<sup>①</sup>

作为农民公社所完成的巨大事业的例証可以举出印度的惊人的灌溉工程和爪哇斜坡地上的梯田的耕种，这种梯田据华来士(Wallace)說每每綿亘几百公里：

“随着人口一年一年增加，梯田也不断增加。工作是由全村的居民在村长监督之下共同地进行，这项工作也只有由全村来进行才能完成数目这么多的梯田和灌溉运河。”

## VII. 集产制的分散

当氏族分解为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的家庭时，公有财产就分散了，由于这种分散而产生的集产制在父系氏族家庭的联合經濟瓦解之后，又輪到进一步的分散，产生了个人财产。

不动产的这两种形式的相繼分散是由存在着动产这一事实所引起的，动产不論在过去还是在現在都是土地财产变换的最活跃的因素。土地财产由公有轉变为个人所有只是由于动产的这种轉变才能发生，动产按其本質是倾向于归个人所有。

共同生活在一个氏族家庭内的母亲，当她脫离出来时随身带走了零星杂物并且自立門戶，这种住宅虽然非常粗陋，但实质上已是动产而且就被这样承認了。并且修筑住宅所占用的那块土地也同它构成一个整体，都变成个人财产。很快地个人财产的概念就扩

<sup>①</sup> 柯瓦列夫斯基：《論家庭及财产之起源》，斯德哥尔摩，1890年。

大到住宅周圍的土地，這土地或用籬笆或用石牆圈起來，與房屋一起形成為家庭的不動產，其後果所及就使集產制愈來愈受到損害。

這種擴大由於那些有利於商業發展的村落和村莊里的動產的增加和積累而迅速完成。村落中父系氏族家庭之間的平等已被消滅；一部分人負了債，貧困化了，另一部分富起來了並且利用財富去獲取公社的土地；負債者的分有地慢慢轉到高利貸者的手裡去。

財富的積累甚至在父系氏族家庭內部也已發生。開始時一切都是公有的：任何一個家庭成員除了只有個人使用的物件之外，什麼也不得占有。在印度的公社村落的家庭中貨幣不能用於交易；貨幣只用作奢侈品和縫在衣襟上。一切獲得物統通納入公共倉庫。斯拉夫人的成語說：“不論把母牛牽到哪裡，它總是要生小牛的。”這句話的意思是說：一個人不管靠什麼方法發財致富，他都應當同自己的全家共同享受。這是正義的，因為家庭的一切成員都有權享受家庭所有的一切，只要他不是因為犯了什麼罪或其它重要原因而被逐出的話。他可能出去，離開好幾年，一旦回來，家庭中永遠有他的位置。

在羅馬和斯拉夫人的國土上成為第一批動產的是戰利品(*peculium castrense*)。這種特權逐漸擴大到那些因服務於國家和教會而獲得的和被妻子當作妝奩而帶來的財產上面去。這樣一來，在戰利品之外又形成准戰利品(*peculium quasi castrense*)。

拿這些自己得來的財產進行交易是被允許的，有了這些財產就可以得到奴隸，於是財產就由家畜、奴隸、珍寶、金錢和甚至不動產組成。與財富一起在公社的成員之間以及組成公社的家庭之間滲入了不平等。和睦消滅了；在每一家庭中出現了自己的利益，往往與別的家庭相對立。最後，家庭分解了而各立門戶。這就建成了像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這種家庭。

集產制和與之相應的家庭制度在那些不是商業和動產積累中

心的村落里改变非常迟緩。这些财产形式要不是受到外力的冲击,大概还会存在若干世紀。事实上,实行集产制的公社是經濟的单位,它生产一切必須品来供应自己成員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在公社里很少产生破坏和諧的因素:那里一切都是按照傳統办事,傳統当作傅家之宝被祖先保存着并一代一代傅下来。因此,当农村公社使工农业的发展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就能滿足自己成員的简单的和为数不多的需要,似乎在它本身不能找出进化的原因;只是外界才使它运动。

冲击它的第一个力量是专制政府;正是它們才是专制主义所依以建立的基础的真正破坏者。

在印度发生恶劣有響影响的国家的苛捐杂稅是促使农村公社貧困化和瓦解的最有力的因素之一。

起初賦稅是用自然物并按收获的比例繳納。但是这种納稅的方法不能滿足中央集权的政府:他們开始要求用貨幣納稅并預先規定納費的数量,不管收获有多少。为了納稅,农民常常被迫求助于高利貸者,这是些公社的瘟神。这些有政府作后台的恶棍肆无忌惮地搶劫他們。他們把农人变成純粹名义上的私有者,只是为了偿付因繳納稅賦而日益增加的債務才劳动。高利貸者到处受到深恶痛絕的鄙視和仇恨。在俄国反犹太人运动之所以引起这样的狂热,出現狂风暴雨的場面,只是因为那里的农民把犹太人和高利貸者視为一丘之貉。同时还惩办了許多基督教徒,这些人靠农民发財致富并不比最虔誠的亚伯拉罕之子孙遜色。

公有财产的分散也可以作为农业进步的結果而自然地产生。随着耕作方法的改善和随着产品出售的出現,农人們开始觉察到为了从劳动和施于分地的肥料中取得全部利益,一年的時間是不够的。他們要求把土地的分配期限延长到二年、三年、七年和二十年。俄国政府在人口調查时期被迫进行分配;庄稼人称这种分



配为黑分配，即是說恶劣的分配，因为这样的分配对于那些成为最后一次分地的所有者的家庭是不利的。因此还可看到，可耕的、施过肥的土地开始时每隔若干年还要重新分配一次，而最后终于成了占有的家庭所有，牧场则每年仍继续分配。还在可耕地变成家庭的私有财产之前，栽种在应当分配的公有地上的树木已经是栽种者的所有物。

在公社的村落中所有家长彼此之间都是平等的，因为他们都来源于同一氏族。定居在这些村落中间的外族人或者是手工业者，或者是战俘，经过了若干时期，按照接受加入氏族的古制，也取得了公民权，因而也可以领到与本地人同样多的分地。这种收容外族人的办法自然只有在人口增长缓慢和旷闲土地又多的情况之下才有可能。在人烟稠密的村落中，一部分人被迫从村庄上遣散出去，向新的地点移民和砍伐邻近的森林。有时每一个家庭都有权在一定的地区以外独立地开垦土地，经过了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之后，它们就被承认为这些开垦地的所有者。

但是由于大量吸收外族人，那些位于海滨、沿河两岸或道路交叉点的村落中的未开垦的丰饶土地很快就消灭了。

在这些变成了小城市的村落中已经很难取得公民权；甚至为了取得居住之权需要缴纳相当高的税款<sup>①</sup>。新来者不能参加土地的分配，他们不能享用公共的牧场和不能成为城市的公职人员。这些权利完全属于构成特权阶层的本地人。这些特权阶层是：公社的贵族，城市的富有者，一方面与封建贵族相对抗，另一方面又同手工业者相对抗，这些手工业者至少从来历上說往往都是外族

---

<sup>①</sup> 里维尔 (M. Riviére) 引用 1223 年的法令，这法令要求一切想居住在倫姆 (Riems) 的外地人須納十五里特 (Litre) 裸麦和一只母鸡給主教，八块金币給市长，四块金币給长老。主教是封建領主；他的課稅比較輕，而市长和公社貴族的长老的征收就当时來說是很重的。

人。这些手工业者为了保护自己反对专制主义和公社貴族的永久压迫，組織成手工业行会。中世紀城市居民的这种分化便成为內訌，常常是流血的冲突的根源。

封建财产由于削弱公社财产而在乡村中增长起来，同时封建财产又把公社财产的印志一直保留到自己轉化为资产阶级财产；在作为工商业活跃中心的城市里，在集产制和公社組織廢墟上建立了私有财产的流动财富积累起来了和增长起来了。

## 第四章

# 封建财产

### I. 封建的組織

封建财产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不动产，中世紀的法学家称之为有形的(corporelle)财产，包括城堡或带有庄园地段的領地和附近的土地，“恰够雄鸡一展翅便能飞达的距离”；另一种是动产，称为无形的(incorporelle)财产，包括兵役、力役、什一稅及各种負担。

封建财产(寺院财产只是它的变种)是从那建立在集产制之上的农村公社里面生长起来的，并靠蚕食它而不断增大起来；后来，經過若干世紀的变革的結果，它才走到資本主义的财产——即个人所有的财产之真正的形式。

封建的财产和由它所生的社会組織服务于使家庭的，正确些說血族的集产制过渡到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在封建时期财产和财产所有者負担了义务而还没有获得资产阶级的独立性，使用和濫用的权利。土地不能购买和出卖，它因有限制的条件(servitus<sup>81</sup>)而受累，只能按照习惯法和法律繼承，土地所有者对这种习惯法

和法律是不能破坏的。他对那些按照官級比他高和比他低的人們必須履行自己的义务。

封建制度實質上是交互服务的一种契約关系：男爵只有对其上級和下屬尽了任务的条件之下才能領有土地，享有驅使农奴家臣从事劳动和占有劳动产品的权利。封建領主，为酬答家臣的“忠誠宣誓”（*la foi et l'hommage*），“允許保护他免受一切侵犯和对付一切侵犯，在任何場合下都給他帮助”；家臣为了保証这种保护，曾随从領主出征和向他繳納力役和收获物及家畜的仔畜的十一稅<sup>①</sup>。男爵为了在必要的場合找到援助和帮助，便去依附更强大的領主，后者又是国王或皇帝的大家臣之一的下屬。

封建等級的全体成員，上至国王和皇帝，下至农奴都被相互的义务紧密地联結在一起。那时的义务如像現在的利潤一样是社会的灵魂。一切都被用来达到把义务深深印入上下各階級的人心这个目的。民歌，这种首位的和强有力的教育的因素，它把义务轉变成宗教。罗兰（*Roland*）<sup>82</sup>，封建的史詩的英雄，当在朗塞瓦（*Roncevaux*）被撒拉遜（*Sarrasins*）击败而陷入困境时，他的战友阿利維尔（*Olivier*）埋怨查理曼（*Charlemagne*）大帝背弃了他們，他对阿利維尔說了这样的话……<sup>②</sup>

---

① 农夫彼尔士的幻想（*The Vision of Piers the Plowman*），这是1380年占領倫敦的那次肯特（*Kent*）农民暴动前几年所編的一本书，书上提醒貴族履行自己对养活他們的农奴和家臣的义务。彼尔士对騎士說：

“你的建議是这样公平，我将辛辛苦苦地为我們俩劳动和播种，并且还准备尽我一生为你做其它的工作，只要你答应保护神圣的教堂和我本身不受世間的强盜和恶人的侵犯。”

② 不要瀆神。——胆小的人应受詛咒。我們將坚持不懈，攻击和搏斗将由我們发起！……为了自己的領主需要忍受巨大的苦难和忍受严寒与酷暑，还需要准备牺牲血和肉。假如用梭鏢的話，我就用国王賞賜我的良劍（*Durandal*）。假如我死了，得到这柄劍的人将会說：它曾属于貴族的家臣！*Aoi*（“罗兰之歌”，萊昂·戈蒂叶〔*Léon Gautier*, XCIII 和 XCIV〕）。

罗兰之歌，中世紀的民歌，在战斗开始时常常唱的。据威廉·馬倫斯貝里（*William of Malmsbury*）說，在哈斯丁士（*Hastings*），当两軍对垒时，一个诺尔曼騎士

血族集产制只能做到公社的統一；封建主义則創造了一省的和一国的生活，因为它用义务和互相服务把一省和一国的独立的和分隔的部分联結起来。从这个观点来看，封建主义是男爵采地的軍事联盟。

男爵对它的农奴、佃农和家臣的义务既多而且繁重。但是当封建主义开始瓦解时，他們解除了自己的义务，同时却保留并加重了下屬的义务与負担，这些义务与負担在以前只是对实际服务的报酬。男爵并不满足于解除自己的封建义务，他們还想占有家臣的土地、森林和其它公共财产。法国中世紀的法学家，公正地被称为“封建之笔”(plumes féodales)，他們曾断言土地、森林、牧场和沼澤都是屬於領主的，領主只是把使用权交給农奴和家臣。在英国也发生同样的情形，那里有人声明說，曾經有过一个时期，“应当是在欧洲向封建轉化或諾尔曼人侵入的时期，英国的一切土地都是被控制的，土地被分給領主作为财产，而領主又把一部分土地分給随从的自由人，把另一部分交給农奴耕种。一切未耕的土地也是屬於領主的，一切与封建原則不合的习惯都是由于領主的放任而不知不觉地产生出来的。”<sup>③</sup> 总而言之一句話，一切都屬於男爵和应当归还給他。由于这种厚顏无耻的顛倒黑白，法国和英国的貴族便能占有农村公社的财产——森林和土地。资产阶级的历史家和墨尔兰(Merlin)，国民議會时代的无情的法学家，公有财产的

---

达利菲(Taillefer)走出行列，唱着查理曼大帝和罗兰之歌，“以鼓励士气”。他一边唱歌，一边舞劍，把劍拋向空中，又接着它的柄。諾尔曼人高声重复唱着“上帝援助！”

感叹詞 Aoi，在每一节之后都重复一次，使許多語文学家感到兴趣；据戈蒂叶的看法，它相当于法語的 ohé，表示一节詩的完結；因为“罗兰之歌”大概是由两个人合唱，好像現在在芬兰由两人合唱的卡来瓦拉(Kalevala)。一个开始唱一句，另一个跟着重复唱，然后又唱自己的，又輪到第一个来应和他，一直唱完一首詩为止，而唱完一首詩常常連續整天整夜。

③ 梅因：《农村公社》，第84頁。这个意見是律師布拉米尔(M. Blamire)在下議院的委員会上說出来的。据梅因說，布拉米尔是“英国土地财产的这种最罕見的形式的最通曉的法学家。”

破坏者，想在封建时期找出财产的个人私有形式，他们都采用了贵族的偏颇的观点。然而对封建财产的产生和进化问题的考察却证明了中世纪法学家的见解是荒谬的，事实证明封建财产是靠欺詐和暴力建立起来的。

## II. 封建财产的起源

封建主义是政权的等级制度，它是从平等中间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然而要使平等产生专制主义，必须有許多情况的一定的湊合，而这些情况又是在几个世纪中间形成起来的，这一点必须弄清楚。

几世纪以来遍布西欧的日耳曼部落是迁徙无常的，处于与美洲发现时的易洛魁部落相近似的半开化状态。斯特拉邦 (Strabon)<sup>83</sup> 說，定居在比利时和法国东北部的半开化人不懂得农业，靠乳制品和肉，主要靠野猪的鲜肉为生。这些野猪像狼一样的殘暴和危險，成群地自由自在地出沒于广大的森林地区。野猪非常多，足以供給食用和供給购买其它的食品和奢侈品。斯特拉邦补充說，高卢人的风俗习惯就是这样的，要想懂得它，只要研究同时代的日耳曼人的风俗就够了。

当凱撒在英国登陸时，他发现康提地方的布里东人 (Bretons) 也有高卢人那样的风俗：“他們不耕种土地，以乳制品、肉为食品，以兽皮蔽体；他們用藍色涂染身体，以恐吓敌人，兄弟共妻。”<sup>84</sup> 欧洲文明的出发点也同世界上所有地区是一样的。

在这些既是战士又是猎人的半开化人中間盛行着最严格的平等；他們的风俗和习惯都在力求保存这种英雄的平等。当他們定居下来并开始用粗陋的方法耕种土地时，为了不忘記使用武器的

---

<sup>83</sup> 《高卢战記》，第五卷，第十四章。

技能，于是組織經常的远征。著名的軍事首領只須发出一个作战的动员号召，許多渴望战利品和光荣的战士就会紛紛奔聚他的麾下。

在远征中他們服从他，像希腊的战士服从阿加綿农(Agamemnon)<sup>84</sup>一样；但是他們平等地坐在一張公共的桌上飲宴和用抽签方法平均分配战利品。一回故乡之后，他們重新成为独立的和平等的，而軍事首領也就失去了自己的权力。斯堪的納維亞人和事实上所有的半开化人都在自由和平等的这个基础上組織了自己的襲击。这些强盜的习惯保留在整个中世紀的期間。在征兵时都号召爭取自由的个人的主动精神。征服者維尔盖尔姆<sup>85</sup>为了征兵反对英国人，英諾森第三(Innocent III)<sup>86</sup>为了征兵反对阿耳比果派(Albigeois)，只要允許瓜分战敗者的財產便够了。在哈斯丁士(Hastings)战役中，在战斗开始前維尔盖尔姆号召士兵說：“好好打吧，杀死所有敌人；假如我們胜利，大家都会发财；我取到的也是你取到的；我获得什么，你們也获得什么；假如我取得土地，土地就是你們的”。神父說着魔鬼罗貝尔特的儿子也說过的同样的話去激励信徒去消灭阿耳比果派异教徒。“起来，基督的战士们！用上帝教給你們的一切方法(上帝只是教他們放火、杀人和搶劫)去剿灭背信之徒，把杜魯士(Toulous)公爵及其家臣赶出他們的城堡，夺取他們的土地，以使正統的加特力教在异教徒的土地上确立起来(1208年3月10日)”。把欧洲軍隊驅向东方的十字軍远征也是这样組織起来的。他們的借口是解放圣墓，而目的是掠奪<sup>①</sup>。

---

① 有名的經濟学家摩利拉里(Molinari)先生老老实实在地拿我們时代的金融企业同中世紀的海盜搶劫行为相比较；因此他承認我們的家长的有利息的貨幣私人借貸也以掠奪为目的。然而其中是存在着区别的：封建时代的武人要冒性命的危險，而资本家投资于金融资本家所兴办的企业，后者給他百分之十和二十的利潤，只是拿本非他們所創造的資本去冒險。

当半开化人因寻找土地而征服别的国家的时候，他们有时也杀死居民，像犹太人遵奉上帝之命所做那样。但是通常他们只限于抢劫城市和占领他们所需要的土地，他们就在那土地上定居下来并按自己的方法耕种，让被征服者按自己的法律和习惯生活在自己的旁边。他们的这种制度不是什么偶然的東西，据凱撒說，而是适应于他们的部落組織的；十八世紀末同阿富汗半开化人<sup>①</sup>作过战的爱尔非斯登(Elphinstone)也证实这一点。每一个部落取得一片土地，分配给居住在一个或几个村落中的氏族(或称Clan)。村落由血緣关系联结起来，組成生得(centène)(古日耳曼語称为huntari, 古諾尔曼語称为haradh); 几个生得組成一个康得(Comté), 几个康得組成一个杜雪(Duché)。墨罗温朝諸王就在这种部落的組織中奠定了政治組織的基础。

不归村落占有的土地，便留給生得支配；不属于生得的土地便属于康得，再剩下的往往是大片的土地則直接属于整个民族。恩格斯說，在瑞典，一切这些所有形态是并存的。每一村落都有公有地，其次又有生得(或haradh)和康得的共有地，最后是全民的土地，国王以全民族代表的身份把这些土地据为己有，但是它仍然繼續保留着公有地的名称<sup>②</sup>。在一切封建君主国家内的王室土地都是属于民族的财产；不能把它们同墨罗温朝在布拉侖(Praine)、亚底尼(Attigny)、康伯涅(Compiègne)、威尔伯里(Verberie)等处的領地相混，因为这些領地是属于墨罗温氏族的。

但是半开化人自从成为定居的农人和往后又变成基督教徒之

---

① 剛得布尔人(Gundehpoors)的土地按照組成部落的氏族的数目分作六个部分；土地按抽签进行分配……每隔三——五年重新分一次。令人惊异的是在这些尚无法律的氏族中土地的重新分配竟然可以不引起紛爭和流血的冲突。(M. 爱尔非斯登关于柯布尔[Caubul]王国的一个报告，1805年。)

② 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630頁。——編者注

后便逐渐失掉了好战的习惯，虽然其中一部分仍旧不变地保存着自己的原始风俗。塔西佗时代的日耳曼人解脫了原始的蛮性，他們已經从事农业和定居下来了；然而加得(Cattes)部落却还繼續从事战争。他們敢于进入最危险的地点，发动一切的战斗；他們既沒有房屋，也沒有土地，他們无忧无虑。走到哪里都有人供养他們。其它部落的一些著名的战士用礼物和飲宴把忠于他們、准备到处跟随他們出征的人們經常保留在自己身边。加得部落的战士和軍事长官的这些卫队組成类似常备軍的东西，負有保卫其它从事农业的部落的任务。

但是当半开化人的征服者剛剛忘掉战争的时候，其它的半开化人立即就来攻击他們，像攻击俘获物一样。在几世紀中間，大批的半开化人冲进欧洲：在东边是哥特人、匈奴人、日耳曼人，在北边是斯堪的納維亞人，在南边是阿拉伯人。为了保卫疆界不被他們侵入，羅馬的統帥組織了老战士的队伍，分給他們土地、家畜、种籽以至金錢。他們唆使半开化人互相攻击，贈給他們土地，委托他們保卫堡垒。但是这些文明的界綫却被半开化人的入侵冲破了。

而当人流停止进入东方、南方和北方，半开化人已經定居下来并着手恢复被他們所中断了的文明事业的时候，一个新的灾难又开始临头：匪帮遍布全国，到处搶劫和勒索。在每次战争之后，双方的士兵又握手言欢并一起进行搶劫<sup>①</sup>。欧洲人几世紀中間都是生活于被掠夺、被杀和被虏作奴隶的恐怖之中。

---

<sup>①</sup> 在波第尔(Potiers)战争(1356年)之后，两支軍队的士兵无事可做，于是联合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战。在布勒第尼(Bretigny)(1360年)条約恢复了英国的俘虏約翰国王的自由之后，两支軍队都解散了，但是战士们結成匪帮，到处行劫。一部分活跃于北方；人数更多的另一部分在达来兰-伯利果(Tulletrand-Perigord)指揮之下窜入罗尼河流域和洗劫普罗温士(Provence)。在阿維朗，他們的罪行得到教皇的寬恕并且还得到五十万利維尔的饋贈，这对他們是更有价值的东西，教皇还設宴款待他們的首領，因为这些首領寬饒了城市而搶劫乡村。



侵略毀壞了國家，但沒有阻止已經定居的部落互相仇視。這些經常的內訌使半開化的部落無力抵抗外敵：當需要齊心一致的時候，他們不能忘記氏族對氏族、村落對村落的仇恨。只想到羅馬強盛的塔西佗祈禱上蒼支持這些禍患無窮的內爭，因為據他說，“命運所能給予羅馬的幸福不及敵人的紛爭所給予的更大”。

鄉村居民為了防備这么多的危險，就在村落四周築下工事，十一和十二世紀的奧維尼(Auvergne)憲章上稱為營壘(castra)。作為同一氏族的成員人人都是平等的，他們就採用選舉的辦法以選出領袖來擔負保護之責；這些領袖和國王派遣的人便是封建男爵的肇端<sup>①</sup>。

男爵開始時只充當領取薪金的收稅員(freda)的職務，充當進行審判的人民會議的主席的職務，軍事監察員和秩序的維持者。他們服從於長老會和人民會議的權力。照薩利法(Lex salica)的規定，在法蘭克部落中間，伯爵(graaffio)如不執行逐出被人民會議判處驅逐的外地人，就要處以二百個金蘇的罰款；相當於贖買死罪的數額。這些權利後來變成為封建領主的所有物，而當時卻屬於參加全體會議的公社所有。所有居民都必須帶着武器出席會議，否則便要罰款。有些公社曾擁有佃農和農奴。

威爾斯法是在940年遼國王荷爾達(Hoël-Da)之命所擬訂的並在1841年由亞溫(A. Owen)所頒布的，它規定了選舉法、村長的權利和義務，這在一切半開化部落中大體上差不多。氏族的首領是由已有合法的妻子和兒女的全体家長選舉出來的。他的權力是終身的；而在其他民族中，權力是暫時的；在一切情況之下他都可

---

<sup>①</sup> 有時氏族向一個外地的戰士提出請求。伯倫(Bearn)習慣法開卷就是這個獨立的宣言：這就是伯倫的習慣法，它證明在伯倫自古以來就沒有領主。可是波(Pau)地的居民需要一位軍事領袖和聽到關於騎士畢戈爾(Bigorre)英勇事跡，便選他當任期一年的領主。人民會議要求他遵循他所藐視的習慣。因為他拒絕服從，遂被殺於會場中。

能被免职。他应当經常准备着“为自己的亲族說話，使他們能听从；为自己的亲族战斗，使他們敬畏；为自己的亲族作保証，使他的保証能被采納。”

当他开庭审判时，有七个最年长的老人协助他。在他的隶属之下有执行复仇任务的复仇者，因为司法在当时只是报复的法律，以打击还打击，以伤还伤，以损失还损失。在第一个警号之下，当号召发出之时（在諾曼第人叫 haro，巴斯克人叫 bialfor）全体居民都应当武装起来走出房屋，听候首領的指揮：他是他們的軍事长官，他們必須忠实于他和服从他。誰不响应号召，就要罰款。居民有軍事的組織。例如，在大尔比（Tarbes），他們是十人分为一組，由什长率領，什长应檢查所有的人是否都武装起来，武器是否都齐备<sup>①</sup>。

在半开化人中的一切劳动都倾向于固定在同一家庭之内：紡織、鐵工、魔术师或牧师的职业都是父子相傳；等級就是这样形成的。負有对内維持秩序和对外防禦之职责的首領是在全体居民内选出来的。但是逐漸地养成了由一个家庭内选举的习惯，最后結果是消灭了选举的形式，家庭竟从自己的成員中委派公社的首領。假使以为首領的职务自始就是一种令人羡慕的特权，那就錯了。相反地，他的职务是既繁重又危险的。首領对一切都要負責。在斯堪的納維亞人看来飢荒是神的憤怒的准确的标志。假如把天灾归咎于国王，国王就要被貶，有时还要被处死刑。

这个职务虽然如此不受欢迎，但民会的被选举者也不敢逃避，否則他就要遭受放逐，他的家庭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財產、他的房屋將遭到被毀坏的危險。亞眠人（Amiens）的古代习惯法上說：“若市长已当选而拒絕市长职务……或者有誰拒絕职守，則毀其房屋。”

<sup>①</sup> 台維尔：《大比尔人的历史研究》（Deville: Études historiques sur Tarbes）（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académique des Hautes-Pyrénées, 6-e année, 2-e livraison, 1861.）。

戈姆(Gomme)举出弗尔克斯东(Folkestone)和哈斯丁士(Hastings)的习惯法上载称凡被选为市长和陪审員而拒絕就职者也将受同样的处罰<sup>①</sup>。

在印度农村公社至今还可看到織工、鉄工、学校教师、婆罗門僧侶、宗教仪式的舞蹈者等等都是公共職員；他們都为公社服务，公社給他們报酬，給他們住宅和从农产品和牲畜征收的稅款中撥支薪金；有时也給他們分一块土地<sup>②</sup>，这土地一部分或全部由农民耕种。

欧洲村落中被选的村长与印度村落的員吏所受待遇是相同的。他們的伙伴为了酬报他們的服务，在分地时分給他們的比分配給其余居民的要多些。例如在瑪梅斯堡(Malmesburg)村中，村长(l'alderman)領到一块补充的土地作为服务的酬劳，这块土地称为村长的厨房。为使村长有可能从事公共事务，同村人耕种他的土地，給予他第一批收获物和他保护之下的牲畜的初生幼畜<sup>③</sup>。村长的职务决不是清閑无事的职位；他应当时刻戒备着，时刻准备着战斗。戈姆复制了十一世紀的一張图稿，那上面描繪了割麦的人在手持长枪的一个武士保护之下收割麦子。

被选的首領开始时与其它居民并没有什么区别。但是由于他們总是由一个家庭内选举，終于产生了特权，并变为世襲权利。特权家庭的家长，按出身的权利，不經任何选举就变成成为公社的自然領袖。在法兰克諸部落中，王权沒有其它的来源；墨罗温氏族供养軍事首領正如希伯来人的萊維斯(Levoss)氏族供养牧师一样。可

① 戈姆：《农村公社》(Gomme: Village community)。

② 这些小块的土地往往以某种职业命名，作为他們从事这种职业而取得的报酬。据梅因說，在某些英国的教区内在公有地中存在着一小块一小块土地，这些土地自古以来就以某种职业命名，某人如不从事該种职业，法律上就不能占有它。

③ “巴黎多人每年都集合起来为他們的村长及其第一夫人耕种土地。几百人排成一条綫，鋤头此起彼落；全村都来帮助村长做工。”(Casalis, les Basoutos.)

是軍人們总是从墨罗温族选出自己的首領。矮小的丕平(Pepin le Bref)不仅强迫士兵会选举自己,并且,为了掩飾篡夺政权,他还强迫眠斯(Mayence)大主教和教皇爱丁勒第三(Étienne III)給自己洗禮,于是后者称他为“上帝加封的皇帝”。

墨罗温朝諸王如不使用如下的公式: *Una cum nostris optimatibus* (得到我們的貴族的同意), *De consensu fidelium nostrorum* (得到我們的忠臣的贊同), 便不得頒布任何一个私人的命令和任何一件公文。薩利人和古日耳曼人的法律和第一批法兰克諸王的詔令都不以君主的个人名义頒布<sup>①</sup>。

很可能有这样的情形, 某人之所以被选为社长是由于他有最寬大的房屋, 最易防御, 便于在受到攻击时村民可以进去躲避。这种战略上的优越性开始时可能是偶然的, 后来却成了选举首領的必要条件。在印度的边境村落中, 守望塔往往与首領的房屋連在一起并作为避难所和了望点之用。在封建时代要成为領主必須拥有“城堡或堡垒, 其中有内院, 有濠沟和吊桥, 有巨大的方形塔, 塔内并有手磨”<sup>②</sup>, 以便农民能在那里掩藏粮食和牲畜, 磨碾谷物和組織防御。首領的房屋是被当作公有的: 碰到危險的时候它实际上是所有人的避难所。农民們修补它, 挖沟, 加固圍牆。在集体村落中, 全体居民共同劳动为任何一个公社社員修繕房屋和修建房屋已成为一种习惯。这种习惯便成了封建領主的权利的来源, 即: “要求家臣协助修建工事, 假如这种权利是有根据的話, 而在軍事行动时期甚至連根据也沒有。”

封建时期的作家的以下注釋明显地指出这种权利的起源。“既

---

① 这就是阿拉岡(Araggon)的古代諸王登极时的公式(大致与法兰克諸王所使用的公式差不多):“我們中的每一个人与你是平等的, 我們拥戴你为我們的国王, 有个条件就是你要尊重我們的习惯; 如其不然的話, 我們就不拥护你。”

② Roucher d'Argis: *Code rural ou Maximes et réglemens concernant les biens de campagne*, 1774, 3-e édit; ch. VI, § 2.

然这些防御工事同样保障乡村和城市的安全，保护生命和财产，因而在当地拥有财产的外地人也不得不参加工事的修筑”。

半开化人与其说是农民还不如说是战士，他们乃是村落和堡垒的真正保卫者。一听到号召他们立即武装起来并集合在首领指挥之下，以便支持他和击退进攻。他们还在白天看守了望台和在夜晚保护房屋。在许多地方直到革命之前有些领主还保留着要求自己的家臣担任守望任务的权利。但是当农业的习惯已占上风的时候，农民们为了免除妨碍农业的兵役，便用贡税来代替，交给首领，让他去雇用一批战士专门去担负守望和保护居民的职责。从犯人身上征收来的一切罚款中都要拿出一部分来供奉首领及其士兵。由此而形成首领有可能维持一支武装力量，这支力量使他后来得以对旧时的同伴实行统治和控制。

占居较好地位的村落便变成一个中心，在遇到攻击的时候，邻村的居民都到这里来寻求保护；为了有可能指望这个避难所能收容，他们就应当协助维持防御工事和士兵。这个农村公社的首领便把自己的权力扩大到附近的村庄。

封建制度的基础就是这样自然而然地从集体村落中产生出来，在这些村落中本来所有男人的权利与义务都是平等的。然而假若没有外部事变的推动和给它们注入新的生活，那末它们就会像印度一样要经历几世纪的停滞状态。战争与侵略发展了这些萌芽的因素，使它们联结起来并用交互的义务与权利使它们紧密地结合成为一个广大的社会制度，这个制度在中世纪普及于整个西欧。

现代在印度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使我们有可能理解国家的侵略如何促使村公社的首领转化为封建贵族。

当在印度海岸落脚了的英国人向该国内地伸展其势力时，于是便同前面已经描述过的那些村落组织发生了接触。据梅因说，每一个农业小组都有一个农民领袖(headman)，他用全村名义与

侵略者談判。英国当局并不想去弄清楚这种权能的性质，权力的起源及其在公社中的真正的位置。他们简单地把他们看作村长并以这种身份和他打交道，其实他只是村代表。他们运用最强的权利去加强和巩固他的权力；在多数の場合之下他们帮助村落的首領去征服自己以前的同伴和剝夺他们的权利与财产。

法国人和英国人毫无成效地企图把这种权力給予易洛魁部落的酋长(sachems)。

中世紀的侵略者也采取同样的方式：过小的村落不值得一采邑的形式賜給臣下，他们便让那些村落的村长保留职位并托付他们以征税和监督其部下的任务；因而侵略者便賦予他们以公社中所不曾享有的权力。但在战略要点侵略者则将村长的职务让自己的战士去充当；他们把軍事位置托付给他们。据有关采邑的书籍記載，被称为采邑的这种职位的任期取决于情况；开始时这种职位是可以取消的，以后变成有年限的，終身的，最后变成世襲的和永久的。利用一切机会来使采邑轉变为世襲領地和自有地，就是变成免税的土地；在法国第二个朝代的国王曾不得不經常頒发命令来阻止这样的占有。“凡由皇帝或教会領有采邑的人，均不得将它变成世襲财产。”——查里曼大帝在803年的法令内是这么規定的。但是命令并不能阻止村落的軍事首領轉变为封建貴族。

由此可见，封建主义可以有两个来源：本地的和外来的。它一方面是从农村公社进化的必須条件中发展起来的；另一方面又是从征服中发展起来的。

封建男爵，不論是由村长在事变的自然过程中轉变而成的，也不論是征服者使他们当了軍事首长，都应当住在某个一定的地点，保卫它和管理它。他们所領有的土地和他们以代役和劳役形式取得的賦稅算作是对他們的报酬，因为他们给自己管轄区内的农民作了效劳。男爵及其家僕組成了常备的地方軍，这支軍隊由被他

們保护的居民来供养和維持<sup>①</sup>。

男爵有义务审判自己的家臣，保护他們和幫助他們，而家臣則須对他誓忠，漸漸变成他的臣下。遇到因領主或家臣的死亡而发生变故的一切場合，家臣应当在四十天以内，本人亲自而不是經過委托的人，来到主要城堡而不去其余的地方，以表示他曾作过效忠宣誓，只是为了在男爵的城堡之内找到保护；假如領主不在而又沒有留下代理人，家臣得知这种情况之后就在城堡門前宣誓忠誠，并登上記錄簿。在請求保护的时候，家臣必須光着头，不佩劍也不帶馬刺，跪在地上双手合掌。接受宣誓时，領主为表示合作与同意保护，便同他握手。于是家臣就宣布采邑，就是說出准备置于領主庇护之下的土地和財產；在最初的时候他甚至要从自己的土地上带来一块土团。有时領主本人第一个先向家臣宣誓。在毕哥尔(Bigorre)的习惯法(Fors)上說，伯爵毕哥尔“在接受当地居民特派代表的忠誠宣誓时，他本人也应当宣誓表明他决不变更古代的习惯，也不变更居民中的风俗；他土地上的四貴族应当保証他的誓言。”

在以下的場合，家臣应当給領主服軍役，即“当外国軍隊攻击他的土地时，当他想要解救自己的被圍困的城堡时或当軍隊被派往参加已宣布的战争时”，就是为了他的土地上的居民的利益而策划的战争。

但是在封建組織的初期，家臣虽然与自己的領主有密切的联系，而在某些場合，据 803 和 816 年法令所載，是可以丢弃他的，就是“当領主表示要杀他，把他变成农奴，用木棍和刺劍打他，侮辱他的女儿或妻子，或夺取他的世襲财产的时候。”

男爵的政权一經成立，封建貴族便成为被他所保护的地方的

---

<sup>①</sup> 在拉丁語中，男爵(baron)这个词，封建領主的第一个名称，意指力气大的人，勇敢的战士，这就明显地指出了封建主义主要是軍事性质的。家臣(vassal)这个词也同样意味着勇敢的。

紛亂的根源。為了增大自己的土地和擴大自己的權力，男爵們彼此進行着不斷的內戰，只是在進行田間工作時才有短期的休戰。

男爵們之間的戰爭很像現代的工業家和商人之間的沒有間斷的競爭。結果也是同樣的，這一個或另一個達到財產以及與之相連的社會權力的集中。小的男爵為大的男爵所吞併，後者就開始着手組織公爵宮廷，在那裡必須有變成了他的家臣的人們參加。

男爵往往變成攔路打劫的強盜，他們搶劫鄉村和向旅客、向城市索取贖金，完全配得上人們加給他們的稱號：genspille-hommes, gens-tue-hommes（這是雙關語：用gens-pille-hommes〔搶劫者〕和gens-tue-hommes〔殺人犯〕來代替gentilhomme〔貴族〕）<sup>①</sup>。

城市必須武裝起來並置於國王或大領主的庇護之下，國王和大領主力圖使土地和封建勢力集中起來並把男爵變成宮內官。

但是隨着小的男爵的消滅，城堡之間的戰爭停息了，鄉村里的和平建立了，封建的保護的必要性也就減少了。這時領主便有可能放棄自己的土地和進入公爵和國王的宮廷，以便在那裡執行宮內官僚的任務，他們充當自己家臣和佃農的保護者的職務也就隨之終結。當農民不再需要武裝保護的時候起，封建主義就失去了自己存在的意義。封建主義因戰爭而產生，由戰爭而消滅：同是這個戰爭的性質，它助長了它的產生，也促進了它的消滅。

可是，雖然領主及其家臣和佃農之間的一切平等已消失，只要封建主義存在，則它所孕育於其中的原始平等的遺迹也就存在着。

---

<sup>①</sup> 維特里(Vitry)，英諾森第三(Innocent III)的特使，到比利時和德國去宣傳組織反對阿爾比人(Albigensis)的十字軍(1208年)時，寫道：“雖然有爵位和顯職，領主們並不停止搶劫和干綠林強盜的行徑，放火毀滅整個地方”。……僧侶們的風氣並不更好些。在十二世紀，納爾邦(Narbonne)的大主教帶着牧師會會員和僧侶正到處去搜索，獵獲牲畜，搶劫農民和強姦婦女。他拿薪水來供養一批阿拉岡的雇僕，用他們去向國家勒索：主教和修道院院長特別喜歡“自種婦女，紅酒，漂亮衣服和好馬，過着富裕的生活，雖然基督過的是貧困的生活”，——一個法國南部的抒情詩人這樣說。



在決定男爵和農民的土地關係的村民大會上，封建領主和他們重新又是平等的了。這種大會的召開本來是領主的義務，可是不得他的同意，有時甚至遇到他的拒絕，亦可以自行召集。領主使用公共財產之權也像其他居民的權利一樣是受到限制的；他可能送往公共牧場放牧的牲畜頭數都是預先規定了的。得里斯爾(De l'Isle)在他的諾曼底農業分類的研究中引用文件證明貴族的權利是受限制的。例如領主布里威爾(Briequeville)只有兩牛一馬放牧於公共牧場之權。

領主也很少特權，如拉·巴阿·德·弗來曼威爾(La Poix de Fréminville)所說：“自己沒有牲畜的領主，不能把他人的牲畜引到這裡來吃草，既不得把自己的權利讓予別人，也不得出賣它，甚至不得白白地出讓自己的權利。”<sup>①</sup>

### Ⅲ. 教堂財產的起源

教堂財產的起源假如不是同封建財產的起源完全相同，那末無論如何也很近似。

在這些混亂的時代，許多人都到教堂來找生命和財產的保護，正像到男爵那裡去找一樣。牧師握有男爵所沒有的權力——打開天堂之門。信仰是純朴的，但又是深刻的和熱情的：敘事詩和民歌，這是群眾內心思想和感情的真正反映，它承認牧師有救人於地獄之火而送進天堂的權力。在羅蘭之歌中大主教杜爾平(Turpin)為了鼓勵那些動搖了的騎士重返戰鬥，一面應許他們登天堂的幸福，同時又用以下的民歌恐嚇他們，說他們如不參加戰鬥，就會身敗名裂：

領主們—男爵們，丟掉骯髒的思想吧；  
為了上帝，請你們勿逃跑，

<sup>①</sup> La Poix de Fréminville, *Traité général du Gouvernement des biens des communaux d'habitanés*; Paris 1760.

須知那样就会遭受民歌的恶毒的嘲笑。  
宁可战死在沙場。  
我們之間都有一个信念，即我們將死；  
在今天之后我們將不復生；  
但我將向你保證一事：  
你將打開神聖的天堂，  
你將與諸聖并坐一起。

牧師們使一切人相信，吝嗇是上帝的第一的和最重要的特性，而他的信徒會拿自己的影響和徇私情來做生意；因此克洛維（Clovis）說：“聖馬丁為自己的朋友服務很不壞，但不得不為自己的痛苦付出過高的代價”。

為了保證自己在天堂里有一席位，信教者臨死時要立遺囑把自己的財產交給教堂。這種贈禮開始時完全出於贈予者的善意，但往後卻變成強制的了。孟德斯鳩說：“凡死者未將一部分財產遺交教堂就被稱為未懺悔的死，就不能舉行聖餐禮和出殯。假如有一人死了而未留遺囑，那末親屬就應當請求主教指定公正人，然後同公正人共同研究決定，假如死者留下遺囑的話，他會拿出多少財產來給教堂。”牧師們預先勸說信徒在生前就放棄自己的財產，附了一個條件就是可以享用到他死為止。

世界末日將在 1000 年到來的恐怖使修道院和僧侶大大發了一筆財。既然人和牲畜都要死了，最後裁判的時刻很快就到，還保留這世間的財富做什麼？

但是 1000 年却在無災無難中安然渡過了，恐怖消失了，所有人都痛苦地懊悔為了贖罪而白白地送掉的財產。開始發出抗議：繼承者提出抗議反對遺囑。為了恐嚇那些要求歸還財產的信徒，教堂竟採取詛咒和革出教會的手段。這個時代的寺院充滿了詛咒的公式，它使財產贈予者及其親屬的心充滿恐怖。這就是在阿威尼（Auvergne）的記錄簿中常常碰到的例子之一：“假如有某一外人

或你的親屬中的某一人，假如你的兒女竟如此無理地決定要反抗這個文件，決定要用武力奪回已經獻給上帝和他的聖徒的財產，那末就讓他們像耶洛得(Hérode)一樣遭受致命的創傷；讓他們像出賣耶穌的猶大(Judas)，達芬(Daphan)和阿比朗(Abiron)那樣在地獄的底层受苦受難。”<sup>①</sup>

但是教堂財產還有其他的來源。波馬諾阿(Beaumanoir)在列舉國內農奴數目增多的原因時說，某些自由人自己出賣自己和自己的子女有時由於飢荒，有時則由於想找到一個主人和抵抗敵人的庇護者，自由人出於虔誠而願為自己和自己的後裔承擔某種義務或繳納某種貢物給教堂修道院。這種依存的起源是被忘記了，反而把它看作真正的農奴狀態的證據。

人們之願意從屬於教堂，為的是可從它那里得到世俗的保護。據格拉爾(Guérard)說，大多數自願為奴隸(obnoxatio)的行為是由於信教的誠篤，由於主教和修道院長對待農奴態度比較好，以及法律上規定的這種狀況的優越性所引起的。教堂的和修道院的農奴和家臣與臣屬於國王的人享有同樣的特權：在遭受侮辱、傷亡的場合，他們有要求三倍賠償之權。國王和教堂親自追捕罪犯，然而這個責任本當應由受害者的家庭來承擔。

修道院同時就是堡壘，能夠堅持正規的圍攻，而修士都能使用武器。在哈斯丁士(Hastings)的僧侶分成兩軍互相廝殺，在溫巧斯特(Winchester)附近的一所名希丹(Hida)的修道院的院長率領十二個修士到哈羅德(Harold)作戰，他們全部戰死，手里還拿着劍。教堂的高僧亦即軍事首領，他們一面脫下袈裟和放下十字架，一面便去披堅執銳。像卡霍爾(Cahors)這樣的主教在舉行莊嚴的儀式時便把自己的盔、甲、劍和鐵手套放到祭壇上。在龍塞瓦爾，羅

<sup>①</sup> 間接引自里費爾(H. F. Riviere)的著作《Histoire des institutions de l'Auvergne》，1874。

兰为了向杜尔平表达最高的赞美，他对娥利维尔(Olivier)說：

大主教是最好的騎士：  
天下再沒有比他更好的人，  
他作戰既懂得用槍，又能用劍。

.....

法國人說：“這就是大無畏的精神！  
十字架靠大主教保住安全。

願上帝保佑，使查理(Charles)有更多的像  
他那樣的人。”呵！

在封建時代唯一受過一點教育的都是教堂里的人。他們把自己的知識和英勇精神獻給了养活他們的教區里的教民。他們常常為了保護村民而起來反對壓迫村民的領主。在愛爾蘭至今還可看到下層僧侶同供養他們的佃農和農民一道反抗地主。

即使是牧師也同城乡居民有着密切的聯繫，他們常常起來同封建貴族作鬥爭。在迷信的恐怖和狂熱的信仰當中男爵可能把一部分土地和財產獻給教堂和修道院；但在平安的日子他們又垂涎着僧侶和修士的財產而利用一切的機會來奪取它<sup>①</sup>。

最初的那幾個王朝的國王和統帥以恩賜的形式把教堂和修道院分給自己的士兵和下屬；從八至十二世紀許多教堂是為世俗的人們所占有<sup>②</sup>。

---

① 瑪爾梅士貝里(W. of Malmesbury)說，斯溫(Sweyn)，高德溫(Godwin)的兒子和哈羅德(Harold)的兄弟，曾經搶了一位女修道士并在一怒之下殺死了她。為了減輕良心的譴責，他曾許願赤足去朝拜耶路撒冷。這個艱苦的許願雖然忠實地完成了，但他卻因熬不過苦難而身死。

② 丕平·海里士塔爾(Pépin d' Héristal)，他的孫子矮小的丕平(Pépin le Bref)和查里曼(Charlemagne)，他們曾祈求赦免對殺害丹各貝爾(Dagobert)和自己的篡奪之罪，而成為教堂的保護者；但是矮小的丕平的父親，查爾·瑪爾台爾(Charles Martel)却粗暴地搶劫教堂。編年史家寫到這個事實時使用了社會化(socialiser)這個動詞。Karolus, plurima juri ecclesiastico detrahens, praedia fisco sociavit, ac deinde militibus dispertivit. (En chronico Centutensi, lib. II.)

法国的国王直到革命前还保留着王家的特权，按照这个特权他们享有空缺的主教职位的全部收入。封建国王认为教堂的财产是上帝为了帮助他们应付急需而积累起来的；他们抢劫教堂和修道院正像向犹太人勒索金钱一样肆无忌惮。

据孟德斯鸠说：“不过僧侣的收入很可观，差不多等于三个王朝中人们所献纳给国王的全部财物的几倍。”当亨利第八（Henri VIII），英国历史上的这个青鬃子和英国的最高主教，改革天主教会时，他曾没收了六百四十五座修道院，九十座大教堂，二千三百七十四座教堂和独立的小礼拜堂，一百一十个医院，外加每年超过五千万以上的收入。他所做的也是他的前辈做过的，只是规模更大而已。1789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剥夺教堂财产，实质上只是追踪法国最信天主教的国王的前例而已。

#### IV. 封建义务的性质

封建义务比封建男爵寿命更长久，后者因为不需要而消灭了；前者却变为贵族的财产，往往是资产阶级起源的财产，它们不再充作为提供服务而赏付的酬劳。

这些封建义务，一方面受到资产者的剧烈攻击，另一方面又受到中世纪法学家的竭诚拥护，直到1789年的资产阶级革命才最后地被消灭。比它早一百五十年完成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使资产阶级获得政权，除了上议院之外又设立了下议院。但是它没有消灭大量的封建特权，这些特权现在已成了旧时代的残余，因为这时按原来字面意义的贵族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一个支派而已。

现代的自由派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不去探究封建义务的起源及其在过去存在的意义，也不去说明它们之所以消灭是由于当时制约它们的原因消失之故，而它们却以为笼统地和不加分析地非难凡属封建主义的一切就可以造成科学的和自由主义的证据。

但是，为要理解中世紀的社会組織，就必须認識这些作为封建财产形式农奴制关系的意义。

要把一切封建义务悉数列举出来未免太多；我只举出其中最受资产阶级作家攻击的一部分，并说明虽然它们是用权力来维持和巩固的，但在开始时是自願規定下来的。

**劳役租制。**——由上述已經知道，封建男爵，假如他没有被侵略者委派为军事长官时，通常只是公社的普通公民，与其他公民是平等的，并没有与众不同的任何特权。他从土地分配中領到自己的一份，但他自己不耕种。全村人担负替他耕种的任务，以便他有可能用全部时间去保护公社。据哈克陶孙說，俄国的地主繼續領受由村民耕种的米尔土地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收入。

那提呂夫·孟特梅良(Latruffe-Montmeylian)說，在法国，“領主占有公社财产的部分是依农民的权利来决定的。假如后者享用領主的森林，那末它就等于三分之二，假如农民只享用公社的森林，那末，它就等于三分之一。”<sup>①</sup>

当修道院和男爵的财产增多到农奴已不够使用时，他們便把土地交給营“共同生活”(按照当时的說法是 *au même pot et au même pain*)的农民公社耕种。但是这些佃农无论是农奴的或是自由的都必须为領主做若干日的工——耕地或收获。

当商品生产和商业还不存在的时候，男爵和农民应当自己制造为消費所必需的一切物品<sup>②</sup>。在修道院中和封建城堡中有各种

<sup>①</sup> Latruffe-Montmeylian: «Du droit des communes sur les biens communaux», 巴黎, 1825年。孟提梅良是法国稀有的作家之一, 这些作家勇于保护公社财产而反对资产者的贪婪。

<sup>②</sup> Olivier de Serres 在他的著作《Théâtre de l'agriculture et du mesnage des champs》里劝告地主自己生产一切必需品, 例如, 不出卖生产品和拿卖得的錢去向其他地点购买衣服, 而是自己生产它; 在每个領地內要有屠宰場、面包坊、紡織場等等。实际上封建經濟既不知商品流通, 也不知商品生产为何物, 因为这些乃是资产阶级經濟的特色。

作坊，用以生产武器、农具、纺织、衣服等等。农民，他们的妻子和女儿每年都必须到那里去作工若干日。妇女作坊由城堡女主人指挥，名为妇女室(gynecia)。

在修道院属下也有妇女作坊<sup>①</sup>。它们很快就变成领主及其臣下的内室，甚至变成淫窟，在这里男爵和牧师侮辱他们的女农奴和女家臣：gyneciaria 这个词原是指妇女室的女工，却变成了娼妓的同义语。丑事闹得太多了，以致主教不得不禁止牧师设立类似的作坊。

由此可见，现代的妓院有宗教的和贵族的两层起源。

初时家臣及自由的佃农替领主作工的日数是相当少的；在有的地方一年中不过三天<sup>②</sup>。在没有固定的习惯和契约时，国王的命令规定一年为领主作工十二天。农奴的劳役就要重得多，虽然通常一周内也不超过三天。同时农奴可以享用领主给他的一小块土地，而且不能把他从那土地上赶走；此外，他还可分得男爵收获物中的一部分并且有权在男爵的森林中及其可耕地上放牧。

加斯巴兰(Casparin)公爵，路易十八的农业部长在1821年颁发的“租佃”条约内毫不犹疑地承认租佃制对于土地业主比劳役制更为优越<sup>③</sup>。

---

① 在728年爱貝哈尔公爵(le comte Éberharel)给摩尔巴哈(Morbach)修道院的赠与证书上提到有四十名妇女室的女工。

② 毕加尔习惯法(Le Fors de Bigorre)规定：让自由人过和平日子和让他们一年中去给公爵当三次拉脚。

③ 加斯巴兰(Gasparin)公爵所指出的原因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值得在此一提，因为这些原因也能适用于无产阶级的劳动。

“劳役制必须分给农奴一定数目的土地，作为生活之资，由他独立耕种，附带的条件就是一年中要为地主做若干日数的工，作为享用分地的报酬。……主人和农奴的利益是各自分开的；每人取得自己的一份，农奴知道他所投入于分予地的劳动是他的幸福的保证，为要获得更多的成果，他就更要积极工作……在为主人的工作日是不是也如此呢？每周有三天是自由人，另外三天又重新成为奴隶。人们逐渐懂得区别为自己

但在封建制度沒落时期，領主曾濫用权力而扩大劳役制。据十七世紀初期的作家註·舍呂(Jean Chenu)說：“他們获得了这样的权力，可以毫无道理地而只靠士兵的鞭笞和咒罵相恐吓来强迫农奴耕种、收获葡萄和履行成千件其余的义务。”当和平在欧洲各国之間或多或少建立了起来之后，农民已不再需要保护了，宮廷貴族接替了封建男爵，也变成了寄生者和压迫者了。

**宣布收获期。**——人們以为領主对割草、收葡萄、收庄稼等等的日期的規定之权完全是封建主义，这种意見是不对的。这种权利还在集产制繁荣时代就已产生。如前所述，为了空出土地来放牧公共的家畜，村落的长老会曾規定收获的日期。这个习惯原是为全体村民的利益而規定的，但当領主开始以谷物作买卖之时起便发生了变化。領主自己代替长老会或者影响它故意推迟收获日期的宣布，以便比农民更早收完庄稼并以較好的条件首先出卖。

**强制的使用<sup>④</sup>。**——尽管这个詞是封建的，但是它所表示的习惯却仍然属于共产主义的时代。如前所述，在村公社中某些工作是由領取公社报酬的个人去执行；在每一村落中有一公共的牧童放牧全村的家畜；此外还有打鉄坊、屠場、磨坊、配种的牲畜为全公社服务。每个家庭不必自己燒灶和在灶上烤面包，只須送到公灶(banal)上去就行了；这个习惯原是从节约木柴的考虑而产生的。炉灶的維持和照管先是委托长老会，后来又委托領主，領主只要在

---

的劳动和为主人的劳动，这个区别对于后者是极为不利的……现在行租佃制。假如我們拿它同劳役制一加比較，就不难看出它对地主是多么有利。

在租佃制中佃农不可能区分他的劳动哪部分是为地主的，哪部分是自己的，这就迫使他以同样的勤奋从事劳动；假如他所耕作的土地的数目同他的力量相称，那末他就可以获得現有农业发展条件下可能获得的一切。”（农业部促使公布的 Le Métayage 法。）

④ 在封建权利内 Banalite 这个詞的含义是指地主有权强迫农民使用属于地主之物，如使用灶或配种畜而付出租費之意。



有利可图的地方，就用自己去代替公社的代表。使用公共财产的租费是微不足道的。例如在拉蒙斯(Reims)的大主教吉洛曼·不拉希-梅(Guillaume Blanchés-Mains)于1223年頒布的法令上規定牧师“将占有一公灶，使用时每烤三十二块面包征收一块的稅。”布雪·丹吉士(Boucher d' Argis)引用1563年和1673年的命令，它規定使用公共磨坊磨粉收費十六分之一或十三分之一。現代的磨坊主收費已超过十分之一<sup>①</sup>。

这样的制度只能存在于沒有商品生产的时候。它們阻碍着商业的发展和個人剝削公社的可能。因此法国資產階級革命宣布它們是被封建制度玷污了，而在1790年就把它消灭掉。

教堂。——牧师与村民有密切的联系，村民选他和养他；而他則关心农民的教育，用宗教傳説来娱乐他們，用宗教仪式和其它的“演出”来供他們消遣和保护他們不受男爵欺負。牧师和人民之間的这种团结一致从当时教堂的性质可以看出。神庙当时还是牧师、男爵和农民的公共财产，但后来却变成了僧侶的专有财产，除了服务時間之外，不再对人民开放了。歌坛和祭坛属于征收十一稅的人(décimateurs)，就是說属于領主和牧师。“他們所担負的任务是关心合唱队的調整以及它們的牆壁、穹隆、飾物、复盖用布、帷幕、长凳、临时增加的椅子、窗玻璃、供桌和圖画的修理补充……教区的教民則須关心教堂的长形堂，因为这是属于他們的。”——拉·帕阿·德·弗来門維尔(La Poix de Fréminville)說。教堂又是市場，又是公共集会的場所，又是舞会的大厅，在必要的时候还可在里面儲存谷物<sup>②</sup>。

<sup>①</sup> Boucher d' Argis, Code rural, ch. XV, Des banalités.

<sup>②</sup> 1529年的教堂法令禁止“在教堂內或在教堂墓地上組織或举行节庆、跳舞、競技、娱乐、表演、交易和其它非法的集会，因为教堂只能用于为上帝服务，而不能用于这样的胡鬧。”

据泰罗尔德·罗吉尔(Thorold Rogers)說, 在英国教堂到处都是教民的集会地点, 又是遇危險时的堡垒。它所修建的地点就是第一批牧民安設圍牆的地点<sup>③</sup>。以前教堂总是存儲宝物的神圣的地点; 希伯来人的耶路撒冷的教堂, 羅馬人的威斯达(Vesta)教堂以及希腊人的台尔弗教堂都是保存財宝的地点。

中世紀教堂的鐘是属于农民的, 农民鳴鐘以警告集会, 火警或攻击。在十七和十八世紀法兰西各省的法院档案中可以見到对鐘作出判決的記載, 控訴它們警告农民盐稅征收吏或国王的宪兵的到來。它們被判決取了下来, 由劊子手拿着鞭子抽打, “虽然它們在非常隆重的仪式之下被施过洗禮, 使用过橄欖油、圣香、沒药和唱过禱詩。”教堂是上帝之家, 这同封建城堡恰恰相反, 农民都团聚在其周圍。

**十一稅**——这是牧师的薪俸, 以前由教民供給, 現在由国家支付, 国家以稅收的形式征收它。像其它的封建义务一样, 十一稅是用实物繳納的。瓦本(Vauban)<sup>87</sup> 認為十一稅和其它以实物繳納的課賦对于农民比較金納賦稅要輕些。实际上, 它們是取自收获物, 依收获的好坏而定多少, 至于金納賦稅則不管收获丰歉总是不变。为了納稅, 农民必須出賣自己的产品以換錢; 在这种交

---

但是, 这个法令似乎沒有发生什么效力, 因据1742年9月号的《Mercure de France》載称, 在貝森松(Besançon)教区内, 每逢复活节就举行一个名为北格来特(Bergerette)的舞会, 这是由教堂自己規定的: 在教堂里面跳舞; 当跳舞結束时用紅酒白酒举行庆宴。

在波內(Bonnet)的《舞蹈史》(Histoire de la danse)里說: 在圣瑪尔肖尔(Saint Martial)节日, 比里加尔德(Périgord)的居民在教堂內跳舞, 一边高唱贊美歌。在每段的末尾重唱着:

圣瑪尔肖, 为我們祈禱吧!

我們為你跳舞。

<sup>③</sup> Thorold Rogers: *Economic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历史的經濟解釋)。

換中小农因迫于貧困而不得不忍受銀行家和拥有货币的粮食商人的剝削。

假如一切現代的政府都采納現金收稅的办法，那末这不只是使得稅收經常不变，并且还为了使出賣谷物的一切風險推給农民去承担。

报效教堂的十一稅开始时并非是必須的，像現在在爱尔兰的情形一样。据馬布利 (Mably)<sup>88</sup> 說，在投降查里曼大帝的地方找不出一个地方曾經硬性規定必須繳納十一稅。順便說一說，十一稅既可繳給牧师，也可繳給魔師。十九世紀里昂的大主教阿加巴尔德 (Agobard) 痛苦地埋怨說，繳給牧师的十一稅远不及繳給有呼风喚雨之能的魔師那么認真。大約由于这个緣故，在 794 年由查里曼大帝召集的弗朗克弗宗教會議为了全数收齐牧师的十一稅，竟拿出惡魔来吓人。會議发布了一个敕令，上面写着：“在最近的灾荒时期出現了空穗的麦子，这是由于惩罚不繳十一稅而被魔鬼破坏了。”牧师和巫师，魔鬼和上帝常常是同一个人，只是名称不同而已。

但是由于封建的俗語所說：沒有无义务和十一稅之土地，十一稅便变成必須的了。它变成公产权而賞賜給世俗的領主和修道院长。十一稅本来是为了取得牧师的精神援助而自願繳納的，却变成了必須的而最后終於变成与任何服务都沒有关系的強制的課賦。于是高貴的黃金变成成为卑賤的鉛。

## V. 封建財產扩大的方法

假如封建义务当男爵停止执行保护自己的家臣、佃农和农妇的任务时而变成重担和非正义的，但它的产生是由于相互協議，那末貴族的土地財產的增加只是由于欺詐和暴力，主要是靠侵占公共財產。开始时这只是临时受委托的軍职，或者單純的土地分

配权。

在我介紹給讀者的著名的《資本論》第二十四章內曾講到对农村居民的剝夺，馬克思指出苏格兰和英格兰的領主曾用野蛮的和肆无忌惮的方法完成了对农民土地的剝夺。大概任何一个其它的欧洲国家都不能夸耀其所养育的貴族曾以如此貪婪和殘暴完成过土地的独占。但是在一切文明的国家里农民的土地和世代相傳的权利总是被剝夺了，为了达到这个可夸耀的和有利的目的，資產階級和貴族曾使出一切手段。

这里是其中的几个例子。貢賦和徭役变得这样繁重，尤其是从貴族不再起有益的作用以后，以至农民为了贖償而同意把村公社的部分土地註給領主。領主所貪求无厭的这种土地的註与显然常常都是靠欺詐来达到：貴族收买了若干农民，由他們組織可以自由操縱的村会来表决土地的轉註。因此在法国常常可以发现国王为廢除这些決議和使土地轉归公社的許多命令，命令还指出假使为召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全体居民沒有作出一致的決議，公有地的任何註与都是无效的。

公有地的掠夺者并不总是采用这种議會的手段，他們常常干脆就搶。

在十六世紀，当工商业資產階級发展起来的时候，貴族和投机家都垂涎于公有土地。城市人口增长了，为了满足它的日益增多的需要，农业必須增加自己的产品。农业的发展成了所有社会阶层关心的事业。在扩大耕地的借口之下投机家取得了法国国王准許开垦荒地的命令。他們急急忙忙把公有地也归入荒地之内，企图从农民手里把这些公有地夺取过去；于是农民不得不拿起武器来保卫这些土地；为了镇压农民的反抗，侵占者向国家的武装力量乞援。順便說一下，派遣武装援助的国王之一便是亨利第四，就是这个国王他曾說过願意每星期日都看到每个农民的湯里有鸡肉。

貴族为了侵占农民的土地而采用狡猾的手段；他們断言說农民虽占有土地，但沒有相应的、在許多場合都完全有效的証件；他們要求檢查土地权，而把其余的都沒收归为已有。有时他們也采用其它方法：当拿到証明农民的土地权的文件时，他們便一火焚之，而农民既然不能証明自己的权利，那末土地就变成无主的了，因而像俗語所說——沒有无領主的土地——他們侵占了它。1789年財產契約的燒毀只是对十六世紀以来貴族的行为的报复。

森林的侵占开始得还要早。不顧文件的規定，領主强占了森林和幼林，把它們圈起来，禁止农民进去打猎和剝夺了农民世代相傳的砍伐建筑木材及柴薪的权利。貴族对公有的森林的这些侵占引起了广泛的不滿并因之而掀起大暴动。十一世紀在罗曼·德·洛(Roman de Rou)有一个农民說：“領主对于我們只是禍根。他們拥有一切，支配一切，享用一切，而强迫我們过貧困痛苦的生活……为什么我們要受这样的待遇呢？我們也是人，像他們一样，我們有一样的肢体，一样的軀干，我們一样也有忍受痛苦的能力，并且我們是以一百人对一人……防卫我們不受騎士的欺負，团结起来，誰也不能再騎到我們头上，我們可以砍伐树木，在树林里打猎，在池塘里捕魚，并且自由自在地在森林、在草地、在水澤过日子。”

在十四世紀中叶在法国的北部和中部諸省爆发了雅开利(Jaqueries)<sup>89</sup>起义，就是因貴族禁止农民使用森林和水澤而引起的。

这样的暴动在德国也是层出不穷，从反对亨利皇帝第四的薩克逊暴动起，直到苏阿布(Souabé)的农民暴动止，后者是在路德(Lulter)<sup>90</sup>时为反对領主禁止使用森林和水澤而爆发的农民武装起义。

在阿尔薩斯和洛連的流血暴动就是苏阿布暴动的反应。

这些暴动迫使領主在許多場合都不得不尊重农民的“使用权”，这种使用权是如此巩固地建立起来了，据拉·帕阿·德·弗来門維尔在1760年說：“这种权利是不能剝夺的，即使农民使用得不好，因为森林使用权应当被認为是长期的，就这一点來說，它既属于現在活着的农民，同时也属于他們的后代，而誰也不能把尚未降生的人的已得的权利剝夺掉。”但是資產階級的革命家并不像封建的法学家那样尊重农民的权利；他們为了大土地財產的利益而消灭了它們。

假如領主有时不得不承認农民的“使用权”，那末他們总是宣稱这是他們賞賜的特权；他們儼然以森林的所有主自居，正如往后他們向自己的家臣提出土地权要求一样。在中世紀，当拥有自由土地的自由人为了寻找寄托（*recommadation*，这是中世紀的一种法令，它規定家臣对領主的人身依从关系。——譯者），就是找一个强有力者的保护，他便把一片土地帶給他，誓效忠誠和甘心承担一定的义务，或以力役，或以实物完納。然而他仍然是自己土地的主人。但是某些省份的封建領主宣布自己是土地上的一切东西的主人，同时也承認农民的地面权利，就是对地面上所有的一切东西的权利：房子、庄稼、树木、收获物，虽然依照封建法領主是不能占有地下之物的，因为为了开矿，甚至是在自己土地上，他也必須得到国王的准許，这准許証只在一定时期内有效，而且要交付貢納。但是，依据这种法律上的虛构，現代不列通（*Bretagne*）的貴族要求剝夺庄稼人，这是他們的祖先的家臣的后裔。

## VI. 封建財產的限制

1789年的資產階級革命創造了土地私有制。在此以前法国的土地既属于貴族，也属于农民，都得服从地役法，它在一定时期内完全剝去了土地的私有財產性質。农民不仅可以在貴族所霸占的

森林中放牧牲畜，并且也可在耕地上放牧；一旦收割完毕，土地就成为公共的了，农民可在上面放牧自己的畜群。这个法令甚至还扩大到葡萄园<sup>①</sup>。土地所有者不仅应当让出空闲的土地以供公共畜群放牧之用，而且还无权播种，只有他自己认为应当播种还不行，必须取决于公共会议的决议；如要种葡萄，还须取得国王的许可。在革命前几年，孟德斯鸠拒绝了这些法令，百科全书派对它也是不能容忍的。

地主对土地负有义务：他无权让它荒蕪。1693年十月十三日路易十四发布敕令，依据这个敕令，假使遇到地主本人不亲自耕种自己土地的情况，“所有的人都可以去播种和收获，但须与土地的主人分配其成果。”这个命令只不过使古老的习惯合法化而已。柯吉勒(Coguille)说：“我们的市长热心公益事业，非常有条有理地引用习惯法，依据习惯法所有的人都有权耕种别人的熟荒地，不必得到主人同意，只须向名义的主人缴纳土地税就行了。这种税并非到处都一样，它随耕种者的数目和土地的肥瘠而不同，在某些场合它相等于收获物的三分之一，有时是四分之一、五分之一、六分之一，而有时是七分之一；它依照地方习惯而有所不同。”(Questions et Réponses sur les coutumes de France, § LXXVI.)

封建的土地财产完全不是自由的，它不属于个人而属于家庭；它的合法的所有者不得将它出卖；他只是土地的使用者，有责任将它传给后代。教堂财产具有同样的性质，只是它们不属于一个家庭，而是属于贫穷者和教堂，属于加特力教的大家庭。使用它们的院长、僧侣和牧师只是管理者，虽然是很不可靠的。为了逃避纳税；法国的僧侣直到革命以前都断言说教堂财产不能与普通财产

<sup>①</sup> 佛朗沙阿·德·涅夫谢托(François de Neufchateau)在他1806年出版的《Voyage agronomique》里引用了1763年由贝龙的农业经济研究会公布的一篇札记，该文作者对葡萄收获后葡萄园必须拿来放牧羊群，像“公共土地”一样，很为不满。

一般看待，因为它不属于任何人，——因为这是神圣的财产，教堂的财产。资产阶级的革命者抓住了这些话，他们宣布说教堂财产的业主是教堂而不是僧侣；希腊文 *ecclesia* 一词是由 *Église* (教堂) 而来，其涵义是集会、全体信徒的团体、它与国家、民族的意义是相同的；因此教会的财产应归国家所有。于是他们使之国有化，正如当年查尔·玛尔台尔 (Charles Martel) 曾把土地分给自己的战士而使之“社会化”一样。资产阶级的革命家效法英国的亨利第八掠夺了教堂的财产并且还把手属于贫穷者的和国家的也瓜分了。

自由主义的历史家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曾经最猛烈地攻击过这种地役权，而涅夫谢托 (Neufchâteau) 甚至把它称作“封建的铁锈的污点”。然而这是原始共产主义的残余，曾给农民提供某些好处。一到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代替了封建财产之日，他们的这些好处也就被剥夺掉了。

## VII. 关于 1789 年革命的神话<sup>91</sup>

历史的无耻的伪造者，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和历史家编造了关于 1789 年革命的神话。按照他们的说法，这次革命是为了农民的利益而完成的，它分给农民以土地。听了这些话，人们会以为农民的财产以前是不存在的，它必须等到国家财产出卖和公共土地瓜分时才能出现。这种大量的土地出卖只是英国亨利第八在十六世纪所干过的事情的重演，只不过规模更大而已。它只有利于投机家和资产阶级，他们利用这个机会来牺牲贵族和僧侣而发财致富，扩大自己的财产和以低廉的价值获得大片的土地；但是，正像莱翁士·德·拉维伦 (Léonce de Lavergne) 在《农业经济》(«Économie rurale») 里所说，它只是极不显著地增加了小所有者的数目。实际上，革命前的法国，据芮克 (Necker) 说，“曾有为数不少的小土地所有者”。阿尔杜尔·杨格 (Arthur Young) 说：“小土地所有者数目如



此之多，我甚至想到它可能构成王国的三分之一。”弗朗苏阿·德·涅夫谢托断定“在构成狄訖(Dijon)元老世襲財產諸省內，土地分配給大多數居民；完全沒有土地的只是其中一部分”。所有他們老早就有了土地，他补充說，因为他們的份地随着多少世代的死后分产而无止境地分散着<sup>①</sup>。

1789年的革命根本沒有創造小的財產；相反地，它不但沒有給农民土地，而且从他們手里夺去了公共財產的一部分和使用貴族及資產階級土地的地役权：如收檢遺穗之权，在森林里和在收割后的田地上放牧牲畜之权以及其它对农民的福利同样攸关的权利。革命只是有利于貴族阶层出身的中等的和大的所有者，也有利于資產階級。

貴族的冥頑不灵到了极点，因为他們不理解代替过时的、有名无实的特权，資產階級革命使他們解脫了封建的地役权，这是他們自己要求廢除的，这种地役权，按照十八世紀流行的說法，使土地在收获之后便丧失掉私有財產的性質并轉变为公共財產。革命前的一位农学家，杜阿梅尔·丢·蒙莎(Duhamel du Monceau)，严格地和正确地批評了收获后在領主土地上放牧公共牲畜之权，因为这会妨碍新的耕作的施行，但又补充說：“可是既然我認为必須相当尊敬古老的风俗，那末在我看来，恢复地力的唯一方法将是承認每一个地主有权保留三十分之一的土地不作牧場使用。”<sup>②</sup>

1791年9月28日关于“农村財產和习惯”的法律准許地主完全不把自己的土地供作牧場之用。对农民的傳統法的这个蓄謀对他們來說远比消灭王朝和僧侶的民法制度更加重要，这就引起南部(Auvergne, Anjou, Poitou Vendée, Bretagne 和 Alsace)的农

<sup>①</sup> F. de Neufchateau: Voyage agronomique dans la sénatorerie de Dijon, 1806.

<sup>②</sup> Duhamel du Monceau: Éléments d'agriculture, 1762.

民暴动起来反对革命<sup>①</sup>。

当亡命者坐着“外国军队的輜重军队”从国外回来时，就重新收了他們沒有出賣并且解除了封建地役权的土地，为那些已經出賣的土地，国家以高价賠償他們<sup>②</sup>。

不是革命把法国的土地从貴族的爪子下取走了；这是金融家、工业家和商业家干的事，他們很快就完全把土地抓到自己的手中去了。由于不断剝夺小土地所有者而集中起来的土地財產只是用来維持那些又粗野又愚蠢的寄生者的可耻的奢华，这些人既沒有封建男爵的战争中的英勇，又沒有凡尔赛宮臣的文雅和礼貌。

在征收土地稅并且是法国領土中可耕而有出产的 49,388,504 公頃土地中，有 2,574,589 公頃归 5,091,097 个地主所有，就是說平均每人半公頃，然而却有 8,017,542 公頃集中在 10,482 个資產階級化了的貴族和家資百万元的資產者的手中，就是說每个寄生者平均有 764 公頃。同一个国会在 1871 年把法国的亚尔薩斯和洛林割让出去，如今又把 33,000 公頃交付給奥尔良諸王子。根据一份可靠的資料，罗斯希尔德 (Rothschild) 家族拥有土地 200,000 公頃<sup>③</sup>。

① 在領主土地上放牧公共畜群这个习惯的意义究有多大，可从当时一个农学家的书中看出：“这对于多数的小所有者是个重要的帮助，他們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养活家畜，有六、七个月的时间都在公共休耕地放牧。所有村庄的每个居民即使沒有土地，也都有一、两头牝牛，五、六只母羊，有时还有馬。由此他們取得乳、油和干酪，这些可充作食料，还取得毛，可以用以做袜子、帽子和粗布料。沒有土地不需要肥料的人可以把它卖掉，只是在冬季他們必須拿一年积攒的錢来买干草。”(G. Deschenes, *Mémoire sur la vaine pâture et les jachères*, tome V des *Mémoires publiés par la Société d'agriculture du département de la Seine*; an XI.)

② 在 1825 年 1 月 3 日由姆·德·瑪蒂納斯 (M. de Martignac) 提議的十亿法郎賠款法案的說明部分里，被出賣的貴族土地的总價值估計达 987,819,968 法郎。

③ 下表指出土地財產的大概分配；它是依据 1884 年官方的土地稅表編制的。

国家分給农民的一片土地养不活他們，然而他們就被拴在自己的土地上，这就使資本主义的地主有可能經常控制着一批零工。在革命以前，为了在收获的日子和在一年中的任何時間能調度工人起見，許多省的地主都不得不把农民安置在自己的土地上，分給他們一片相当于一、二公頃大小的土地，上面还有小房子；这些小农場送給农民是为了交換到一定数目的劳动日，它被称作 *manouvrieries*④。

类别标记	納稅額	业主人數	以公頃計算的征稅地面	业主平均拥有公頃的数目
极小业主				
一公頃以下	8,585,323	5,091,097	2,574,589	0.50
由1至2公頃	1,841,045	1,091,740	2,636,867	2.41
由2至5公頃	1,894,128	1,123,218	6,010,847	5.35
小业主				
由5至10公頃	892,887	529,482	6,254,142	11.81
中业主				
由10至30公頃	627,860	372,321	10,281,515	27.61
由30至50公頃	110,812	65,711	4,214,745	64.14
大业主				
由50至100公頃	73,503	43,587	5,059,217	116.08
极大业主				
由100至200公頃	31,567	18,719	4,338,240	231.75
200公頃以上	17,676	10,482	8,017,542	764.88
总额	14,074,301	8,346,357	49,388,304	

④ 为了保証零工或如人們所稱的 *Mannouvriers*，地主不得不把他們安置在自己的土地上面。这个习惯流行很广，甚至一直保留到革命之后，培尔杜伊 (Perthuis) 在他的 *«Mémoire sur l'art de perfectionner les constructions rurales»* 里設計了这种农民住宅之一的計劃，它包括一个房間，一边与畜棚相邻，另一边同小小的干酪制造厂、乳品厂相邻；这里还有一間小貯藏室以备存放待出賣的小經濟的产品（麻、大麻等），或者供作技艺实习之用。“与零工的小房子相連通常都有一块二个米突制的阿尔潘 (arpent) 的耕地，在地里房屋和其余的建筑約占二分之一阿尔潘……沒有土地的房屋是不被零工重視的……零工的全部畜群就是两头母牛，有时还有一头幼畜，这是主人把它当作死的财产 (*cheptel mort*) 給他們的。”

現代农民占有的一片土地与上世紀的零工的份地起了同样的作用，只有一点区别就是現在他們必須为这土地付出現金。

集中在金融家手中的土地拿来出租或者靠那些采用先进的科学和农业技术成就的农学家去耕种；但是由这些寄生者独占了的一部分土地却变成了他們寻开心的猎場，野鸡和兔子从这里挤走了农民。

革命并没有让农民更容易得到土地，相反地使他們得到土地更困难，因为它使地价和寄生者收取的地租不断增漲。

	1789	1815	1859	1884	
每公頃的平均价格……	400	600	1000	1800	法郎
每公頃的地租……	12	18	30	54	法郎

1789年的数字是从弗尔巴納(Forbonnais)和拉瓦阿西(Lavoisier)那里引用来的，1815年和1859年的数字是从拉威尔涅(Lavergne)那里引用来的，而1884年的数字是按照財政部門的估計确定的，它估計每一公頃的平均价格是1,800法郎。假如認為現在的平均地价是2,000法郎，而每公頃的地租是60法郎（拉維格涅按3%計算地租的數額）<sup>①</sup>，那末这将是偏低的数字。

土地財產的出賣价格在一世紀之間增加到原来的五倍以上。土地价格的这个巨大的增长虽不是农业經常发生危机的唯一原因，却是主要的原因。

农民如果没有錢，就是說如不把一生交給高利貸者之手，便不能买地。因此他只是名义的所有主；土地已經不属于他，而属于銀行家；他为了偿还債息而劳动，这債台是愈筑愈高。

寄生的地主的利潤越多，农民的收入越少。資產階級为了农民完成了革命，而农民为土地所付出的租金却远比中世紀的农民

<sup>①</sup> L. de Lavergne, *Économie rurale de France depuis 1789.*

所支付的要重得多，因为封建領主与农民事业的成敗是利害相关的，其地租不是預先規定不能变更的金額，而是好的或坏的收获的一部分。在歉收时往往不收租，領主反而不得不給农民谷物、草料和牲畜。

奧利維·德·塞爾 (Olivier de Serres) 当宮廷貴族竭力加重租佃条件时写书推崇对分制是最好的租佃制，按照这种制度，領主在供給所需要的半数牲畜、农具和种子时只留給农民喂養牲畜所必需的数量干草和谷物。但是倘若追溯得更远一点，我們还可发现对农民更为有利的条件。萊·德利爾 (L. Delisle) 在他的中世紀农民階級研究里，在其它的租佃契約之間他提到聖-朱理·德·杜爾 (Saint-Julien de Tours) 修道院的佃农，这些佃农把收获的六分之一交給僧侶，而按照其它的契約則交十分之一或者甚至十二分之一<sup>①</sup>。这不只是某一省才有的特殊条件，它們在南部也常碰到。注明1212年和1214年的一些契約証明謨阿薩克修道院的僧侶把土地交給自由农民耕种，征取收成的三分之一，四分之一或者只有十分之一。拉格来茲-福薩 (Lagrèze-Fossat) 研究了这些契約之后指出說：“农民和僧侶和睦地进行談判，分給僧侶的部分并不帶有强迫貢賦的性質；它是按照相互協議預先談好的。”<sup>②</sup> 在栽植葡萄的省份，葡萄是由佃农栽种；地主征收收获的一半，并且不能把佃农及其后代从他們所栽种的葡萄园赶走。盖拉尔 (Guérard) 在1844年公布的普萊 (Prés) 的聖·基明 (Saint-Germain) 修道院的收支賬簿使我們有可能研究十九世紀的农奴和自由农民的生活。土地不是交給个人而是交給农民公社耕种，他們共同生活和共同劳动，像上面所說那样。

① Léopold Delisle, Étude sur la condition de la classe agricole au moyen âge, du dixième au quinzième siècle, en Normandie; 1851.

② A. Lagrèze-Fossat, Études historiques sur Moissac, 1872.

修道院的土地分为自由的(manses ingenuiles), 数目較多, 和农奴的; 在中世紀土地帶有精神的性質; 它是領主的, 家臣的或农奴的。佃农有义务做各种工作和繳納牲畜、家禽、蛋、蔬菜、芥和其它的食品和日用品: 条板、葡萄架、木柴、柳条等等。盖拉尔以金錢計算过这些貢賦和义务的大概价值, 結果找出每一公頃自由地要支付六法郎十三生丁的力役租和十法郎六十二生丁的代役租, 而每一公頃农奴的土地則征收十五法郎三十四生丁的力役租和六法郎四十六生丁的代役租。修道院的农民达到10,026人的穩定数字。按照姓名来判断, 多数是日耳曼族出身的。修道院农民劳动的条件, 依照他們的人数如此之多这一点来看, 应当已成为大致上一般的規則。倘若把資本家的地主換成十九世紀的僧侶, 以便为每一公頃土地繳納的二十一法郎和八十生丁不是現金而是工役和实物, 那末任何一个現代的农民也不会不同意的<sup>①</sup>。

1789年的革命如果沒有农民的积极的和消极的协助是不能完成的, 然而它却欺騙了农民的一切希望。这次革命完成了貴族所开始的掠夺; 它无偿地剝夺了农民的权利和公共财产, 这是几世紀以来貴族、僧侶和資產階級垂涎的对象; 它解除了与原始共产主义相联系的土地的地役权, 它把私有财产及其使用土地直至濫用土地的絕對权利推上宝座去。

为了爭回那被領主夺去的权利和财产, 农民們一听到国民議会的第一个号召便投入革命的风暴: 带着瘋狂似的喜悅和正当資產階級的革命者大为吃驚和心怀不滿之时他們燒了城堡和封建契約。但是逃脫了貴族的銳爪, 他們又落入資本家的魔掌之中。

农民之被資產階級革命者所欺騙, 正如革命的志願軍期待着

---

<sup>①</sup> Polyptique de l'abbé Irminon, ou dénombrement des manses, des serfs et des revenus de l'abbaye de Saint-Germain des Prés, sous le règne de Charlemagne, publiée par Guérard en 1884.

許給他們的價值十億的流亡者的財產却被土地投機家搶奪去了，正如貧農“雅克”被埃迪納·馬歇爾 (Elienne Marcel)<sup>92</sup> 出賣了一樣。

然而受了挫折的，但是不能戰勝的農民現在又集合在社會主義的紅旗之下，以便重新開始社會主義革命，這個革命將剝奪剝奪者和糾正 1789 年革命的罪行。

## 第五章

### 資產階級的財產

#### I. 商業的起源

我們在前面研究了土地或不動產開始是屬於整個部落共有，而後，在氏族分裂為母系的和父系的家庭時，就轉變為集體財產，最後，當父系家庭又輪到瓦解和營共同生活的家庭解散時，就轉化為個人財產。這時的家庭已經只是由父、母、子女所組成，照基督教牧師馬爾薩斯的看法，人數愈少愈好。

動產迅速地通過了自己的發展階段。它也是在共有財產的形式中產生的，但是幾乎沒有過渡的形式就轉變為個人的財產。甚至原始共產主義時野蠻人的武器、首飾和個人使用之物，這些都被視為人的附屬品，也同占有者的屍體一起焚毀或埋葬。這常常是很合邏輯的，野蠻人承認在人的身上有靈魂——確切地說是一個面貌相同的人——，同時就認為動物、植物和無生物也有靈魂，靈魂可以離開它們而獨立生活；因此在埋葬一個戰士時他們便拆毀他的武器和殺死他的牲畜和奴隸，以便解放它們的靈魂跟到另一世界去為主人服務。

在野蛮时期和在半开化开始时期动产为数是不多的，誰造成它通常就归誰所有；它随着畜群的繁殖，奴隶的引用，金属的加工和工业的发展而逐渐增加<sup>①</sup>。

随着动产的积累野蛮人的习俗也起了变化。在此以前战争只是为了复仇，为了夺回那被掠夺的領地或为了增加由于人口增加而感到不足的自己的領土。如今战争成了一种行当，一种有利于获得畜群、奴隶、金属和其它可以携带的物品的的手段。军事領袖——*rex, basileus thiudans*，——曾經是为了一定的征战而选出来并随着它的結束便失去他的临时的权力，现在却成了必須的和經常的職員，因为战争及其組織从这时开始便成了那些以掠夺为生的半开化民族的經常的职务，他們把掠夺看作是获取財物的光荣手段。在战争中所获得的东西——*peculium castrense*——是个人的财产，正像占有者所制造的一样。但是动产的发展奠定了英雄的掠夺的基础，同样也产生了资产阶级的掠夺形式——商业<sup>93</sup>。

在农村公社内商业是没有地位的。从实行劳动分工之时起也只产生服务的交换，只有普魯东<sup>94</sup>才有那种天真的願望，想在资本主义最繁荣的时期还来恢复这种交换。人們为铁匠或織工耕种田地以交换他們的手艺的服务。在相当的时期之内村落之間只是通过村长的中介而交换自己多余的产品。随着动产的增加，动产也开始交换并逐渐形成一种人的阶级，他們把正在兴发中的城市内部的和同其余城市居民之間的商业抓在自己手中。商人阶级被創

---

<sup>①</sup> “甚至轉移最頻繁和最殘暴的野蛮人也有自己个人的武器、衣服、珍宝和家具。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物品都是他們自己制作的，所以这种财产，在他們之間被认为是神圣的，显然是从每个人对自己、对自己的人身和軀体的所有权产生出来的，就是說，这是自然的财产。”（C. F. Volney, *Observations générales sur les Indiens de l'Amérique du Nord*; *Oeuvres complètes*, édition de 1821.）



造出来了：他們遭受到极端的輕蔑和被比作騙子<sup>①</sup>，然而他們終究成功地使生产者屈从于自己和一点也不参加生产却取得了生产的一般指揮权。这个阶级是两个生产者之間的中間人并剝削他們双方。正如恩格斯所說，在使生产者摆脱劳动之累和交易的风险，应許扩大生产品推銷到远方市場和使自己成为居民的有用的阶级等等借口之下，一个寄生的阶级——社会的真正的蛆虫——于是就形成了。他們在为了一点非常微薄的服务而取得薪資的形式之下从本地的和外地的生产中挤油水，获得巨大的財富和相应的社会影响。就因这个原因，在整个文明时期，这个阶级获得日新又日新的尊敬和愈来愈大的对生产的統治权，最后终于生下自己的孩子——周期的商业危机。

最初的交換是以物易物：其中之一被选作它們的互相价值的尺度。为此目的許多民族开始曾使用牲畜来充当，但是很快就被金和銀所代替。开始时它們的交換是按重量計，后来才使用鑄币，就是承認一切生产品的交換单位。金銀貨幣变成一切商品的商品，——就是这样一种商品，它以隱瞞的形式包含着其余一切商品，并握有神奇的魔力可以随心所欲地变成各种所需要的东西。随金銀貨幣的出現便找到一种集中和占有动产和不动产的有效手段；同时也产生了破坏私有的个人財產的最强有力的工具。

## II. 小工业和小私有的商业

集体村落的农民自己生产他們所需要的衣服和食物；他們只是为了自己的原料加工才需要手工业者（鉄匠、木匠、織工、成衣匠等等），他們按需要的程度把这些手工业者吸收到自己人中間来并

---

<sup>①</sup> 康貝尔(Campbell)上校告訴我們說，康迪士坦(Khondistan)的每一个村长都隨身帶着一名由被人卑視的等級拍魯(Panoo)出身的翻譯，專門来对付一切商业事务，因为康德人(Khond)认为卖东西和作交易是有辱尊嚴的事。

把他們安置在村落的周圍，在防護牆之外<sup>①</sup>。

过了—定時間的生活之后，通常是一年又一日，手工業者才取得市民權和被准許在公共牧場牧放自己的家畜。在這樣的村落開始並沒有產品交換：手工業者是給公社服務的公職人員，每年收到的工資報酬是實物。他們只為加工訂貨而勞動：原料由主家供給他們，如果方便的話，他們就帶着工具到主家去做。即使當他們停止了為社會服務時，他們的全部服務的報酬仍用實物（谷物、酒類、家禽等等）支付；而假如他們有土地，人們便代為耕種借以酬答造車的、織布的或縫衣的勞動。總而言之，人們支付給他們力役或實物，正如支付給戰士借以感謝他們的保護一樣。在印度的村落中至今還保留着的這種工業形式，只要什麼時候還保存着土地財產的集體所有形式，它就會存在下去。

位於商隊來往的交叉道路上的或靠近河口或位於海岸上的那些村落首先進行交換：在這裡就形成多少受人歡迎的臨時市場，當地的手工業者都為這個市場而勞動。他們只要在哪裡能推銷自己的產品，那裡就會增加他們的人數；他們已經不再被驅逐了，不再被人看作包袱了，而是被召來、被請來了。這些變成了市鎮和城市的村落的居民是由各種手工業者組成的，他們在各行業中都只營一種，因而是相互需要的。市場由臨時的變成經常的，居民之間進

---

① 柏拉圖在自己的《克里提阿》(Critias)里描述着古代的雅典，使我們明白了差不多所有城市的原始生活。據他說手工業者和農夫被安置在直對伊利蘇士(Ilysus)的斜坡上。只有戰士等級才占據雅典神廟和赫發士托神廟周圍的山頂。他們為自己在北面修築了一所公共住宅，住在幾面受風的地点，保護着市民的安靜。在阿克羅勃爾(Acropol)高原上有一股泉水，後因地震而消滅。而在當時它卻不分冬夏源源不絕提供好水。山頂的戰士監視着海盜經常出沒的海和英勇好戰的埃萊西士(Éleusis)和台不(Thèbes)的居民常常通過的帕爾內士(Parnès)峽谷。只要一發現敵人，手工業者、農人及他們的畜群就立即跑到圍牆里去躲起來，這些圍牆是用枯枝、用交叉的橄欖枝編起來的，阿克羅勃爾生長橄欖枝正像在希臘的所有山崗是一樣的。

行产品交换，而在大集市的日子他们还向外地商人和邻村农民出卖产品。

工业的性质改变了：手工业者开始离订货主人而独立。他们不再等待人家带给原料才工作，而是自己去设法弄到原料并把它保存在铺子里；他们不是为订货工作，而是预见到出卖。他们已经不只是生产者，而且是商人，他们买进原料，经过加工再卖出去；他们扩大店铺并招收学生和学徒作助手。为了支付原料和支付手下的徒工的工资，他们必须有货币积蓄，虽然这积蓄的规模小得可怜，实在配不上马克思所使用的资本这个名称；然而这积蓄已经是萌芽形态的资本。

在那些后来转变为城市的中世纪村落中的人口增长阻碍着给予新来的人使用村社财产的权利和剥夺了他们分配土地的可能。土地始终是基本居民的专有财产，他们形成村社的权贵阶层(*patriciat communal*)。在村落中为了保卫的需要而形成封建的贵族。在民主的瑞士的某些城市当中至今还保留着城市的权贵阶层。阿尔萨斯的村社贵族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便成了工业的首领。

为了对付这些独占土地和政权的资产阶级权贵的专制主义，手工业者就组织了行会，在行会里开始时平等占主要地位，没有世袭的等级，它对当地一切工人都是公开的。行会不仅保护自己的成员免受城市的权贵阶层欺负，而且还防止他们互相竞争。它们存在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保证推销生产品的市场，而既然市场只限于当地居民和大集市日的偶然买主，行会的会长应当采取措施来防止剩余的生产者和生产品的出现。因此行会纷纷关闭，限制自己成员的数目，就是限制有权在城市开作坊的人以及他们的学徒和学生的数目，因而也就限制了被生产的商品的数目。原料的加工是按照严格的规定进行的。设备的一切改变或改良都是被禁止

的，以便保證任何一个生产者都不能駕凌于他人之上。为便于行会会长監督劳动，行会的工匠必須在敞開門窗的房子里工作，而有时簡直就在街上工作。每一行会都有自己的专业，它的所有成員都必須严格遵守。例如鞋匠(cordonniers)只生产新鞋，而旧鞋的修理則不是他們的事，这是属于其它行会(savetiers)的专业。

售卖也像生产一样受到非常严格的規定的限制。在市場上，像在我們今天还保存着古风的巴黎之庙(Temple de Paris)一样，当顧客还没有走近卖主的鋪門之前，卖主无权拉他，一当走过了他的門前就又属于邻店的管轄。

这些詳細的規定指示着市場已經具有巨大的意义；往后市場的扩大完全改变了生产方式以及同它相連的全部社会关系。

个人生产的原則是建立在矛盾之上，这个矛盾只有它灭亡才能解决。手工业者，同时既是出卖者又是生产者，这是多面发展的工人，把体力劳动和智力劳动集于一身，他們只有在生产和工具分散于各地的条件之下才能存在。类似的例子我們在中世紀也可看到，那里不仅各省、各城鎮，甚至連每一个封建城堡和农民的住宅都成为食品和其它的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中心，只出卖多余的和只买进奢侈品。不需要輸进消费品，中世紀的城市在經濟上是独立的，因此可以彼此隔离成許多往往是互相敌对的小国家而存在。

中世紀的农业經濟学家劝告土地所有者在自己的土地上生产一切，不要向外面购进任何东西。实际上我們看到封建的領主在自己的城堡中拥有尽可能多的作坊，其中包括武器作坊。

这种生产分散論比生产它的条件寿命更久。

在十六世紀，当从意大利輸入养蚕业时，法国政府不是把它集中在适宜于养蚕的地点，而力图把它分散于各省，甚至也包括那些不适于栽种桑树的地方。

在 1789 年革命时，有人想在法国种植棉花，为了不再去向国

外輸入。而糖蘿卜只因想要免除购进甘蔗糖而向殖民地付錢才被發現。

当封建領主之間的战争由于战敗者的消灭而停止时，战敗者的土地則被并入战胜者之财产，当道路行旅比較安全的时候，各城市 and 各省之間的商业关系就逐渐頻繁起来。市場的扩大引起手工业中心的形成。例如在用英国輸入的羊毛来制造呢絨的甘得(Gand)城，在十四世紀人口已达五十万以上。商业的扩大动摇了封建城市的社會組織。

在这时期，工业发达的城市中的手工业师傅的行会变成了貴族的团体，参加这种团体对于非师傅的亲属是一种特权，要取得它就得出錢，看出身好坏或者由于国王的特殊恩点，并且只有在学徒付出了很高代价而取得长期的工齡之后；学手艺他要納費，升为师傅又要納費，最后要取得工作权还是要納費。行会从自己的成員中把大量非独立地而是在行会师傅的作坊中劳动的手工业工人开除出去。开始时他們还有希望自己成为师傅和開設作坊，但是随着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这种希望对于他們越来越难实现。被行会开除出来的，与曾經領導过他們生产的师傅进行着斗争的徒工联合起来并組織成广泛的、全国性的甚至国际性的徒工团体，虽然师傅的行会总是地方性的組織。

由于生产发展而致富的行会师傅同城市的新貴締結同盟来对付联合起来的徒工，在这个仇視斗争中，徒工常常受到那垂涎行会财富和市政貴族的封建貴族的挑撥。所有中世紀的城市都是这些階級的流血斗争的舞台。

然而市場的不断扩大以及与之相連的商业的发展破坏了师傅的行会和改变了生产方式，因而結束了封建主义最后时期的这种階級斗争；一方面，分散在全国的小生产集中了起来；另一方面，集中在一个城市或一个省份内的工业部門又分散开来。以前的手工

业者变成为工場的部分工作的工人。

### Ⅲ. 工場手工业

十五世紀繞好望角到印度的航路之发现和美洲的发现，使欧洲淹没在墨西哥和秘鲁的黄金里并創造了橫渡大洋的商业，这就使土地财产贬值，对于那在地中海沿岸城市、在荷兰和在汉薩同盟的各城市中发展起来的資本主义生产給予决定性的推动。新的阶级斗争和新的革命的紀元到来了<sup>①</sup>。

新发现的国家受到掠劫和成为欧洲工业品乃至农产品的銷售市場；人們把谷物、酒、干酪等等輸入美洲。殖民地市場的开发和美洲黄金的輸入对工业起了影响。那些通常不属于任何团体、靠商业发财致富和希望使用自己資本的新人們投入了生产，他們想从中获得巨大利潤。为此就必须打破行会团体的規章，因为这些規章限制了生产方式、产品的数量和企业工人的数目。因此他們不能在城市中設立手工业工場，这些工場开始时只在規模上有大小之別；他們不得不到农村去，到郊区去和到新的濱海城市去，那里既沒有城市的权貴，又沒有行会的組織。他們不在巴黎和倫敦而在市区以外，即在圣安东、維士特明士特和索特瓦尔克開設手工业工場，这些工場必然会使行会师傅破产和引起小手工业的

---

<sup>①</sup> 通常只对那些引起人民騷动的政治事件才用革命的名称。而經濟現象則比較不被重視，虽然它們对社会发展和对人类生存的条件的影响更加无比深刻和有效得多。

欧洲农民的风俗和观念在几世紀之間都沒有什么改变，虽然有战争，国界的改变，国籍的变换和政治的革命，一个英国的人类学者最近指出英国农民的迷信与南非黑人的迷信相像得令人吃惊。农村只是从通鐵路之时才开始活动起来。这些以及資本主义文明的其它經濟現象在产阶级的哲学家和政治家粗心大意时悄悄地完成了巨大的社会变革，对这个变革人类自从走出了共产主义和創造了父系家庭和私有财产之时起随便什么时候都知道的。

变革<sup>①</sup>。

站在这个工业革命前列的不是墨守成规和被行会规章束缚住的行会师傅，而是商人和受商人资助的新人。正如我们时代铁路的修建和管理不是四輪馬車行的老闆，而是金融资本家一样。

工場手工业对行会組織进行攻击和起来反对行会师傅的特权，这就不能不与手工业工人以損害，虽然看起来似乎它对他們是有利的，因为它能提供更多的工作，而且是更經常的工作和更高的工資。工場手工业产生劳动分工，这分工增加劳动的生产性，但是也使手工业工人的技能减到最低限度。全部手工艺的个别动作都被肢解和彼此分开。例如大头釘的生产分为二十道手續，全部委托給不同工人去完成。手工业工人以前懂得自己的手工艺的全部过程，一件一件挨次实施而創造成物品，在这上面反映出他的創作的个性，而現在則貶低为片面发展的工人，命定一生只机械地做同样的动作。他的个性也就消灭了；如今他需要几个同志才能完成他以前独立完成的一件工作。他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因为他除了在主人的工場內和在与其他工人同样的条件之下工作之外，不能有别的出路。他是生产所需的集体的工作器官。于是个人的生产一变而为集体的生产。

工場手工业对个人生产的破坏也反应到农村人口和农业上来。各个独立的小手工业者住在农村里或小城市里，通常都有自己的房子或一片不大的土地，他們把自己的時間分配于农业和手工业。工場手工业使他們同农业脫离，剝夺了他們在自己的田地上或在邻近大地主的土地上劳动的可能。它把他們集中到城市里去，这些城市拆毀了城墙并占領了邻近的田地。从十八世紀开始

---

<sup>①</sup> 1614年当路易十三达到成年时在巴黎召开的国会上提出了工业自由問題，可是被否定了。圣安东郊区和其余的某些地区因此就大大发展起来，以致那里的工业享有城市中所沒有的自由。

农村人口外流，地主对这件事很不满意。工场手工业夺去了农业的劳动力，同时又要求大量的农产品来供养新的城市人口。

在集产主义时期的开始城市是不存在的，即使在那享有国王般的权威的军事首领居住之地也是一样。印度的王子旅行时跟随着一群战士和各种手工业者；他们驻扎之地就变成临时的城市：他们依赖邻近农村的贡赋和贡品为生。

六世纪法兰克诸王都靠自己生活和把自己的宫廷安置在极大的农场里面；在国王住宅的周围团聚着宫廷官吏和部落酋长的建筑。其余规模较小的房屋则由各种手工业者的家庭占住，从金银器的匠工和武器制造工到纺织工和制革匠，从用丝绸和金线刺绣的专家到编织毛和麻的粗工，样样都有。除了这些建筑以外，在国王的农庄里还有家杂用房：谷仓、畜棚、柴棚和畜圈<sup>①</sup>。

缺乏道路和交通的困难阻碍着过多的人口集中在一个地点：因为不能养活他们。

中世纪的城市只能指望从邻近村落输入食品，因此城市居民的数目，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总是受限制的<sup>②</sup>。当道路还很少，而且又不安全，这就使城市之间的一切商业发生困难，甚至不可能，谁也没有想到挤压农产品的输出。但是自道路交通状况改善之时起，自从谷物由一地开始调运到另一地之时起，每一城市，每一省份都采取措施来禁止粮食的输出和预防攫取。一切欧洲的城市都颁布命令，要求粮食的出卖只在市场上和在一定的时间内进行；同样的命令也规定了谷物的价格和可以购买的数量。粮食的所有主

---

① Augustin Thierry, *Récits des temps mérovingiens*.

② 世界上最大的商业城市像伦敦现在如不靠从世界各地输入，便不能生存，但是过去曾经有过一个时期农产品是自给自足的。每个居民在城外都有自己的一块田地，他就靠田地上的收获过活。在八世纪伦敦商业的主要对象是金、银、奴隶、马匹和五金。



不得在谷仓中存儲粮食超过两年，違者沒收充公；也禁止买青或买谷仓<sup>①</sup>。

由于城市的扩大和从外地取得粮食的困难，每一个歉收之年都会引起挨餓或者真正的飢饉。城市当局主要关心的事情是預防挨餓。他們广設粮仓，預見到哪里歉收就往那里的粮仓运送足供六个月或一年之需的粮食；經常关心着保証每年都有足够的土地播种谷物，并且限制其它的农作物。1577年的敕令企图限制在法国逐渐扩大的葡萄种植，指出在每一重新种植的葡萄园地带必須留出加倍大的粮田。

为了滿足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的需要，农业必須发展。在十六、十七世紀人們开垦了新的土地，森林砍伐了，沼澤弄干了，麦田扩大了。在丰收的年景粮食多得使它的价格不能补偿生产的費用；曾必須寻找新的市場；于是决定向其它省份甚至向英国和殖民地輸出粮食。但是这种权利只是暫時許予：一旦谷物在一定的地点达到某种价格，輸出就被禁止。从1669年到1683年十四年中間，法国有九次准許出口，而有五次禁止出口。这些經常的命令不能預防地方的飢饉；由于禁止丰收省份的粮食輸出，往往反而更加助长了飢饉，因为受飢餓威胁的城市截留运送过境的谷物，或者完全禁止它的运送，假如害怕竞争的話。柯尔貝(Colbert)为了强迫波尔多省議會允許二千五百袋谷物运入巴黎，曾不得不采取暴力。

因此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形，城市受着缺粮之困，而离它二十公里外却是丰收。其它农产品如酒、毛等等的流通也碰到同样的障碍。为使本地酒銷售便利起見，波尔多和馬賽不許其它省份的酒

---

<sup>①</sup> 在中世紀也像在革命时期一样，規定了卖价的最高限。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工业家和农业家都設置关税，想强迫消費者按最高价格购买：这就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所追求的目的和资本家对消費者所表現的同情，强迫他們經常降低工人的工资。

运到海边<sup>①</sup>。

最后的一批王室的大臣曾力图证明这些禁令的无益和危险，曾经一度取消过，但是又往往被迫恢复。为了消灭垄断，为了取消那与土地财产连在一起，阻碍着现代农业发展的世袭权利，为了取消阻止工场手工业进步的行会特权，这就需要革命。阻碍在城市里开设工场手工业的行会，特别害怕一切的革新；他们禁止一切的改良及施行新的生产方法，以便保证不要破坏行会师傅之间的平等，不然就难免会发生这样的情形：他们中的一人得到了便宜，其余的就吃亏。阿尔贡(Argand)，用两根灯心使普通油灯的光增亮三倍的一种洋灯的发明者，在十八世纪曾被马口铁业行会控告到巴黎的国会里去，行会要求生产灯的绝对权。印花布由于著名的宫廷女官蓬巴杜夫人、拜利和玛利-安图阿内特的说情才准许发卖。罗恩、里昂和亚眠的商会猛烈地反对这个准许，预言着工业的衰落和对于整个法国的大灾难。

1789年的革命把农业、商业和工业从束缚着它们进步的封建道路上解放出来，于是资产阶级的财产就为自己的发展取得了完全的自由。

#### IV. 资本主义的农业

十八世纪才开始注意农业，它在法国的发展水平是很低的。革命前夕的一个农学家写道：“从罗马时代起农业的进步就非常缓慢，这是不好的，但却是无疑的事实。”<sup>②</sup>人们曾不得不研究和注释

<sup>①</sup> 马赛的警察用鞭打惩罚偷运私酒的车夫。就是那些不满波尔多和马赛垄断的城市也在自己的近郊照样地做，不许从邻县去运酒。多菲内的小城文恩在1756年竟向王室会议要求承认自己的特权，率直地声明，禁止外地的酒对它是必要的，“因为不如此的话，居民就会以质量不佳为借口而拒饮本地酒。”

<sup>②</sup> Gilbert, Recherches sur les prairies artificielles; Mémoire de la Société royale d'agriculture de Paris, tome II; 1788.

拉丁文的作者，把他們看作是這個問題的最淵博的學者。像我們今天一樣，效法英國，輸入良種牛和飼草，栽種一百年前在歐洲便已知道的馬鈴薯<sup>①</sup>，進行實驗室的研究<sup>②</sup>，作大規模的實驗，推廣城鄉的農業教育，建立會社、競賽、農業獎；發明新的農具和改良舊的<sup>③</sup>；試驗機械播種和鐵齒耙等等。

在這個使工業、思想和科學徹底翻身的奇蹟般的世紀里，對農

---

① 資產階級的好幻想的歷史家毫不吝惜地將馬鈴薯輸入歐洲這筆賬記在博愛的巴黎第爾(Parmentier)名下，其實這個人是農民權利的死敵；馬鈴薯在英國在1619年已經按一斤一先令出賣。秘魯的侵略者從十六世紀之初把它輸入西班牙，稱為papas，由西班牙而傳入意大利，在意大利推廣時稱為tarutoufli。還有許多其餘的食用植物和觀賞植物也在这時輸入：蕎麥，龍須菜和白菜花(後者的種子長期以來都是到伊斯坦布尔和塞浦路斯去找)，山慈菇，在十七世紀中葉流動的小生意利用它來進行投機。

在維爾摩林(Vilmorin)和愛塞(Heuze)《關於馬鈴薯的起源》的報告里有着關於它在法國歷史的有趣的詳細記載：經過格士巴·包昂(Gaspard Bauhins)宣傳之後，馬鈴薯從1592年迅速進入法朗雪-康梯(Franche-Comté)，進入瓦格士(Vosges)和進入布尔古(Bourgogne)。貝隆松(Besançon)的議會禁止栽種，“因為這是有毒的食物，吃了就會引起麻痺病”。1761年農學家杜阿每爾(Duhamel)極力勸人栽種馬鈴薯。杜爾閣得到醫學系的證明，認為馬鈴薯是滋養而衛生的食物，因此人們才在利圖松(Limousin)和安如(Anjou)栽種。

在1765年卡斯特(Castres)的主教把馬鈴薯分給自己教區的牧師并教給他們如何栽種。巴黎第爾只是在1778年才開始作宣傳。

② 引用經驗達到了可笑的程度。在皇家農業協會的一卷書里有某侯爵的筆記，其中詳述在水銀里栽種的無結果的試驗；他顯然設想過：水銀對於植物像對病人一樣有益。

③ “南部採用的犁，差不多同維吉爾(Virgile)所描述的工具相似(Géorgiques, liure Ier, vers 170—175)。這種犁破土好使，翻土却不行。為了種麥，需要來回翻土九次，因為它入土只不過十二公分”(Paris, Économie rurale le l'arrondissement de Tarascon; Société d'agriculture de la Seine, 1811)。

“人們耕地顯然還是沿用遠古時代的辦法。現代的犁，由於它的簡陋，成為新式犁的主要障礙。最無知識的農人製造它、裝備它和駕用它，費用只花在犁頭上。”(Farraud, Économie rurale du département des Hautes-Alpes; Soc. d'agr., 1811.)

业的兴趣是没有止境的；百科全书派的人们肯定地说种植一棵树就等于作了一件好事。

这个朝气蓬勃的热情证明十八世纪已有这么多的人懂得必须解决这个生死攸关的农业问题，这个问题由于工业人口的增加而日益尖锐。他们周期地遭受饥饿，组织了威胁性的暴动，它促使人民走向由经济原因所引起的革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用资产阶级启蒙的精神宣传这个革命。

然而改良农业的不断的努力因碰到不可克服的障碍而失败了，这个障碍就在于种植和土地的过细分散和农民的地役权。农民的田地由于遗产继承的分割，一分再分以至小得不能再小<sup>①</sup>。贵族和资产者占有的土地虽然面积很大，但是分成许多小的农场，从耕种土地的观点来看，它与小所有差不多相同：象在中世纪一样，在地主的土地上同样实行农民的经营方法，三田轮栽制，休闲地和收获后田地上的放牧权。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为了反动目的而讴歌的小所有制是因循守旧的，由于它的主人缺乏知识和货币资金以及田的规模小，因而不能进步。只要有小所有制存在之处，就适用莱奥波尔德·德利尔(Léopold Delisle)的论点。他在《中世纪农民阶级的历史》的序言上说：“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我们的农业从十世纪到十九世纪，即八个世纪以来没有前进一步。现代的农人还是拘守着修道院证书上所写的方法；假使有一个十三世纪的农民来到我们任何一个小农场里，他将不会感到有什么惊异的事物。”

<sup>①</sup> “土地的分配缺点很大”，——涅夫谢托说——“一块领土或地区，假如其中有五百公顷面积，便分为五、六百小片，由五十到六十个人所占有……由于分散和继续不断的分割之故，出现了很不方便的形式：存在着许多地主占有二十单条的地带（四——五公尺宽和无限长）。这种细分之来源，主要地，如果不是唯一地，是兄弟姊妹之间的私产。这个原因由来已久，带来无穷恶果。”（*Voyage agronomique dans la sénatorerie de Dijon*; 1806.）

子女之间分土地，反动派归罪于革命，其实是农民的普遍习惯。

实行新的农业方法的主要障碍是老的习惯，它禁止所有主在收获后封禁自己的田地；因为不想拿自己的劳动去喂公共的牲畜，没有谁乐于采用新的播种法和新的种植法。还在革命之前就曾试图消灭这种习惯。1777年芮克(Necker)不管只许所有主封禁五分之一土地和允许一切人利用休闲地和牧场的习惯，颁布国王的命令，准许布朗省的地主和佃农封禁自己的牧场。1785年6月23日巴黎议会发布了指令，废除了所辖教区内的这种习惯；在皮卡第、诺曼第以及其它的许多地方也取消了这种习惯。

革命一下子就结束了如此犹豫不决地开始了的事业。

无代价地消灭这种传统的权利和公有土地的瓜分给予小所有者及其耕作方法一个可怕的打击：它剥夺了农民喂养衣食和肥料之源的牲畜的可能。但农业革命马上开始了：森林被砍伐了，以前那么多的沼泽和池塘被吸干了，生荒地被开发了，人造牧场开始播种了，葡萄园和粮食作物的面积增大了，新的种植法被采用了；生产品开始迅速流通并且大量地进入工业城市<sup>①</sup>。

① 1810年塞纳省农业协会汇编给我们提供如下数字，指出上索恩一部分地方的种植规模。

关于上索恩农业经济状况一览表，维索尔区，在路易十六在位时，  
同拿破仑第一称帝时的维索尔和纽尔区作比较

	1774	1805	生 产		金 额	
			1774	1805	1774	1805
人 口						
公社的.....	455	452				
居民的.....	176,323	211,894				
农户的.....	37,827	44,854				
农作的区分						
曳犁用 { 馬.....	3,160	3,109				
{ 牛.....	5,733	6,688				
	8,893	9,797				

	1774	1805	生 产		金 额		
			1774	1805	1774	1805	
种植的 公顷数	小麦…	26,676	35,765	公担 291,647	公担 350,635	每公担 20法郎	每公担 23法郎
	裸麦…	13,135	11,922	168,685	93,504	10	17
	大麦…	16,872	19,095	209,697	130,907	12	14
	荞麦…	10,712	28,612	133,066	112,204	10	11
	杂粮和 蔬菜…	11,320	17,464	152,837	283,686	8	8
		77,715	122,928	955,932	969,936		
种植的 公顷数	萝卜…	1,470	856	7,920	3,900	20	25
	油菜…	—	95	—	390	—	26
	大麻…	1,719	3,590	7,368	15,058	每捆 100	每捆 150
	亚麻…	105	480	240	1,372	140	180
	烟叶…	35	46	800	913	36	48
	3,329	5,067	16,328	21,333			
牧场的 公顷数	天然的	30,128	34,064	1,584,200	1,522,400	6	6
	人工的	—	180	—	7,560	—	8
	30,128	34,244	1,584,200	1,529,960			
葡萄园…	5,341	5,745	百公升 96,630 立方米	百公升 54,000 立方米	12	15	
建筑用木材…	18,180	4,688					
其余的木材…	54,542	100,258	658,120	645,160	1.50法郎	5	
	72,722	101,946					
牲畜	各种马…	10,859	11,891			六个月 的小马 50	六个月 的小马 70
	有角兽…	69,060	80,484			牛犊 8	牛犊 15
	产毛兽…	44,764	67,754			羊羔 2	羊羔 3
				猪肉每公斤	0.40	0.60	

1774年的材料取自报送前军需机关的调查表和维素尔和卢克赛伊尔省特派员米罗德尔·德·圣-费尔任(M. Mirouel de Saint-Fergeux)所编制的收成状况调查表; 1805年的材料取自上索恩省的统计。

这个运动是这样的广泛，以致革命前和革命时期经常发生的荒年变得稀少了，和缓了，农民所想的已不是如何满足需要，而是如何为不断增加的产品找寻消费者。从这时起开始了他们对降低物价的无穷的怨愤，他们不得不以关税税率来作保护工具。不动产的价值提高了，贵族们由于革命而发财致富，这个革命使他们解脱过时的、对于他们这些土地财产所有者有害的特权。

近代的农业现在只需要越来越大的市场，以便充分展开自己的惊人的生产的可能性；铁路和资本主义的工业提供这样的市场。大工厂工业可以吸收农村的人口并使城市里充满成千成万的无产者：资本主义的农业完全有力量养活他们和满足他们的需要。

这个惊人的发展也有自己的非常重要的消极的一面。森林不受监督地让给资产阶级所有主的盲目的贪欲，森林的砍伐使群山秃顶，便丰足的河流变成破坏的泉源。不间断的轮种使土地不能休息，因而也就不能恢复它的肥度。瓦奔(Vauban)已经在他的《国王的十一税》一书中指出农产品向城市输出是土地贫瘠的原因之一，事实也的确是如此，当生活在自然环抱中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向土地取了多少就给它多少时发生的物质循环，由于输出而遭到破坏。土地，万物的多产之母，变枯竭了。在文明的国家里，若不把美洲找来的海鸟粪或人造的化肥施用于土地，就没有丰收的希望。英国是大规模采用集约农业的第一个国家，同时也是感到它的可怕后果的第一个国家。从1830年起，英国的农民到法国南部去同布罗温斯的农民争购马粪和阿克西的油坊里的油渣和油饼；他们甚至从共和和帝政时代作战场的田野中去占土地，因为这些地被士兵的尸体养肥了。他们也是第一批大量使用人造肥料和用机器代替薄弱的人的劳动。但是肥料、改良播种、机器、牲畜和一切现代农业上的设施需要资本，而且是大量的资本。

为了把地耕种好，按照计算，英国的农场主在每一公顷平均必

須投入一千到一千五百法郎的流動資金。現在農業已變成資本主義的工業了。

但是為了觀察資本主義的農業(或如楊基所說的 financial farming)的真正繁榮,就必須到美洲去。

金融資本家興辦農業企業正如建立五金工廠或機器紡織廠一樣;代替機器和棉紡品的生產,他們大量生產谷物、果品和肉類。在1857年拉弗倫(L. de Lavergne)舉出瓦茲省的一個農場作例子,那里播種了五百公頃糖蘿卜,收了三十萬公升小麥;在加來海峽省的農場里播種了一千公頃糖蘿卜和餵養了一千頭大家畜。他驕傲地說:“在英國再沒有更大的企業了。”<sup>①</sup>但是歐洲的大農場同新大陸的大農場(bonanza farms)相比又是小巫見大巫!

從1874年起,一個美國農人,曾一度聞名世界的達爾里姆勃(M. O. Dalrymple)在一個金融公司內管理着六個農場,占地三萬公頃。他把這些土地分成八百公頃大小的片,每片又按二百六十七公頃分成小區,它們通過電報同中央管理處取得聯繫。全部三萬公頃是由一支有六百個零工按軍事方式組織起來的隊伍耕種;在農忙季節,管理處又招募五百或六百名補充工人,分配於各區。秋收一結束,除了工頭和每區留下十人外,其餘一概遣散。在達科他州和明尼蘇達州的某些農場里馬和驢不在工作地點過冬,因為麥茬都翻耕了,它們以一百到二百對結成一群被送到一千到一千五百公里外的南方去,春天一到又從那里趕回來。

機械師騎着馬跟着工作中的犁、播種機和收穫機前進;一遇到小小的故障,他們就在一分鐘內走近機器修理,使它恢復工作。麥被送上日夜不停的打麥機;打麥機是用麥秆燒着的,人們把麥秆通過鐵管投入爐內。在加利佛尼亞州有一種巨型收割機(the giant

---

① L. Gonce de Lavergne: *l'Agriculture et la Population*, 1857.



header)用四匹到八匹馬駕御，它的搖動的刀刀的一個動作就可以割下十六到二十八平方英尺面積上的作物，只留下離地兩吋高的頭，轉動的機翼收拾麥穗并送進板車，經過脫粒，然後裝袋。留在地里的麥茬用火燒掉<sup>①</sup>。

麥粒自動脫下，簸淨，過磅和裝袋，由鐵路運到達爾里姆勃的農場，而後由此再運到杜紐斯或布發洛去。這農場每年增加播種二千公頃；在1880年麥地面積已達一萬八千公頃。

歐洲的資產階級既經奪取了農民的公有財產和廢除其權利，同時向他們征收貢物，把他們委諸高利貸者之手，高利貸者使他們變成僅僅是名義上的占有者，和使他們遭受到大的所有者和美洲及印度的農場的競爭。這些以及其餘的原因加速了對小農的剝奪和使他們變成無產者。掌握在金融資本家手中的美洲農業創造了一種特殊的無產階級。

北美合眾國的大批農業工人是由無產者組成的，他們既無立錐之地，又無一間滑杆泥的茅屋；甚至連睡覺的床和吃飯的匙也都不屬於他們；他們實現了人類畜牲的理想，一切私有財產都被剝脫罄淨；除了直接消費的衣食兩項之外，他們什麼也沒有。他們在田間沒有固定的住所，因此在收穫一結束，便跑進城去。“金融資本農場”的主人到處招募這些無產者，在鄉村和在城市，用大小工頭把他們組織起來，然後送到工作地點去。他們給工人住房，供

---

<sup>①</sup> 普利尼(Pliny)和拍拉第(Palladius)提到高盧人也有類似的機器。拍拉第在《De re rustica》一著中說，在高盧的寬廣平原上施行快速收穫的方法，這個方法可以節省人力：只用一頭牛就可以收完一整片田地。車子安上兩個低矮的車輪，有四角的底和傾斜的側板(上寬下狹)；前面的板比兩側的略低，上面裝了密密的一排小鋸齒，齒端微彎，其距離足以容下麥穗；後面安上兩個車杠，駕上犍牛，頭對着它所拉的、在它前面的車子。隨着它在麥田里前進，為前板的齒所夾住的麥穗就被剝下來并落入車子里，而麥秆則留下未割。拉丁的作家補充說，不要幾個鐘頭的功夫，收穫就不費力地完結了。

給他們吃，給他們洗衣服，治病和按月發工資。他們組成了一支真正的農業連隊，服從軍事的紀律；在同一時間內起床、吃飯、工作和睡覺。平日不能喝酒；只有星期日才許進鄰村的酒店。秋收一結束，他們便被遣散，只留下幾個看管牲畜和家具的人在農場過冬。工人回到城市，找到什麼工作就做什么工作。

土地財產、耕作方法和農村人口成分的改變是因工業財產和金融財產中所發生的變化而引起的。為給工業提供它的工廠及那些只有原始共產主義時代的巨大工程才能相比的大型事業（鐵路、隧道、工廠）所需要的人力和財力，農村不得不減少人口和掏空農民埋藏儲蓄的暗窖。人力落進工業城市，而貨幣則落進金融家的保險箱。

在以前的時代，除了為數極少的貴族、軍人、牧師和手工業者之外，所有的公民都是靠自己種地養活自己。而在資本主義社會却是越來越多的公民脫離農業勞動和主要地從事工業和商業。所有這些人都靠農業人口的勞動來養活。這種情況孕育着革命。

不事農業勞動的人數太多了，致使文明國家的農業必須以革命的速度推向前進；但是，雖然它的加速的和經常的進步，它也像中世紀的小經濟一樣，變成無力供養工業人口，因為人口增加過快，而且金融家和工業家既奪去土地上的人手，又奪去土地本身，使之適于狩獵和娛樂。

十八世紀的工場手工業提出過的任務，又由十九世紀的大機器工業重新提出。在十八世紀之初農業是以增加耕地和根本改變耕作方法來解決問題。而在十九世紀這個問題的解決只是靠工人階級每日口糧的減少，這個階級注定了食料消費的最低量，靠從俄國、美洲、澳洲和印度輸入糧食來彌補本地農業的缺陷，靠創造農產品的國際貿易。法國輸入它所需糧食的五分之一以上；而英國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工業國必須從其它國家輸入它所需的生活資

料半数以上<sup>①</sup>。

在十八世紀土地財產因工業革命而得益；在十九世紀則因它而受苦。農產品的國際貿易引起新國家的處女地同文明國家的地力枯竭了的土地進行鬥爭，這已竭的地力只有靠投入大量的肥料和加緊的勞動才能恢復其豐度。這競爭使歐洲的土地財產陷入經常的危機之中，它的出路只有土地社會化。

## V. 資本主義的工業和商業

中世紀的城市是一個經濟單位；其中有滿足居民需要的全部手工車間。城市與城市之間的商業帶有偶然的性質，而且只限於少數的物品，普通是奢侈品。資本主義的生產達到一定的發展程度，就會破壞這種經濟的獨立性；它使手工業分開，使它們隔離，把它們一個一個地或者幾個一起安置在某些適於它們繁榮的地点。沒有一個城市，甚至沒有一個省份可以擔負居民需要的一切物品的生產；它們只限於生產某些商品；那些停止生產的商品就靠日益擴大的商業來供應。絲廠曾企圖分布全法國，到十八世紀末幾乎全部集中在里昂及其近郊；自從絲里摻棉花之時起，它們又移到接近棉花生產的中心。在一些地点集中了以前分散在城市和鄉村的麻綫和毛綫的生產；在另外一些地点則集中了鐵、糧食的生產，制革業，制鞋業等等。

以前的公共的經濟單位為另一種所代替。以前的經濟單位是由城市居民所需要的一切手工業組成，在這個意義上說，它們是混合的；而現代的經濟單位卻是簡單的，因為這裡只有一種工業及

---

<sup>①</sup> 馬肉、驢肉、騾肉，本來人們對它存有成見，在最近時期已被貧苦階級充作食物，他們只能偶然吃到牛羊肉。基督教想要消滅多神教，禁止吃以上幾種牲畜的肉，因為在多神教的儀式中要殺馬和吃馬肉。資本主義的文明企圖消滅它所依托的基礎，和使人類回到原始共產主義的風俗和習慣。

其补充：这里是棉花，那里是铁、煤、糖、皮革等等。资本主义国家例如法国已经不再按照它们的地理形势和历史传统划分为自治省，而划分为简单的经济单位：产棉区，制酒区，谷物区，生产甜菜区；煤炭和冶金的中心。

所有这些城市由于彼此的需要而联结起来，并且没有一个工业中心若不从其它地点输入而能生存一个月甚至一星期，如像中世纪的城市那样。卢昂为全法国制造棉织物，它从里昂取得丝，从孟纽松取得铁，从巴士取得粮食，从北方取得牲畜，从加来海峡省取得煤，从马赛取得植物油，从埃罗取得酒等等。资本主义的国家是一个巨大的工厂：社会生产的每一个部门都集中在某些地点，彼此的位置相距很远，但又由相互的需要而紧密联系着。中世纪城市的政治上的自治，这是经济独立的结果，如今已不复存在了。由经济需要和商业关系联系起来的各个中心之间的劳动分工形成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单位的基础。

资本主义的生产，它曾消灭了手工业生产的地方的和省区的单位，现在准备破坏自己的产儿——民族的单位和代之以更广泛的国际单位。

英国，这个使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的第一个国家，想要使其它国家变成只是农业国家，以便给它提供粮食和原料，原料加工则是她一国的事。兰开夏应当纺织印度和合众国所生产的全部棉花<sup>①</sup>。但是国际工业壟断的过早的企图终究是失败了。现在美洲生产的棉织物在数量上已超过自己的需要，而印度的纺纱厂和织布厂虽被英国破坏，仍然采用机器方法纺织。在1870年它的制造厂

---

<sup>①</sup> 笛斯拉里 (Disraeli)<sup>95</sup> 在1880年为了安慰那些因美洲的竞争而遭受损失的地主，曾荣幸地展开这个计划。他提议英国和它的殖民地(印度、澳大利亚、加拿大等等)结成广泛的关税联盟，用来抵制其它国家的工业品和农产品。假如殖民地能给英国提供粮食和原料，那末英国的土地便能变为牧场和行猎之地。

加工的皮棉达八万七千包，开动的紗錠达三十三万八千枚；到1884年用棉增到五十五万五千包和紗錠增达一百七十万枚<sup>①</sup>。

印度——这是棉紡工业的中心：白洋布开始从加尔各答輸出；細紗只是取道摩苏尔輸入欧洲。在不远的未来，在靠近产棉区制造出来的印度棉織品重新充斥欧洲市場和輸到它来破坏兰开夏和大陆的棉織的中心。向亚洲和非洲輸出棉織物已經不是孟彻斯特和卢昂，而是印度、日本、中国和合众国。一个美国的工业家預見到英国工业家的命运，好心地劝告他們把自己的机器搬到路易西安去，在那里可以不花运输費紡棉花。

全世界的工业的重新配置在我們眼前完成了；工厂安置到靠近它所需要的原料的生产中心去。

但是合众国和英国还在成为国际工业中心之前便已經使欧洲成为附庸。在1861年到1865年，当南北战争时<sup>96</sup>，在奴隶制的各州棉花生产停止了，法国和英国的棉紡工厂的工人紛紛失业流落街头，而在埃及棉花——“黄金植物”的种植被提到最高的限度；

---

<sup>①</sup> Jhomas Ellison: *The Conton trade of Great Britain*; 1885. 在1879年日本政府从欧洲輸入新式織布机并分配于帝国的各部分。从1881年到1882年金融公司兴建了新的工厂，紗管的数目增加很快，在1884年仅三万五千，到1892年便增为三十八万；从事生产的工人有二万之多。輸入日本的棉紗每年减少；在1888年輸入值为一千三百六十一万一千銀元；到1890年减为九百九十二万八千銀元，到1891年再减为五百五十八万九千銀元。很快地日本人便能完全滿足自己的需要并向中国和朝鮮寻找銷售市場。

在写完了以上几行之后，紧接着就爆发了中日战争，它对欧洲也发生影响。它强使中国走出靜止状态和对资本主义的文明門戶开放，这便顛复了它建立在集产制和宗法家族之上的社会組織。汇聚海边城市以便远离祖国去寻找工作的不幸的人們已經不是以千計，而是以百万計了。

从此开始了中国人向西方国家的移民，在1880年5月5日举行的“經濟家协会”(*Société des économistes*)的會議上渴望地說到这移民将“降低欧洲工人的工资和要求”。但是它引起了經濟学家所未料及的后果：它加速了社会革命。

农民 (fellahs<sup>97</sup>) 变贫困了；而埃及的金融家则落入罗特希尔德 (Rothschild) 和国际金融界的豺狼之手。

棉花的生产也企图集中在世界的某些地点。现在美国和印度生产英国所需要的麦子的一部分，而在十八世纪英国生产的麦子还超过需要。文明的国家现时在原料、粮食和销售市场关系上彼此依赖和依赖半文明的国家。这种日益增长着的经济上的彼此依赖在未来将形成全人类政治统一的基础。

商业或前或后地与生产相偕发展。假如在中世纪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商业，当整年都有买卖时，只在集市日期进行，那末从十字军建立起东西方的联系之时起，商业已取得国际的性质。然而运输的困难和危险只许可少数的奢侈品有交易的可能。美洲的发现显著地增加了商人所关心的那些商业物品的数量。

如前面所说，正是这些商人建立了工场手工业和行会工业的变革开了个头。

城市受到某种数量的消费品生产的限制，对其它物品的需要越来越多，国家的贸易跟着便一天天扩大开来。一到资本主义的生产需要外国，以便取得原料，推销自己的产品和养活工人阶级，国际贸易立即就以不平常的速度发展起来。商人在行会生产的影响本来是微不足道的，由于商业而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中获得这么大的权力，使他有可能统治工业。

\*                     \*                     \*

资本主义的生产只有创造这样的工业机体，它只有由生产的地方的集中和生产过程的支解才能造成，资本主义的生产才能前进，由地方的和省区的单位的瓦解到全国的政治的单位的形成。例如，工场手工业的生产把手工业者和生产工具集中在作坊之内，在这里面实行劳动分工，它使工具和工人分开并规定它们只执行一种特殊的活动。手工业者的工具是简单的和为数不多的，而工

場工業的工具就比較多和比較複雜。隨着手工業者變成片面的勞動者，只能執行一種活動，於是它的勞動工具也變成片面的：例如在某些工廠中有着許多大小不同重量不同的錘子，每一個只適用於某一特種的動作。

機械工業消滅了工場作業：它從片面化的工人的手中把工具奪過來並合併到鋼鐵的架子上去，這就是所謂機器的骨架，而工具則成為它的肢體。機器，這是機械的綜合體。

但是資本主義的生產形成另外一種綜合。

在家庭生產中存在着某種程度的經濟的統一：家庭對自己生產的原料（麻、大麻、毛等等）進行加工。但是這種統一很快就消滅了，因為在公社的農村里有些勞動已經成為個人的專業，他們把車匠業、鐵匠業或紡織業一代一代傳下去，這時成為經濟單位的已不是一個一個的家庭，而是整個村落。隨着商業和生產的發展，這些個體化了的勞動變成專門技能，為那些加入行會的手工業者所掌握。

資本主義的生產也是在手工業的這種個體化的基礎上發端：它創建了織布的、紡紗的、梳毛的、造車的、細木工的等等作坊，而在這些作坊之內勞動分工和機器已完成其革命。然而這些作坊終於變成巨大的製造廠，在那里只進行某一種生產過程：在紡紗廠內只紡紗，在織布廠里只織布，在梳毛廠里只梳毛，等等。這些專門化了的製造廠集中在一個地點並成為其中之一的附屬部分。梳毛坊、染坊、布匹印花作坊集結在機械織布廠或紡紗廠的周圍。例如，在同一資本家的行政機關的監督之下原料通過全部的轉化過程。結合在一起的不僅是互相補充的過程，如梳毛、織布、紡紗和印花，而且還有全然不同的生產。工業的集中自然不必總在一個地點。有時由同一個資本家聯合起來的製造廠是設在不同的地區或國家，彼此相距很遠。

国家銀行，例如法兰西銀行和英吉利銀行正是这些复杂的工业机构的典型，它的分行遍布全国。每一个国家銀行都有鈔票用紙的造紙厂，印制鈔票的雕板和印刷所，用以鉴别真偽的照相放大設備，等等；它在各个商业的和工业的中心設立数以百計的分行，与城市的和乡村的銀行家以及外国的国家銀行建立联系。中央銀行成为全国金融体系的中心；而这个体系組織得这么巧妙，致使它的脉搏，即未到期而預支的折扣(escompte)之漲落甚至在农村的深处也有反响，并且影响到其它国家的貨幣流通。

倫敦城的《泰晤士报》(《Times》)也是另一种类型的惊人的工业組織：它拥有大批的通訊員，散布于全世界；它用电报与大陆上的所有主要的首都連結起来；它自己造紙，鑄字，供养着机师以备修理車間里的机器；它排版，鑄字，印刷自己的十六巨幅和分給訂戶；它所缺的只是非洲的阿耳发(一种針茅属植物，可用以編制用品和造紙。——譯者)田，以便采集造紙所需要的材料：但是不久总会解决的。

总有一天合众国和印度的棉业工厂家会把棉花种植場和縫紉厂并入自己的工厂：例如苏格兰的工业家在倫敦開設成衣店，以衣服的形式出賣毛絨布，毛絨布在他們那里通过了全部生产的阶段。

資本主义的生产力图按照家庭生产的样式逐渐恢复經濟的統一；以前同一家庭既生产原料，又对它进行加工；現在同一資本家的管理机构既担負原料的生产，又担負原料的全部工业加工，并且把它卖給顧主。

零售商也走着同一的道路。以前只出賣一种商品的小商店，如今让位給备貨品类繁多的百貨公司。在倫敦有些百貨公司出賣一切必需品，衣着、食品、医药和家具应有尽有。这是真正的商业的綜合。但是这些魯佛和邦馬舍(Louvre et Bon-Marché)<sup>①</sup>只

<sup>①</sup> 巴黎的百貨公司。



是农村小杂货店的扩大再现，在那些小杂货店里同糖、咖啡、蜡烛一起，买主还可找到服饰用品、刀、鞋以及其它有用物品；有时在这些小鲁佛还附设了旅店，捎带卖酒、烟和报纸《小报》（«Petit Journal»）。别看它们规模小，甚至比巴黎的大百货公司还要完备，因为它们可以满足自己顾客精神上的和物质上的需要。

资本主义生产以劳动分工消灭了工场手工业中的劳动单位——手工业者；然后它又在工厂里把这种劳动单位恢复起来，那里已不是人，而是铁的工人——机器是新的劳动单位。现在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图创造硕大无朋的生产机体，由最多样和最相反的工业部门组成。这些个别的部门，作为以上所讲的这个奇怪的生产机体的生理官能，可以彼此相距很远，可以被政治的疆界和地理的障碍分隔开。

这些国际的怪物吞没热力、光力、电力和其它的自然力，正像吞没人的体力和智力一样。

十九世纪的人类被装进这种经济形式里去。

## VI. 资本主义的金融

工业的财产开始是在工场手工业中，而后又在工厂中发展起来，与此同时动产的形式也变成金子和银子。这两种金属开始时，甚至已经经过铸造，带有完全私人的性质；所有主藏之于地窖而且只作装饰品使用。在印度以及在其它东方国家，一直到现在这还是它们的主要用途之一。它们在产品交换中开始时起很小的作用，因为交换是直接进行的。因此封建国王铸造伪币或者改变货币的成色和重量，对于自己臣民的交易往来不会有很大的危害。但是一经进入商业的时期，金子和银子便变成衡量一切商品的价值标志：这时它们获得了产生微小的合法的收入或利息的权利。

付息借款一直到那时都被認為是不榮譽的事物，只有同犹太人的上帝視作仇敌的外人打交道才可以允許。教皇和宗教會議都譴責高利貸者<sup>①</sup>。凡從事高利貸的人都受到輕視和仇恨。他們的四面八方都是危險；他們不仅要冒金錢之險，而且往往還冒生命之險。中世紀的犹太人，金銀的積蓄者，深知他們的寶庫將遇到什麼危險，因而不信國王的空話，只有用王冠的鑽石、寶石、外交文件以及同樣可靠的擔保品作抵押才肯借錢。資產階級恢復了借息的名譽并使放債成為文明人類的最有利的和最光榮的職業；收利營生乃是資產者的理想。

在整个中世紀犹太人既受人民輕蔑，又受貴族蹂躪，真是苦難重重：某一個缺錢的王公將犹太人洗劫和折磨之後并以宗教為借口驅逐他們；另一王公看到逃亡者帶着財寶，為着想搶劫他們才肯收容他們。

但是這些愛金的英雄不怕仇恨和不顧凌辱，他們在這些頻繁的攻擊之下忍氣吞聲只是為了更強地站立起來和繼續自己的生涯。十字軍運動迫使封建領主到處找錢去組織軍隊。這個運動使城市的解放和貴族權力的集中更容易了，但是也使犹太人和商人成為必要的了。它產生了亞洲的商業，商業創造了地中海沿岸城市的繁榮，且以征收稅課和鹽稅之必要而替各種金融活動奠下鞏固的基礎。美洲的發現，由美洲輸出黃金、高價值的木材、辛香等等和越洋的貿易，因此而使海上霸權由地中海城市轉到葡萄牙的、荷蘭的、英國的和法蘭西的城市，以上一切都擴大和鞏固了金融家的

---

<sup>①</sup> 宗教的分裂是十六世紀經濟運動的特征：在這時期羅馬教皇是舊的、崩潰中的經濟體系的代表，他喚起了對貨幣利息的震怒，反教皇的日內瓦人加爾文是新興的經濟體系的宗教代表，相反地借用一切神學上的美德之名來宣傳貨幣利息的合法性。新教以其對聖徒和他們的節日的否定，以其對救助和施舍之權的譴責，以其神賜的學說等等，乃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真正的宗教的表現。

权力。1522年大臣杜勃拉(Duprat)給国債奠定基础,其长期的利息每年由巴黎牲畜市場的稅收支付,这一事实說明国家收入的包稅者获得如何的重要性。

受到輕蔑的犹太人,在十世紀在盛大节日时的教堂門口被人打嘴巴,如今也成了重要的脚色,不得不同他們打交道。并且从此为始,这个职业不再是这么危險了,許多基督教徒也干这一行了。

苏利(Sully)<sup>98</sup>和柯尔貝(Colbert)<sup>99</sup>可能認為“由国家稅收管理和私人高利貸所掙来的巨量財富对于一切人,尤其对于那些准备用荣誉来換取金錢的貴族都是有害的”(Sully, *Oeconomies royales*)。他們可能向法院控告,要求包稅者和高利貸者退回搶劫之物。可是他們得小心对付“这些素不見經傳的人物,当他們担任金庫主任、收稅吏和国家包稅者,不断进行买卖国库券、紙币、証券时会吞沒了巨利……”(1716年关于設立高等法院的法令)。当1599年苏利允許廢除租賃契約时,对这种契約意大利的銀行家,鞋匠出身的薩梅特(Zamet),被人民称为“吸錢鬼”的芦采兰(Ruccellai)和斯乞皮翁·沙尔丁尼(Scipion Sardini)是非常感到兴趣的,于是他們的同盟者托斯康的大公派了自己的兄弟让·德·梅迪奇(Jean de Médicis)带着几艘大船航行于普罗文斯沿岸。路易十四在他的备忘录上可能高傲地宣称:“凡是我們国家領土上的一切,不管它是什么,都同样属于我們……收藏在首飾箱中的錢,在我們金庫主任手上的錢和我們留在人民之間流通的錢,都应当同样为我們效劳。”可是他也不得不同意包稅者的条件,当需要用錢的时候。1673年的公債虽經柯尔貝向外国銀行家再三苦求仍未募足,原因是他只付 $\frac{1}{18}$ (5.5%)的利率,而他們則要求 $\frac{1}{14}$ (7.14%)的利率。金融成了强有力的社会力量。

以前諸侯的宮廷都聚集在大封建主的周圍,如今国王又把大

封建主吸引到自己宮廷里面去，因而击破了貴族的反抗力量 and 使他們成为包稅者的牺牲品，包稅者加速了他們的破产。富格 (Fouquet) 几乎收买了一切宮廷領主，准备开始一个新的投石党运动 (十七世紀法国貴族及資產階級反对专制制度的运动。——譯者)，由于柯尔貝的坚决行动而被阻止。从十六世紀起領主开始与金融家攀关系，想“耻自己的徽章鍍点金水”。塞維尼夫人 (Mme de Sévigné) 虽以門第自傲，还是主張自己的堂兄弟同一个小姐結婚，这小姐“虽然有点犹太人的血統，但有百万豪富，仍不失出身高貴” (1675年10月3日的信)。勞<sup>100</sup> 和他的“密西西比人”拿投机事业把貴族引得发瘋，使他們信用扫地和彻底破产。一切等級都混合起来，平等在金融的蔭盖之下滋长繁荣。一个暴发戶的平民雇佣了四个名門閨女充当女工，四个貴族出身的男僕充当馬夫。这就是資本主义社会的資產階級唯一著名的服务中的平等。

十八世紀的銀行家和他們的投机事业給社会帶來的混乱，使百科全书派<sup>101</sup> (其中有些人——如荷尔巴哈和爱尔維修——都是銀行家) 有可能攻击貴族特权，这特权已喪失其存在的意义。紧跟着經濟革命之后是哲学的批判，繼之又是政治革命，这就把包稅者从法庭的恐惧中解放出来<sup>①</sup>。

① 1716年最后一屆高等法院的法官受賄，致使沙密尔·貝尔納德 (Samuel Bernard) 只用了六百万就得开釋，还有克罗薩 (Crozat) 兄弟和其他少数人也获免罪。可是加于保尔·包阿松 (Paul Poisson) 的懲罰却很可怕。如波发賴 (Bauvalais) 所說，这个包阿松是下布里塔尼島的农民的儿子。开始时他充当僕役，后来成为軍队的給养者，因而暴富起来，在外国銀行存款达三千四百万。他的财产被沒收，他的在樊多姆廣場上的私邸被夺走，而他本人則被关进監獄。当第二帝政政府因犹心劫夺金融家会引起人民的憤怒而願意表示慎重时，以奧斯卡·德·瓦萊 (Oscar de Vallé) 为首的司法当局甚至不敢提出起訴书；他简单地抄襲旧法兰西最高法院决定的老文章和在交易所的門口安上旋轉柵栏就算万事大吉。巴拿馬是本世紀的最大的騙案，也不过耻查尔士·德·萊塞蒲士 (Charles de Lesseps) 坐了几个月的牢，被他們收买的資產階級報紙还为此洒了同情之泪。高悬帝荣誉团勳章的爱菲尔 (Eiffel) 也在自己的鉄塔里接待法国的和俄国的客人和海軍大将阿維朗 (Avellan)，他們全都乐于同一个一次撈了三千万的人籍交朋友。

革命把农业、工业和商业从阻碍它们发展的封建的和行会的束缚之下解放出来，同时也使金融家从他们在以前国王时代所遇到的不安定状态中解放出来，并且为他们开辟了新的活动地盘。

杜勃拉总裁在 1552 年发行一种利息八厘的无期的国债，这就为已在小小的工商业共和国——威尼斯和热诺亚存在了的那种公债奠下基础。但是法国国王还是以封建观点来对待借息，在感到拮据时便把他们原先同意的利息减去四分之一或一半，有时干脆就停付。

其余的欧洲君主也以同样不客气的态度对待国家的债权人。这种支付利息的贵族方式阻碍着现代金融的全面发展，因为现代金融是把自己全部的投机体系建立在公债的稳固性的基础之上。

1789 年资产阶级的最先的和最革命的行动之一就是宣布公债是神圣的并把它置于一切政治革命和未来的变革之上。

公债本身引起赋税自动增加的萌芽……“募债使政府在开销额外支出时可以不使纳税者立即感到后者的负担，但是募债这件事终究要求增税。另一方面，由接二连三的募债所引起的增税又使政府遇到新的额外开支时不得不继续举募新债去弥补。”<sup>①</sup> 马克思又说：“公债成了原始积累最强有力的杠杆之一。它像挥动魔杖一样，赋予不生产的货币以生产的力量，从而使它转化为资本，并且可以使它免去工业投资以及私人高利贷活动中所不能避免的全部风险和困难。国家的债权人实际上并不曾拿出什么，因为他们贷出的金额变成了容易流通的公债证券，在他们手中与现货同样起作用。”<sup>②</sup>

把公债放到望尘莫及的高度，革命就给金融家进行投资以前人所梦想不到的保证。国家土地的拍卖又给他们锦上添花。正当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人民出版社版，第 955 页。

② 同上书，第 953 页。

那些沈醉于革命热情的人民紛紛上前綫保护边疆的时候，资产阶级的革命家如巴拉斯（Barras）、福煦（Fouché）、烏弗拉尔（Ouvrard）、娥迪埃（Odier）、貝萊加（Perregaux）<sup>102</sup> 之流却默不作声地累資巨万。并且連保皇党人也沒有失去发财的机会。复辟时期的大臣，路易男爵和国民議會的最积极的成員一样參加 1793 年的土地大拍卖。共和和帝政时期的战争，战争所需要的供应和举債使这伙人的財富增加十倍。

罗特雪尔德（Rothschild）王朝正是在 1815 年的举債和灾难的情况下产生。

革命和帝政一方面給金融家开辟了新的寬广的活动地盘，同时又从他們夺去了以前的收入来源。稅和烟叶的包办，同印度和东方沿海城市的商业壟断等等都被取消。他們于是不得不投資国家工业和加以安排，以便占据交通要道，从商业流通中征收貢品。在 1821 到 1822 年为开凿运河——罗昂（Rhône）、布貢（Bourgogne）、第四运河等而集資一亿二千八百万的一家公司建立起来了。国家，这是金融家的奶牛，給投下的資本保証百分之五点五到百分之六的利息，而当一旦发觉开运河是一件賠錢生意，于是在 1853 年就由国家以奇高的价格收买了去。被金融家控制着的铁路和越洋的大航綫应当給他們一种可能，如像給中世紀男爵的一样，向通过道路运送的商品收稅。而当他們一經控制着交通要道，为了增加在这些要道上运送的商品的数量，他們于是便不得不鼓励机器生产和国际贸易的发展。

但是，为了敷設巨大的铁路交通网，加速大机器工业的成长和使它加速度发展，私人积累的資本已感不足，尤其是在法国。这就不得不求助于积累資本的联合。为金融家开辟了一个新紀元。圣西門（Saint-Simon）和比尔·安方登（Père Enfantin）的信徒——現代金融的偉大的代表者創設了“流动信貸銀行”（Crédit Mo-

bilier)，這是一座“發熱的洪爐”，並以之與羅特雪爾德相抗衡，羅特雪爾德幽居在法蘭西銀行——“冰冷的地窖”之內，是舊的金融的化身，只以自己所有的資本從事活動。

國家實行以小額募債的新制度，邦拉巴黨人的大臣比諾（Bineau）稱為“利息民主化”，這種新制度促進“流動信貸”的發展；“流動信貸”是那些在二月國家政變之後完成金融變革和空前明顯地證明“金融就是他人的錢”的許多公司之一。“流動信貸”、“土地信貸”和第二帝政初期產生的類似的公司的創設人都是一些像貝萊爾（Péreire）、富爾德（Fould）、摩尼（Morny）公爵、加利拉（Galliera）公爵、莫希（Mouchy）公爵等聖西門派的金融家，他們從這個學派認識了資本聯合的力量，還有就是那些把掌權只視為掙錢方法的政治騙子。

於是就出現了這樣的奇觀：號稱太陽的國王的路易十四當權時，為了借到債款，曾不得不向猶太人薩姆爾·貝納德（Samuel Bernard）獻媚，許多無名的、出身低、門第淺、沒有財產、沒有保證和沒有職位的一些人負了國家的債務，又發行資產階級所貪婪地認購的公債。幾年功夫他們竟能將農民在許多世代積蓄起來和埋藏在地窖中的全部金銀都發掘出來重見世面。同這種奇蹟相比，拉薩爾（Lazare）的復活就算不得什麼。單是“流動信貸”一家在1852年到1867年這十五年之間進進出出的錢數約達四十億；在十年間它的經理從過手的總額中只為開支管理費就扣下八百二十四萬八千四百四十五法郎，還不算他們留作發明獎金用的已作廢了的股票的利息和分紅，也不算股票在交易所轉賣的收益<sup>①</sup>。現代金融界的天才艾米爾·伯利（Émile Péreire）醉心於“流動信貸”的神話般

<sup>①</sup> 銀行家艾卡爾（Aycard）說：“所有的經理都是熟知這項事業的祕密的人，在1853年每月都進行投機倒把，便可用‘流動信貸’的一千股股票贏利一百六十二萬二千法郎。”（1852到1867年流動信貸的歷史。）

的成就，想要創設一切金融家所夢想的“阿呂姆”(Omnium)(1859年的報告)。所謂阿呂姆就是一切土地的、工業的和商業的財產的總動員，由它發行股票，然後又將由這種方法而創設的一切公司的股票換成“流動信貸”的股票。但是這個龐大的計劃還來不及實現“流動信貸”便倒閉了。不過伯利夢想的第一部分現在的確是正在實現之中，因為商業和工業企業越來越多地轉變為股份公司，而在美國、澳洲和印度，農業企業也建立在股票上面。

金融力圖吞下一切，占有一切；只要資本主義的生產還存在，只要公債的這部書——資產階級的聖經還沒有燒掉，什麼也不能阻止它們的這種趨勢的發展。

由公債中成長起來的金融乃是資本主義生產存在的必要條件之一。在一切有着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文明的社會里，工業和農業企業採取這樣的規模，為了它們的建立必要有相當數量的資本的預先積蓄，而這積蓄的完成只是靠經常掠奪人民大眾<sup>①</sup>。

在許多場合，由個人積累起來的資本是不濟事的，因此不得不求助於借股份公司之力而把它們聯合起來。另一方面，為了購買原料和勞動力，對於一切企業都是必要的流動資本的重要性，生產

---

① 要認識金融的這種剝奪者的作用，並不需要等待那促使如此之多的小人物破產的巴拿馬。經濟學家萊巴德(L. Reybaud)還在1874年就寫道：“在儲蓄銀行里僅存留著人民儲蓄的一小部分，其餘的都用於投機了……在里昂、在聖太田、在日伊爾山谷中最成熟的、工資最高的工人乃是犧牲者。在金融破產時，工人破產數目之多遠遠超乎想像之外……許多人傷心地把那些貶了值的或者完全作廢了的證券給我看，為了這些他們的一份小小的財產都耗費光了。當然，他們所挑選的也是最不可靠的企業……這就是那擁有如此之多的辯護者和宣傳者的信託的濫用所導致的後果。冒險行為消滅了人民的儲蓄和動搖了那建立在它們的穩固性上面的社會保險。又有誰知道？這些可鄙的投機事業的犧牲者會不會因此而产生報復的念頭！”(Le Fer et la Houille, étude sur le régime des manufactures.)

為經濟學家和政治家所贊揚的和為政府所鼓勵的儲蓄導致一個結果，就是使生產者削減甚至必要的東西，而使金融家有可能弄到多餘的東西。



的速度和巨大的規模，產品的緩慢的銷售，市場的寬廣和遙遠，成本收回的困難，凡此都迫使工業家為了維持和發展事業不得不經常求告於信貸，就是求告於社會資本的預支。因此社會財富，即消費以外的生產的剩餘應當積聚和集中起來，以便隨時為生產和交換的需要服務。現代金融就執行着這種吸進又壓出的唧筒的社會職能。

資本主義的體系是如此不可預測、不合邏輯和無政府狀態可以特別明顯地從以下事實看出：這兩個生死攸關的重要職務——國民儲蓄的集中和分配——被委託給不知名的、不受監督的和負責任的人物，把整個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利益完全交付給各種各樣卑微的人物，照培利(Berryer)的說法，這些人是“什麼都能，什麼都不能”。“他們用不合法的手段占有鄉村的收入，國民的儲蓄和國家的財產”，把這些資財的一部分用在那些“對人民的貧困是帶侮辱性的”聞所未聞的過度消耗上面<sup>①</sup>，其餘的部分不加選擇地用在創立和維持本地的和外國的工業企業上面，常常是最無意義的耗費。

靠着清算商業票據和用提貨單和貨棧存貨單等等形式的工業預支，他們從商業的交易和從工業的生產中抽稅並且把統治階級的其它范疇變成一具為他們的利益而汲取工人階級的膏血的器械。

由金融家壟斷的巨大財富給他們以控制新聞和政府的無限制的權力。在路易·菲利普和帝政時代都有自己的著名的機關報。登載金融的廣告對於當時的政治報紙認為是不光榮的。但是資本主義的道德戰勝了這種觀念，現在可以不因創設和維持自己的報紙而拿自己的資本去冒險，他們收買了一切的報紙，不管它們的政

---

① 1716年關於設立最高法院的命令。

治傾向和宗教傾向如何，靠報紙去影響群眾；他們按照公布的新聞一條一條付價，就是用計件工資代替計日工資<sup>①</sup>。

金融家和他們的傀儡充斥議會；但是在他們中間也有像羅特雪爾德這樣的人，他們認為擔任議員的職務有辱自己的身份；他們寧願让自己的奴僕去當大臣。在下議院和上議院中，金融家、議員和元老一旦碰到彼此提供租稅或其它收入和一般盜竊國庫的時候，他們便馬上勾結起來。

除了對國家的這種直接影響之外，金融家也對政策起間接的影響，其為害也并不小：他們操縱着交易所的市價，這在當下是政治的晴雨表；他們用收買來的報紙影響社會輿論和用這種粗暴的和犯罪的方法來實現社會儲蓄的集中，它使一切階級的生存條件發生變革和引起革命。在“改良主義萬歲！”的口號之下發生的二月革命<sup>103</sup> 是小資產階級的事業，是為了反抗那些充當大銀行家的臣僕的議員而掀起來的。

金融界歡迎帝政，正像猶太人歡迎迦南聖地一樣。以艾米爾·基拉丁(Émile de Girardin)為首的交易所投機者，艾米爾·奧利維爾(Émile Ollivier)就因他的提拔而得以入閣，他們在對普宣戰中只看到操縱交易所的有利機會到了。可耻的和約雖然使普伊爾-凱梯(Pouyer-Quertier)和工業家擺脫了牟羅茲(Mulhouse)的競爭者，也使昂散(Anzin)的股東(梯亥爾就是其中最大的股東之一)

---

<sup>①</sup> 在帝政時代曾出現這樣一件事：le Phare de la Loire，為數不多的共和派的報紙之一，在第二版上登了一個金融廣告，於是引起軒然大波。羅特雪爾德第一個實行用自己企業的股票來收買新聞記者的新辦法，這是使他們感到興趣的有禮貌的方法。現在的作法就不必這樣客氣了：把準備發布的編好的新聞連同費用——銀行券一併送去就行了。

巴拿馬，它從道德的和藝術的觀點來看乃是一件傑作，給我們提供了金融界的欺詐、勒索、唯利是圖和虛偽的集大成；所有法國的報紙都領公司的津貼，他們把我們時代的這個最大的欺詐的組織者萊賽普士(Lesseps)吹成是法國的偉人。

摆脱了阿尔萨斯煤业的竞争者，但是它反过来又使欧洲的金融家有可能涌进法国和把法国的灾难变成自己的龌龊收入的无尽的泉源。什么时候也没有过一个国家要人像梯亥尔这个碍眼的癞蛤蟆更配称“祖国之父”；因为任何时候的国家要人都没有像这样喝过无产阶级的血和没有制造国民财富如此大规模的破产；任何时候都还没有一个政治家这么明显地证明过统治阶级眼中的祖国只是自己阶级的利益。但是这些准备了革命并从革命中抢夺直接利益的金融家在斗争时是最可鄙的懦夫，在镇压的时日又是最残暴的刽子手。在1871年的5月也像1848年的6月一样，他们坚持要求对巴黎的无产阶级进行血的惩罚，一心念念不忘于信贷的重建。

金融的强力并不依赖于政权的形式；它们不受监督地统治着德意志的专制帝国，同样也统治着实行民主共和制的北美合众国。复辟派、奥尔良派、邦拉巴派、共和派相继交递，金融的统治不仅没有削弱，而且与日俱增地成长起来。任何一个政治革命都不能推翻这个万恶的统治，因为它是建立在对工人阶级——脑力和体力劳动者的资本主义剥削和公债上面。就人数、就智慧、就勇敢精神来说，金融家是资产阶级中的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但是只有当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剥夺了资本家的工厂，没收了国家银行和其它的信贷机构和结束了公债之后才会消灭。

金融界同它的抢劫各国的国际强盗，同生活在富裕阶级中的寄生者；同毒化法衣圣器室、沙龙(salon)、法庭、编辑部、政界的伤风败俗者；同那些逍遥自在和心安理得地以大宗掠夺为乐事的无耻强盗；同那些刚刚脱出困境而又变得骄奢淫佚胜过封建国王和公爵的大贵族；同那些滥用社会财富投资于设计不佳和管理不善的企业的冒险家……金融界同它的阴沉的色彩，这就是资本主义文明的奇怪的繁华。

## VII. 資本主义的集产制

資本主义的工厂生产,农业經濟,商业和金融之所以能形成和发展只是由于消灭了私有财产的基本特征,就是把它从个人性质的财产变成非个人性质的财产,建立起資本主义的集产制,这种集产制和原始共产主义是对立的,它不是由共产主义中产生出来,而是为共产主义作准备。

从前面所述可知,在原始共产主义时代作为私有财产而出現的只能是完全地个人性质的东西:为要占有物品,必須亲自动手制造它和因为經常使用而合并到他身上去了,当时财产这詞的确切意义就是指劳动的成果。

作为私有财产的第一批物品是:武器、裝飾品、衣服、家庭日常用品;一旦占有者自己造起房屋,这房屋就属于他,而且連屋基和房屋周圍的土地也都属于他。战争增加了这些物品的数目;这些东西虽然不是占有者所創造,但是經過冒生命危險才获得的;这是羅馬家庭的成員的战利品(*peculium castrense*)。私有财产带着如此鮮明的个人性质,以致占有者死后随同尸体一起焚化。

私有财产的这种个人的性质使它有可能侵入共产部落之内并在财产发展的所有时期都支持着它,以致深入人心,竟至于靠社会的幻想,直到現在还把私有财产看作是占有者的劳动成果,而資本的辯护者认为——或許是出于天真——它的性质是个人的<sup>①</sup>。

<sup>①</sup> 羅馬教皇看到在我們这个实証的世紀再去向人民宣傳天主教的神秘只是白费功夫,于是就担起了为資本主义财产辯护的任务。他作这个也不过像最庸俗的經濟家之所为。他說:“私有财产是与自然完全相适应的,当人們运用自己的精神力量和肉体力量去获取自然財富时将发生什么呢?这就是說,他把自己连接于他所加工的这一部分有形自然,他就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的烙印,因此这些东西归属于他是完全正义的……这样的論断的力量是很显然的,可是还有一些坚持旧观点的人却反对它,这是奇怪的。既然他們承認个人有权使用土地和土地的出产,可是又拒絕他有权成为他构筑房屋于其上的那块土地和他所开垦的地段的所有主。难道他們沒有看見,这样一来就把人們自己劳动的果实剥夺去了?”(教皇通告《De conditione opificum》)利奧(Léon)十三世沒有看到,当批評这种他所不理解的共产主义理論时,实际上他恰恰譴責了他所要擁护的資本主义的财产制。

可是資本主义的財產完全喪失了个人的性質：占有者不仅不亲自創造它，而且也不使用它；不管从哪一方面来看，他对它都是不相干的。資本主义的財產是非个人性質的。

金融撕破了那掩盖这非个人性質的最后的帷幕。

資本主义企业的股東或証券的持有者完全脫離了自己的財產；他什么时候也不同它見面；他不需要看見，知道这財產究竟在地球上的哪个地点，甚至連想一想也不需要；他所看見的，接触的、知道的和想像的只是印了各种顏色的紙片。

只有在破坏私有財產的个人性質的基础上才能完成財產的集体形式的重建。在血族的集产制之下，由血統的紐帶联結起来的同一村落的居民共同占有全部土地，只有按年分配的可耕地的临时使用和它的收获才属于他个人的；森林、牧場和水澤是不能分的，归他們共同所有。在資本主义的集产制之下，股票和証券的持有者沒有亲族以至民族的联系，彼此互不相識，共同占有企业（铁路、紡織业、炼鉄炉、矿业等等）。尽管企业主分散在各地，由于情况的原因，企业却是不能分的；他們沒有直接使用而且也不能使用自己的財產，但是他們每个人可以不投入任何微小的劳动而分別向企业收取利潤<sup>①</sup>。

血族集产制时代的业主是真正的业主，他自己使用自己的財產，他取得的收入同“他的精神和肉体”的支出是相适应的。在資本主义的集产制之下业主純粹是名义的；业主变成真正的寄生者，因为他可以毫不費力气地从財產上取得他所使用的收入；当他把

<sup>①</sup> 柯林斯(Collins)用于特別意义的“集产制”这个词被德巴卜(Depaepe)、基督教社会主义者雪弗尔(Schoefle)和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变成了通用詞。它被輸入了法国，但这个詞的意义却还未弄清楚。这便給我們的敌人以口实，攻击法国的社会主义者想要回到俄国“密尔”的集产制，就是回到已經过时的財產形式。但是从第二次平等(Égalité, 1880年)时起，当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已普遍流行，“集产制”这詞才意味着共产主义并且認為沒有取消使用它的必要。

自己的股票和証券送进交易所，在那里往往一天之内就要轉換几次主人，这就等于自己声明自己的寄生性<sup>①</sup>。尽管大大小小的罗特雪尔德想用交易所的投机和其它买空卖空的神机妙算来騙取他們的股票和証券并将資本主义企业的利息集中在金融家的保險箱內，事实証明都是徒劳无益的。

从前，男爵住在自己的城堡里，在家臣中間，平时負裁判之責，一有风吹草动就披坚执銳，身先士卒，保卫国土，这时的貴族是非常有用的階級，消灭它是不行的。但是，只要国内相对的和平一旦建立，領主就变成无用之物，于是就丢了自己的土地而移居于国王、主教和公爵們的宮廷的附近；在那里他們終于形成为徒然給国家負担的寄生虫：从这时起就宣判了貴族的死刑。虽然在欧洲所有文明国家里貴族都沒有像在法国那样被粗暴地消灭掉，但是他們也到处都丧失了自己的封建特权而与資产階級混为一体，他們在資产階級中間除了令人可笑的貴族的装腔作势之外什么分別也沒有。

貴族作为統治階級已被消灭了。同样的命运也在等待着資本家。一旦資本家对生产成为无用之物的时候，死刑的宣判就落在所有資本家階級的身上：准备这个宣判的相同的經濟現象將关心着它的判詞的执行。对于經歷着自己階級崩潰的資本家甚至沒有留下那留給領主的可笑的特权作为慰籍。

---

<sup>①</sup> 在資本主义生产开始时，当业主担任籌組織者和管理者的时候，亚当·斯密还可以有理由承認資本有权分享劳动成果，就是征收利息、地租和工业利潤，因他确信資本家以節約的美德和組織的才能尽了服务之責。但是各种各样的萊罗阿-波利埃(Leroy-Beaulieu)，罗雪(Roscher)及其門徒，把他的观念引到荒謬的地步，必須找到某种比較不惹人发笑的东西，因为現在财产的流动性已达到这么高的程度，可以在交易所里一手轉一手，并不留下自己來源的痕迹，也不因主人的經常变动而引起經濟性質的任何改变。

## VIII. 共产主义的复归

人类的进步不是按直线走的，像圣西门所设想那样；像天体围绕着重力中心，像树叶围绕着重干，它的运动描出一个渐次扩大的螺旋形。它必然会复归到相应之点，这时又重新出现那老的、似乎已彻底消灭了的形式；但是这些形式已被在相当长的时间间隔中发生的社会和经济现象对它的相继影响强烈地改变了的。

复活了集产制的资本主义文明必然会把人类引向共产主义。

从史前期的简单的和粗糙的共产主义发展起来的人类社会将回到复杂的、科学的共产主义；而当资本主义的文明消灭了财产的私人性质之后，这就准备了共产主义的因素。

从前归个别手工业者所有的生产工具被夺取过来，集中起来，使之成为大工厂和大农场的公有物。劳动失去了个人的性质。手工业者独立地在自己家中劳动，无产阶级在工厂里共同劳动；得到的产品是共同的而不是个人劳动的成果。

手工业者个人占有工具和自己劳动的成果，因为他独立地进行劳动；无产阶级既不能个人占有工具，也不能个人占有产品，因为他不能一个人使用机器和创造商品；他应当共同地，像在一个工人“共同体”里那样地进行劳动。

机器和机器产品的占有只能是共同的，因为生产工具和产品既不能由个人创造，也不能由个人使用，因而也就不具备私有财产的合法条件。资本主义社会依私有财产法占有它们只是暂时的。这种毫无道理的僭夺必然要停止。资本主义的文明自身就担负起这个消灭的任务，既然它经常集中社会的财富，因而使僭夺者的数目越来越减少，同时又创造、集合、准备和组织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应当完成对僭夺阶级的最后收夺。

工人阶级随着生产工具的集中而集中起来。在大工业中工作

的无产階級失去了自己以前的工具和技能，只占有个人使用之物如食品、衣服、家具等。他們的头脑已摆脱了由許多世紀以来从事手工业劳动而产生的财产的本能，不知不觉地准备去接受社会主义宣傳家所帶給他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这思想不是社会主义者凭空想出来的，而不过是从周圍世界的現象中抽象地概括出来的。

无产階級几万几十万地集中在一个地点这件事便利于他們組織起来进行經濟的和政治的斗争。

体力和脑力劳动的无产階級，掌握了国家政权的这个階級將結束資本主义的僭夺并将那集中起来的生产手段所已采用的共产主义的形式推广于全社会，这个階級是由資本主义本身所創造、所結合、所組織起来的。共产主义取得社会的承認將不是太困难的事——資本主义的文明已經担負了这件事的大部分。

在1848年前为社会主义者所关心的劳动組織問題，他們曾试图从头脑里凭空想出来。但是它却被工厂生产，大商业和大金融业按照生产和交換的需要緩慢地和巧妙地实现于銀行里、大百貨公司里、資本主义的企业里以及在同一資本管理之下原料通过工业加工全部阶段的各种互相补充的生产里。現在，当生产中的一切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职能不是由业主而是由工資劳动者来充当的时候，用全民的管理来代替資本主义的管理可以毫不費力地和无需破坏生产程序就能实现。全部变革集中于一点，就是把那被游手好閑者侵吞了的利息拿过来轉而用于增进生产者的福利就行了<sup>①</sup>。

---

① 社会主义的敌人竞相暴露自己的无知和恶意，他們宣傳共产主义者主張收夺农民私有者的土地，并且也收夺小人物的自由和积蓄。他們自己却没有看到共产主义者指責他們有意去犯資本家每天所犯的那些罪惡，如独占土地，詐騙积蓄和迫使无产階級受工业的苦役折磨，在那里他們吃饭、睡觉和满足最必要之需的时间都被剥夺了，在那里禁止唱歌、說話和把人变成一架自动机，一举手一投足只是为了使机器运转。



不仅劳动的組織規定好了，而且生产的管理也井井有条。事实上，虽然資本主义的生产是无政府的，就是每个工业家都只为生产而生产，甚至不顧市場的商品滞銷状况，可是在上世紀（十八世紀）末就已創立了統計科学，它便是用來說明市場需要和現存商品量。統計学本来应当使管理生产和按照社会需要調节生产，如主妇按照吃飯人数去备办粮食一样，有可能实现，可是現在統計学却只被投机者利用来剝削生产者和消費者<sup>①</sup>。

共产主义只有在人类的进化中达到可以滿足人类的一切正常的肉体和精神需要之时才能出現，因为原来是平等的人类之所以分裂成为剝削者和被剝削者恰恰就由于原始共产主义的簡陋的工业和农业不能滿足那随着人数的增加和他們的社会的进步而日益增长起来的需要。但是机械和化学采用于工业，大大加强了人类劳动的生产性，在現时代沒有一种正常的需要不能滿足，甚至綽綽有余。

共产主义必須以階級的消灭和所有社会成員无分男女一律平等为前提，当劳动分工还存在的时候，它就不能实现；这分工使男性与女性隔开，剝夺了妇女的社会职务，把她們禁錮在家庭瑣事之中并使她們屈服于夫权之下，这分工曾經把人們分成階級，一部分担任防卫和社会的指揮任务，另一部分則命定成为奴隶、佃农、农

---

<sup>①</sup> 信仰世界主义的小麦投机商虽然沒有想到調整小麦生产，可是非常熟悉全世界麦收的年成，并且准确知道这收成对居民的通常需要是多了还是少了。

現时的造紙家想按照需要来調节生产。在1894年10月，法国、德国、英国、挪威、奥匈、比利时和荷兰的造紙家在安特卫普的市政管理局集会；他們講出了一种想法，为了消灭妨碍他們的利潤的生产过剩，必須按照需要的多少来限制生产，必要时甚至可以降得更低些。在布鲁塞尔設一委员会，每个国家派三个代表参加；委托他們研究达到这个結果的道路和方法。但是既然在每一个资产階級的議會中总得玩弄假仁假义的把戏，因此这次对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中的个别部門的生产实行国际調整的試图被吹噓成为改善工人状况的手段，允許让工人每星期有一个假日——星期日。

奴和无产階級，分散在成千種的生產專業部門中間。

機器消滅了勞動的分工和使男女在勞動中平等起來。

機器侵入生產活動的一切部門並將它們轉化為機械的工業。總有這麼一天會來到，那時候將只有一種普遍的職業——當機械師的職業。男人和女人從兒童時代起就學會使用機器，便能無分別地由縫紉到紡織，到耕種，一句話，從事機械化了的勞動的全部工種，這對他們的精神和肉體的健康將是非常有益的，可以不再像中世紀的手工業工人那樣終生都固定在一種專業之內。

機器從家務勞作中把婦女奪取過去，從家庭的爐灶周圍把她們抓了出來，機器從童年時期便把她們奪去，把她們禁錮在資本主義的桎梏之中，折磨她們，強迫她們參加工業生產，恢復她們在原始共產主義時期所充任的社會職務；使她們重新擔負充作前驅的偉大任務，而其遺迹已由古代世界的神話和宗教傳說給我們保存下來。

機器迫使生產者成為自動機，使他們屈處於過度勞動、經濟貧困和生理苦難的折磨人的重荷之下，機器命定了要把原始人所享有的那種自由時間歸還給他們，用共產主義部落的野蠻人和半開化人所過的那種自由人的生活來代替文明時代的無產階級的畜牲生活。

婦女也罷，男人也罷，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都被剝奪了權利，精神上 and 肉體上都受了摧殘，被釘在那愈來愈壞、愈來愈單調的勞動上，被緊拴在一種手藝、一種職業里面，像中國女子的腳穿上盜鞋一般，被階級的偏見蒙蔽着，被財產的和性的道德的戒律束縛着；他們只有在那由資本主義制度中孕育起來的共產主義社會里才能均衡地發展自己的肌肉和腦力，才能抑制自己的情欲和成為像野蠻人那樣自由的和完整的人。但是他們將是遠為複雜的人。在過度勞動和文明的貧困的屈辱的平等的位置上出現了自然性質

的不平等，它找到了一切的发展手段：关于这个不平等資本主义的文明是毫不关心的，然而它却是人种改善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人种只有由于个人的千差万别，由于变种的創造和巩固才能进步。

預定了共产主义的經濟形式的資本主义文明也将共产主义的制度和习惯引进政治和社会的領域。

野蛮人在选举酋长和軍事首領时所使用的不分男女的普选早已消灭，現在又被資产階級重新恢复了起来，当然只限于男性，資产階級宣布普选是国家权力的唯一泉源。这种普选，虽然是假想的，必須以原始共产主义时代确实存在过的那种公民的平等和自由为前提。

在共产主义的部落内住宅是共同的，飲食是共同的，儿童也是共同地扶养。公共学校里的儿童也是共同地用公社的錢来教育；哪里有社会主义的市政机关，那里的儿童就共同地靠公社来养育。而那些共同地住在六、七层楼房里的文明人則共同地在旅館里被毒害和被盜窃。

假如直到現在的普选制都不过是一种騙局，假如房屋盖得这么狭小，以致住在里面的人变萎縮和易得病，假如共产主义的設施徒具形式，而实得其反，就是說恰恰与那些不得不使用它的人們的意志相反，那末这只不过是因为所有这些設施之所以实行于資产階級的社会只是为了資本家的利益。然而不管它們是如何的不完善和不洽意，无論如何它們总在消除和消灭文明民族的个人主义的感情并且使他們适应于共产主义的风俗习惯。

資本沒有祖国；哪里有利可图，它就投向那里；它不分人种和民族的差別地剝削一切生产者；在工业、商业和金融企业中它把他們集結起来，混合起来和联合起来。凡它扎了根之处，那里就建立起一种同样的文化，同样的风俗和同样的习惯。它以同样的自私的利息，同样的暴利的貪欲去刺激自己的占有者，又以同样的貧困

和过度的劳动去惩罚工人；它在工人的心中放进了同样的反抗的渴望，这种反抗的渴望越过海洋和国境把他们联合成为统一的国际的阶级——无产阶级。这个阶级到处都组织起来和行动起来，准备占领太阳底下的位置和夺取国家政权。

那必然地、命定地要由文明民族的这种革命的压力中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只能是国际的并且它还会扩大到包括人类家庭的一切成员。它虽然同原始共产主义有点相像，但是也有区别；在以前的集产制的狭小的圈子里只容纳一个氏族、一个部落的成员；其余同他们没有血缘关系的人都被视为异类、仇敌。

国际的共产主义，像母腹之内的婴儿，在现代社会里成长和运动。经济和政治的事变，其到来的时机是不可逆料的，将打破那隐藏它和束缚它的资本主义外壳，于是它就降生下地并作为一种必然的社会形式确立起来。

共产主义是人类脱出动物状态时的摇篮；在这摇篮里，也只有在这摇篮里人类才能成长和走过最初的和最困难的几步。在各民族的记忆中，这个时代是“黄金世纪”，“地上的乐园”：这记忆有时变得模糊了，但是什么时候也不会消灭；在历史上困难的时期，它便重新复活；怀有高贵的乌托邦理想的思想家梦想着它，实行家为了加速它的再现，不惜牺牲性命。但是无论是乌托邦的魔术也好，无论是勇于牺牲的英雄主义也好都不能使共产主义再现；在人类的智力失败的地方，经济现象的粗暴的力量终于获得成功。

人类当时之所以把那玩弄他的自然力加以降服和驯化似乎只是为了让自己投入人为的和经济的力量严酷的奴役之下，而这种力量正是由他们自己产生出来的；转化为经济力的自然力把经济奴役的枷锁加在人们的身上，作为对自己的有增无已的工业奴役的一种报复。

自由地放纵的经济力量玩弄人类有如狂风之于弱草，甚至比

风更可怕，它給人类社会带来风暴。在整个私有制时代的許多世紀中間它們曾蹂躪人类，摧殘人类，而人类却不能制服它們。可是这些最无情的、放肆的、盲目的經濟力却促进共产主义的再現，无須取得人們的同意，甚至違反他們的意志。共产主义再也不只是存在于那些渴望和平和幸福的思想家的头脑中和各民族的幻想中，它出現于經濟的现实中；它用自己的工业和自己的农业把我們包围起来，它用自己的风俗和自己的制度把我們紧紧抱住；它陶冶人类的不純良的头脑和激励无产阶级的困厄的群众。共产主义以隱蔽的形式存在于經濟生活的深处，只等在劫难逃的革命的时刻一到，便要出現于社会舞台。

在无数世紀的漫长岁月中如此渴望地和徒然地期待着时刻已經迫近了。再等一下，人类就要回到共产主义；他們将找到自己的失去的幸福和洗掉私有制时代的低下的利益和情欲、自私的和反社会的道德。这时人們将战胜尚未受管束的經濟力量，人类的优美的和高贵的品质将达到尽善尽美的境地。

那些注定会看到万象更新的人們将是幸福的，三倍的幸福！

## 注 釋

- 1 分立主义——国家的个别地区力图脱离中心取得尽可能大的独立性。——第1頁
- 2 慈善家——资产阶级的社会活动家，试图用假仁假义的、侮辱性的援助“穷人”的办法来掩盖资本主义社会的寄生生活和引誘工人脱离阶级斗争。——第2頁
- 3 亚里士多德(紀元前 384—322)——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在哲学上动摇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間；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第2頁
- 4 謝尔梅尔-拉庫尔，保尔·阿尔曼(1827—1896)——著名的法国的政治活动家和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新聞記者，唯心主义哲学家；在他的哲学著作中宣傳不相信人类的力量，不相信将来有可能改善，宣揚极端的个人主义。——第4頁
- 5 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1770—1831)——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大的代表，客观唯心主义者，最全面地发展了唯心主义的辯証法。——第6頁
- 6 二律背反——两个互相排斥的原则之間的矛盾，其中每一个都被承认为真理。——第6頁
- 7 反題——是同出发的判断即正題相反的邏輯判断；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辯証法中，指三个阶段即所謂三段式(正題、反題、合題)的第二段。——第6頁
- 8 西塞罗，馬克·杜利(紀元前 106—43)——卓越的羅馬演說家和政治活动家。——第9頁
- 9 霍布士，湯瑪士(1588—1679)——卓越的英国的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霍布士的社会政治观点帶有尖銳的反民主的傾向。——第10頁
- 10 神权国家——統治的一种形式，在这种統治之下一切政权都屬於僧侶、

祭司等。在現時梵蒂岡就是这种国家。——第 13 頁

- 11 莫利納里，古斯塔弗(1819—1911)——比利时的資產階級急進派的經濟學家；他的最有名的著作是《經濟的進化》，1880 年出版。——第 15 頁
- 12 這是指法国的資產階級革命，它消滅了法国的封建生產方式。——第 15 頁
- 13 拉法格指的是法国資產階級对巴黎无產階級的殘酷的懲罰；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对 1848 年巴黎工人的六月起義的鎮壓和 1871 年 5 月对巴黎公社的粉碎。巴黎公社，这是巴黎无產階級革命的結果而在 1871 年 3 月 18 日創造的第一个无產階級的国家。——第 16 頁
- 14 康敏——法国低层的行政单位。——第 18 頁
- 15 斯賓塞，胡伯特(1820—1903)——英国資產階級的哲学家和社会學家，社会主义的敌人，他把生存竞争的生物学說帶到人类社会里来。斯賓塞的學說为現代反動的哲学家所利用。——第 20 頁
- 16 这里指的是阿西德克人在現代墨西哥領土上的国家和印加人在南美洲的国家，包括現代的秘魯、玻利維亞等的領土，十六世紀前半叶为西班牙的侵略者(征服者)的部队所侵占。

拉法格錯誤地认为在这些国家里存在原始共产主义；这是奴隶制的国家。——第 22 頁

- 17 梅因，亨利·詹姆士(1828—1888)——資產階級的社会學家和法學家，教授。他的著作《东方和西方的农村公社》出版于 1871 年，他在那里面描写了公社制在各国的殘余。——第 22 頁
- 18 洛克，約翰(1632—1704)——卓越的英国的二元論哲学家，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第 22 頁
- 19 格拉斯吞，威廉·尤阿尔特(1809—1898)——英国的政治活动家，不止一次担任过首相的职务和其它部长的职务，自由党的領袖。——第 23 頁
- 20 伊利亚特——古代希腊的史詩，它的作者据說是古代希腊傳說的詩人荷馬，其实是在民間創作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在这詩里描述了特洛伊城的被圍攻。——第 25 頁
- 21 笛卡儿學派——人們都这么称呼卓越的法国哲学家萊涅·笛卡儿的信徒。——第 27 頁
- 22 海枯勒士——古代希腊神話中的英雄。——第 27 頁
- 23 利特勒，爱米尔(1801—1881)——法国資產階級的哲学家，語文學家和

- 反动的政治家；《法国語言史》和大型的《法国語言辞典》的作者。——第 28 頁
- 24 狄德罗，台尼(1713—1784)——法国的作家，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无神論者，法国革命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之一。在 1751—1780 年领导了《百科全书》的出版，在这部书里试图采用唯物主义于一切知識領域。——第 28 頁
- 25 梅尔西，路易·塞巴斯丁(1740—1814)——法国的作家，十八世紀末法国革命的参加者，他写过許多哲学小說，日常生活題材的話劇和其它的一些作品。——第 29 頁
- 26 凱撒，汉·尤利(約紀元前 100—44)——著名的羅馬統帥和政治活动家。他的《高卢战記》是研究古日耳曼人生活习惯的基本資料之一。——第 31 頁
- 27 摩尔根，刘易士·亨利(1818—1881)——卓越的美国学者、民族志学者、考古学者和历史学者。摩尔根的有关印第安人的生活习惯的著作受到馬克思和恩格斯很高的評价。——第 31 頁
- 28 “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这句名言是卓越的美国的政治家、外交家和大学者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說的。——第 32 頁
- 29 普魯塔克(約 46—126)——古代希腊的作家，对道德的基本問題會感到兴趣。在他的《比較傳記》里載有古代羅馬的大政治家年老的馬克·波齐·卡东(紀元前 234—149)的傳記，他是奴隶社会的思想家之一。——第 33 頁
- 30 維科，乔巴迪士特(1668—1744)——意大利的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大家。在他的著作《关于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原理》(1725 年出版，1940 年出俄文版)里，維科主張循环論，照他的看法，依这理論所有民族都經歷着三个时期，相当于人类生活的三个时期：童年、青年和壮年。据維科說，童年相当于“神权时期”，那时人們是生活在野蛮状况里；青年相当于“英雄的时代”，那时創造了貴族的国家；壮年相当于“人的时期”，亦即民主共和和有限制的君主专制的时代，其实这是资产阶级的社会，这个时代被他看作是人类发展的最高阶段。——第 34 頁
- 31 菲松，洛里墨(1832—1907)——英国派往菲吉群島和澳大利亚的傳教士，民族志学者，他写的关于澳大利亚部落生活的著作有很高的科学价值。霍維特，阿尔弗来德·威廉(1830—1908)——英国的民族志学者和



- 澳大利亚的历史学家。——第 35 頁
- 32 柏拉图(生年約为紀元前 427, 卒年約为 347)——古代希腊的唯心主义哲学家, 奴隶所有制的贵族阶层的思想家。——第 38 頁
- 33 布希曼人是称呼那些生活在南非洲的部落群, 直到十九世紀还处于原始公社制的水平。——第 38 頁
- 34 达尔文, 查尔士·罗伯特(1809—1882)——偉大的英国自然科学家。在 1831—1836 年达尔文乘“毕葛尔”号帆船完成了环球旅行。拉法格在这里是指达尔文关于这次旅行的著作。——第 38 頁
- 35 拉貝魯茲, 让·弗朗沙阿(1741—1788)——法国的航海家, 考察过太平洋的許多地区。——第 39 頁
- 36 希罗多德(約紀元前484—425)——古代希腊的历史学家, 在他的《希腊波斯战争史》里記載了古代希腊人、波斯人以及希腊曾与之发生冲突的其它民族的生活。——第 40 頁
- 37 西里曼, 亨利(1822—1890)——卓越的德国的考古学家。在 1870—1886 年曾在希腊和小亚細亚进行过大規模的发掘。这里是指他在米肯的发掘。——第 40 頁
- 38 赫拉克利德, 龐丁的(紀元前四世紀)——古代希腊的哲学家。——第 42 頁
- 39 西西迪(斯巴达人叫非的迪)——在某些古代希腊的国家中的全权的公民的义务共食制。——第 43 頁
- 40 摩伊拉——古代希腊神話中三个掌管命运的女神(三姊妹——克洛托, 拉海西士和阿特罗波士)。——第 43 頁
- 41 米諾斯——傳說的古代克里特的王。意大利——傳說的古代爱諾特罗弗(希腊人都是这样称呼南意大利西南部的居民)的王。——第 44 頁
- 42 斯塔吉里的哲学家——拉法格是指亚里士多德, 因为他出身于弗拉基的斯塔吉里。——第 44 頁
- 43 哈利卡尔納斯的底尼西——古代希腊的历史学家, 在他的《羅馬考古学》里引用了早期羅馬史的某些傳統的故事。——第 44 頁
- 44 庫里亚——古代羅馬居民分組的单位, 每一庫里亚由十个民族組成, 有自己的圣物和祭司。十个庫里亚組成一个部族。在羅馬一共有三个部族。——第 44 頁
- 45 羅馬路斯——据羅馬的傳說, 他是羅馬城的奠基者和第一个羅馬的王。

李庫格——古代斯巴达的傳說的立法者，斯巴达人把自己的主要的和最古的習慣同他的名字連在一起。——第 44 頁

46 《奧德賽》——古代希臘的史詩，傳為荷馬所作，詩中描述了氏族制度瓦解時期的人民生活。詩的主題是寫特洛伊戰爭的英雄之一奧德賽歸還故國。——第 44 頁

47 克塞諾芬（約紀元前 430—355）——古代希臘的歷史學家，雅典民主制的敵人，貴族制的斯巴达的崇拜者；他的著作提供有關地中海沿岸民族歷史的珍貴資料。——第 44 頁

48 卡特林，喬治（1796—1872）——美國的畫家，他曾把美洲印第安人的生活作成風俗素描的組畫。——第 45 頁

49 重商主義——這裡是指唯利是圖的行為。它也被用來稱呼十五——十八世紀某些歐洲國家用商業來增加國內貨幣資本的政策。——第 47 頁

50 塔西佗，柯爾涅利（約 55—120）——古代羅馬的歷史學家，他的著作是有關古代日耳曼的社會制度和公有制度歷史的基本資料之一。——第 47 頁

51 斯當納，亨利·摩爾東（真正的名字是喬昂·羅烏連德）（1841—1904）——英國的旅行家，非洲的考察者，殖民主義者。布拉撒，比爾·保爾·弗朗沙阿·卡米爾（1852—1905）——非洲的考察者。——第 48 頁

52 沙爾瓦，比爾·弗朗沙阿·卡維爾（1682—1761）——法國的傳教士，在加拿大住過許多年，留下了有關這個國家的材料豐富的記載。——第 48 頁

53 拉翁登（約當 1666—1715）——男爵，法國的軍官，在北美作過多次旅行。他的這些旅行的記錄提供有關印第安人生活的有趣的材料。——第 48 頁

54 拉法格這裡搞錯了。如恩格斯還在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就已確信地證明過，國家只是從私有財產出現和社會分裂為階級之時起才作為一個階級壓迫另一階級的工具而出現。秘魯的印加國家是奴隸制的國家。

拉法格對原始共產主義的估計也是錯誤的。與極端簡陋的勞動工具相聯系的原始共產主義是人類社會的低級階段，遠遠談不到“幾百萬人的享福”。——第 49 頁

55 普列斯柯特，威廉·希克林（1796—1859）——美國的資產階級的历史

- 家，写了有关西班牙和西班牙侵略美洲的历史著作，在这些著作里特别注意古代墨西哥和秘魯文化的历史。——第 49 頁
- 56 导水工程——当水需要通过深谷、沟壑时，架設一座桥型的工程来支持輸水管道。——第 50 頁
- 57 吉托和庫斯柯——南美洲印加国的城市。庫斯柯是印加国的首都。——第 50 頁
- 58 利奥第十三 (1810—1903) ——羅馬教皇 (1878—1903)，在自己的通告 (致教徒的文告) 里肆意誹謗社会主义者，号召用建立天主教党和职工会来同社会主义者作斗争。——第 52 頁
- 59 耶和華——犹太教的上帝。——第 52 頁
- 60 拉法格引证的是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二章 (參看《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423 頁)。——第 53 頁
- 61 亚利安人——伊朗和印度的民族的普遍标志。这里所指的是印度人。——第 54 頁
- 62 馬魯法——古代印度的命令汇编，这些命令規定了每个印度人遵照宗教的教条应尽的义务和社会的責任。法律的制訂者是馬魯——神話中人的始祖。这些法律保护奴隶主的利益。——第 54 頁
- 63 馬其頓的亚历山大 (紀元前 356—323) ——古代世界的著名統帥和政治活动家。——第 54 頁
- 64 西西利的第奥多尔 (約为紀元前 80—29) ——古代希腊的历史学家，以所編《历史丛书》著名，其中詳述全世界的 (特别是希腊的) 历史，从远古时代一直讲到紀元前一世紀中叶。——第 55 頁
- 65 普埃不洛 (住宅) ——这是西班牙侵略者对那些生活在北美西南部的定居的农业部落的村落住屋 (可容千人) 的称呼。在每間屋里住着一个氏族公社，同时每一家又有单独的房間。——第 55 頁
- 66 太阳是印加的最高的神；所謂“太阳之地”实际上是屬於管理国家的祭司。——第 56 頁
- 67 梭倫 (約紀元前 638—558) ——著名的雅典立法者，在人民群众的壓力下曾制訂了一些反对民族貴族的法律。——第 58 頁
- 68 修昔底得 (約紀元前 460—400) ——古代希腊的大历史学家，《比罗奔尼苏战史》的作者。——第 58 頁
- 69 这里是指恩格斯在 1884 年写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第 59 頁

- 70 領地所有權——在中世紀歐洲對家臣的有條件的土地占有常用的稱呼，家臣從領主那里取得一片土地，為此他就要承擔戰爭服役。——第 60 頁
- 71 盧梭，雅·雅克(1712—1778)——卓越的法國的啟蒙者，民主主義者，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家。——第 67 頁
- 72 習慣法——照字面講是指習慣；其實是封建時代法國的地方的習慣法的通稱。習慣法主要涉及財產關係和家庭關係。——第 67 頁
- 73 十二銅表法——羅馬法律的最古的結集，紀元前五世紀中葉由於平民反對貴族的鬥爭結果而編成的，因為這些法律是寫在十二塊板（表格）上，故得名。——第 68 頁
- 74 近親復仇——通常都是為了血緣親屬遭受殺害而進行流血的復仇。——第 69 頁
- 75 歐幾里德——古代希臘的哲學家、數學家，遺傳到我們手里的第一批數學論文的作者。——第 69 頁
- 76 連格，西門·尼古拉·安里(1736—1794)——法國的政治活動家和政論家，十八世紀革命前夜法國資產階級的思想家之一。——第 69 頁
- 77 孟德斯鳩，謝爾(1689—1755)——法國資產階級的社会學家、經濟學家和作家，君主立憲的理論家，有名的《法律精神》一書的作者。——第 69 頁
- 78 奧維德（普不利·奧維德·納桑）（紀元前 43 到紀元 17）——卓越的羅馬詩人。——第 69 頁
- 79 《申命記》——聖經諸著作之一，相傳為古猶太的先知摩西所寫，其實是紀元前七世紀時不知名的作者所撰；書內包括了宗教的法律。——第 70 頁
- 80 采來拉——古代羅馬人傳說中的管果實繁殖的女神。——第 71 頁
- 81 Servitus——在封建社會是指使用別人家財產（土地）的限制法，例如，在別人的地段上通行、拾枯枝、放牧牲畜、飲牲畜等等的法律規定。——第 86 頁
- 82 羅蘭——法國查理曼大帝在他同摩爾人（阿拉伯人）鬥爭中的老戰友之一；778 年在西班牙的朗塞瓦狹谷的戰鬥中陣亡；他是法國民族史詩（《羅蘭之歌》）的英雄，人民在他身上體現了自己的愛國者，高尚而無畏的戰士的理想。——第 87 頁

- 83 斯特拉邦(約紀元前 63—紀元 20)——古代希臘的大地理學家和大歷史學家,他的《地理》是有关古代希臘人和羅馬人所知道的諸民族的历史和生活的有价值的資料。——第 89 頁
- 84 阿加綿农——《伊利亞特》英雄之一,傳說的阿尔加士的王,特羅伊戰爭時亞該亞軍队的統帥。——第 90 頁
- 85 征服者維爾蓋爾姆第一(1027—1087)——諾曼第的大公,在 1066 年借諾曼第的和法国的騎士組成的僱傭軍队之力征服了英国而成为它的国王。——第 90 頁
- 86 英諾森第三(1161—1261)——羅馬教皇(1198—1216),他曾組織了用日耳曼的騎士來掠奪波罗的海沿岸的土地(反对立維人和普魯士人的十字軍远征),并且还組織了 1209—1215 年的歼灭性的十字軍远征來反对阿耳比果派,他們是反天主教,特别是反封建运动的参加者,因这次运动的中心之一是法国南部的阿耳比城,故得名。由于十字軍远征的結果,法国南部慘遭洗劫。——第 90 頁
- 87 瓦本,塞伯斯丁·萊·彼特(1633—1707)——法国的元帥,軍事工程師,許多經濟著作的作者。——第 110 頁
- 88 馬布利,格布里尔(1709—1785)——卓越的法国的社会學家,烏托邦的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的代表者。——第 111 頁
- 89 雅開利——1358 年在法国爆发的一次較大的反封建的农民起义,因加給法国农民的渾号“雅克-勃羅斯塔克”而得名。——第 113 頁
- 90 指 1525 年在中世紀的德国爆发的一次反封建的大农民起义,所謂农民战争,它的主要中心之一是施瓦比。——第 113 頁
- 91 拉法格在批評資本主义社会的辯護者时,在这里片面地考察了十八世紀法国的資產階級革命,这次革命消灭了法国的封建主义和为較封建的生产方式更进步的資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廓清了道路。——第 116 頁
- 92 拉法格是指 1358 年法国的反封建的农民大起义,因法国农民的帶侮辱的外号是“雅克-勃羅斯塔克”而有“雅克”之称。1358 年 6 月埃迪納·馬歇爾,起义的領袖,拒絕給农民帮助。雅克便被沉沒在血洗中。——第 123 頁
- 93 拉法格搞錯了,他认为商业只属于資產階級的社会。商业也存在于以前的社会经济形态里;在資本主义时代它是資本家階級发财致富的补充手段之一。——第 124 頁



2 028 8735 9

- 94 普魯东, 彼尔·約瑟夫(1809—1865)——法国的政論家、經濟学家和社会学家; 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 无政府主义的創始者之一。——第 124 頁
- 95 笛斯拉里, 本杰明(1804—1881) ——英国的政治活动家和作家, 保守党的領袖, 不止一次担任过首相和其它內閣大臣的职务。——第 144 頁
- 96 指 1861—1865 年在美国进行的北部工业較发达的州同奴隶占有制的南部的国内革命战争。战争以北部諸州获胜而告結束, 并且廢除了奴隶。——第 145 頁
- 97 fellahs (农民) ——阿拉伯国家, 包括埃及在內, 对种庄稼的农民的称呼。——第 146 頁
- 98 苏利, 馬克西米連·德·貝图(1559—1641) ——法国的政治活动家, 1599—1611 年担任财政部长, 用减少直接稅和增加間接稅的办法来巩固国家的財政状况。——第 151 頁
- 99 柯尔貝, 雅·巴迪斯特(1619—1683)——法国的政治活动家, 实际掌管法国的內政和外交政策, 实行重商主义以利于絕對专制的巩固。——第 151 頁
- 100 劳, 約翰(1671—1729)——资产阶级的經濟学家和大財政家; 1716 年創建了私人銀行, 1720 年归国家; 投机事业和各种可疑的企业, 例如 1718 年試图使路易西安(密西西比)殖民地化, 終于使銀行破产。劳本人則被迫从法国逃跑出去。——第 152 頁
- 101 百科全书派——最先进哲学家、学者和政論家, 十八世紀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先驅者的集体, 他們团聚在以狄德罗为首的《百科全书》(1751—1780)周围。——第 152 頁
- 102 拉法格在这里是指十八世紀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的許多无原則的政治活动家, 一味只想个人的发财致富。由于在革命过程中发了財, 这些家伙便紛紛投入反革命资产阶级的营垒。——第 154 頁
- 103 这里是指 1848 年 2 月 24 日巴黎的人民群众推翻路易·菲力普的专制和建立共和的起义。这些事变乃是法国 1848—1849 年革命的发端。——第 158 頁